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与研究路径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摘 要:作为文化批评,视域宽广的新历史主义为人们重新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以新历史主义的视域、研究路径与方法为题展开系统论述,指出其全景化视域为观看人类生命实践、符号建构活动奠定了始基,以文学作为路径来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导向,新历史主义拓展文学的意涵,取消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间的边界,通过权力话语分析揭示宏大叙事的虚假,用多元化叙事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作为一种思维样式,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改变着人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和书写方式;作为研究路径与实践的方法,为文学创作者、文化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介入文化创作活动、实践活动的通途。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视域;路径;文本;书写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1
中图分类号:I106;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01-08

一

自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于1982年发表在《文类》上一篇文章中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以降,那些在思想主题、理论框架、研究取向、探索路径与格林布拉特相同、相近、相似的著述的作者,皆被划归入新历史主义者的行列,这些人为数众多,其中有布鲁克·托马斯、弗兰克、林特利查、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朱迪斯·劳德·牛顿、理查德·特迪曼、玛格丽特·佛格荪、多利蒙尔、阿兰·辛菲尔德、科尔曼·赖恩、邓·E.韦恩、列奥纳多·泰伦豪、路易斯·蒙特鲁斯、罗伯特·卫曼、莱因哈特·科瑟莱特、弗兰克·摩提拉、P.帕克,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他们从跨学科、跨领域的极为广阔的研究视域,择取丰富多样的研究策略,运用多学科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撰写切中问题核心的文章,出版的相关专著,一时间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宽泛的称谓,研究者的这种划归是普泛意义上的归类。毋须说,这种归类并不严格,张京媛编著《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选取了近十位这种类型的人的论著,但这些人是否皆为真实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者仍然存有争议。一般而言,人们公认的新历史主义者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约纳森·多利摩尔、阿兰·辛菲尔德、科尔曼·赖恩、列奥纳多·泰伦豪、路易斯·蒙特鲁斯等,其中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佳者,当属格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与海登·怀特,二人在总体思想基调上一致,但每人又各有侧重与专攻,成就斐然。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学术探讨以文艺复兴时期为研究重点,从文化政治批评的视角介入研究,将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置入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探索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习俗惯例与精神环境,关注文学历史研究中权力、权威与意识形态的维度,用心去挖掘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趣闻轶事、奇异话题、意外插曲,对不同种类的写作事件进行重新命名与划界,通过文本与语境研究来重构历史,对文学史、思想史进行全新的改写。其代表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莎士比亚的自由》《文化流动》《转向:世界如何成为现代》《莎士比亚的协商》《学会诅咒》《俗世威尔:莎士比亚如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张月(1959—),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艺学、艺术学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从事西方经典作品和人文思想的翻译工作,研究方向:文艺学、社会学等。

何成为莎士比亚》《奇妙的财富》,编著有《新世界邂逅》《边界的重绘》等。

海登·怀特的研究则集中于历史与文本的思考。他认定在历史的存在与历史的文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应关系,更不存在对等关系。实在域与符号域并不相通,亦不对应,人们永远不可能真正触摸到已经成为过去的实在域的历史。人们所见之历史,其实皆为文本化的历史,即以文本为载体的历史,作为文本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种文本的叙述和修辞活动,历史文本的生成既取决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的事件与活动,更取决于记述历史事件与活动的主体的认知、理解、选择、叙述、修辞、释义和价值判断。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创立一整套用修辞学来解释历史、建构历史的独特理论。其理论主张与观点体现在他的《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历史的负担》《叙事的回归线》《希腊罗马传统》《形式之内容》《借喻的现实主义》《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希腊罗马传统》《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等一系列著述之中。

二

新历史主义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即对现存的多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进而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抨击,其中历史主义与新批评对其斥责尤甚,将其斥之为双重谬误,称其既是"文本主义谬误",又是"文化主义谬误",然而真正成为谬误的一方却恰恰正是指斥者一方。

新批评力主文本中心主义,切断文艺活动的实践者——作为文艺活动主体的作者和读者与文本的联系,既反对用作者意图来解读作品的意义,将此意图称之为"意图谬误",亦反对用读者的感受为依据来解读作品,将其指斥为"感受谬误",他们在语言形式与结构研究四周筑起高墙,将心理、哲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影响语言运用的要素排斥在研究之外,醉心于所谓的语言、风格、结构、语义的内在性研究,忘记了语言的形式、风格、结构与意义源于语言活动主体的语用,忘记了语言活动主体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之中的人。其消解语言活动的主体的实践,取消文学文本的社会维度与历史维度的做法,导致其研究与文学实践主体的脱节,与文艺活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历史环境的丧失联系,最终走向孤立的境地,失去对其研究对象的解释力,终究逃不过形式主义谬误的命运。

历史主义则相信历史决定论的神话,相信历史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可以做出历史发展进程的预见,可对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做出预测。历史主义有着丰厚的传统与诸多的信奉者,从维科、卢梭、赫尔德、柏克、黑格尔到柯亨、狄尔泰、斯宾格勒、奥锫,他们皆信奉一种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观,而且他们倾向于相信历史是一种实际存在,独立于认识主体,独立于主体的研究手段,历史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研究者若能够克服其主观因素,适当使用其语言工具,即可以挖掘出掩藏在时间尘埃之下的历史史实,再现历史真相,并由此获取有关历史的客观的真理。

这样的历史观影响深远,世人多倾向于这种所谓的客观历史观,并对其所谓的正确性深信不疑。然而,这种历史观从根本上看并不真实,脱离了主体的客观历史从来就不曾存在,主体始终参与历史的创造与历史的书写。恩格斯在其有关历史问题的表述中,明确无疑点明了主体主导着历史的创造,恩格斯坚称,历史不是别的,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1]119。马克思的表述更为清晰明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603。就人与历史的关系而言,"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历史的'剧作者'"[2]113,从根本上说明了人与历史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显而易见,人在历史创造与书写中原本即是无法规避的关键要素。

卡尔·波普尔直接否定了总体发展的历史观,否定了所谓社会规律主宰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主义主张,指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迷思。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开篇,他就宣称:"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3]1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姊妹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解释说:"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而他们却相信'历史本身'或'人类历史',通过其内在的规律,决定着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未来,甚至我们的观点。"他以一种更为激进的语调宣称:"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困难如何与过去相关,我们想看到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沿着它找到我们感受到并且所选择的主要使命的答案。"[4]259-260

反对这种所谓的客观历史主义的学者不胜枚举,无论是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5]14的克罗齐,还是断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6]244的科林伍德;无论是言说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沃尔什,还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主宰历史发展的一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规律的费耶阿本德;无论是主张历史是选择与重构的丹托,还是言称历史是透过语言、特别是通过“话语”而同现实、未来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权力结构的福柯,都反对历史主义所信奉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历史,他们或是从过去与现实及主体的关联意义来理解历史,或是从历史与人的思维、判断、反省和领悟的关系来看待历史,或是从历史与历史书写者及现实的联系上来认识历史,或是从反决定论、反宿命论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或是从历史书写主体的选择和建构角度来界定历史,或是从话语、现实与权力网络分析的维度来揭示历史的真相。新历史主义也从其独具特色的视角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新历史主义者通过文学文本介入历史研究,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皆作为文化文本来阅读,拆除其间的边界,根据互文性分析,发掘被主流权力话语扭曲、遮蔽、忽视、省略、删除的历史事实,揭示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在历史的建构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进行澄清、去蔽、增补,以多元化的方式重新解读历史、书写历史。

三

与其他学科被限定的边界清晰的有限视域不同,新历史主义的视域极为广阔,从不局限于某一学科本身的疆域。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视域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跨文化的、多维度、多指向的全景视域,从其视域中可以看到所有与人相关的研究对象——从最为具象化的到最为精神化的,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到哲学、文艺、心灵、信仰、习俗、制度、意识形态等。有人言称新历史主义视域边界不清,实在是其自己视域过于狭隘;有人称新历史主义缺少原创性,没有自己新的建树,实则是其对原创性与建树的理解过于皮相。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识到,视域的狭隘使人看不到自设视域之外的事物,而外在于其视域的事物却与其视域内的事物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若不打破狭隘设限的域界,就无法看清事情的真相。

视域的全景化即是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建树,以往从未有过哪个学科或那种理论有过视域的全景化。先前的学科或理论皆将其视域限定在其边界内,无论是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解构主义,还是精神分析、批评理论、解释学、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等,都有其固定的视角以及相关的被限定的视域。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理论虽然使用全景监狱这样的比喻,但他使用指称由勒沃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边沁建构的全景监狱的用意,在于从监视控制视角来谈论视域,而新历史主义则并不局限于此,其注重的是全方位的、全视角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观看视域。

在此视域中,不仅可以看到权力对人的监视、控制、胁迫,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渗透,也可以看到人的自主、人的选择、人的抗拒和坚守;既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制度、习俗、环境对人的制约、限定和强制,也可以看到人的自由空间、人的创造力、人的个性与尊严的表达,人对于信仰、理想和希望的执着和追求;既可以看到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劳作、艰辛、困苦和被动,也能够看到在生产活动尤其是精神生产活动中人所展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无尽的创新能力,人创造出的伟大、灿烂的文明。全景化的视域让人看到的历史不仅只是铁和血的历史,不仅只是一连串的统治者的权力的争夺、宫廷政变、战争、屠杀和征服的历史,而且更是无数人类文化的创作者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和文明的历史。简言之,新历史主义提供的全景化的视域能够让人看到尽可能广阔的人的世界、尽可能多的维度的人的生命实践和尽可能多的层面的人的活动。

新历史主义对全景化视域的持守,消解了其他学科理论自建的有限视域边界,让人看清视域自限阻止人走近真相。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固守文本、刻意切断与文本的作者和文本的读者的联系,在文本之内研究语言的修辞与叙事、结构、意义,将其认定为语言的内在属性,忘记了修辞后面是修辞者,叙事后面是叙事者,文本不能自成,修辞不会自现,如何叙事不是叙事结构决定的,而是叙事者的态度、立场、叙事策略、叙述方法决定的,而意义是在此基础之上生成的。解构主义在面对世界与文本的关系时也有一种近乎文本拜物教的情结,其领军人物德里达公然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他虽可使用其自己的逻辑自圆其说,但换种视角观看,其武断的言论与事实不符,解释力极为有限甚至没有解释力。

历史主义迷恋于客观性和规律性,在其有限的视域中,看不到主体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

决定性作用，盲目地相信所谓的客观性与规律性，执拗地认定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以其逻辑推断，人只需等待，也只能等待，因为历史必然会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人的任何努力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历史主义者用其有限的视域将历史活动的主体屏蔽在外，全然盲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事实，其视域限定下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宿命论，不仅贫困，而且罔顾事实，其追求所谓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努力，恰恰使其走向了反历史的歧途。

新历史主义的宽广视域让人得以认识构成历史的诸种成分和要素，不为狭隘视界所限，既视见历史物性存在之遗存，又看到作为历史实践和活动的主体的人，同时看到最多的是承载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活动的文本。不仅如此，它还让人看到由于历史的书写者的有限性，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可能全部都载入历史文本之中，“历史从定义上讲是重构，在众多事件中进行挑选”[7]129。而书写者的刻意为之，或迫于历史上当政者的压力而被迫为之的书写，又会使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删除，灭踪除迹。《四库全书》的编纂曾被官方作为乾隆皇帝治下的一大功绩加以宣扬，载入史册，其实则是乾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伤害，甚至是一次文化洗劫。以“稽古右文”为名，他推行唯我独尊的文化专制，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国人征集图书，收缴所有在民间可能存在的书籍，实施“寓禁于征”，销毁或篡改大量文献，对有违清朝统治的书籍，采取了全毁、抽毁和删改的作法，编纂出了《四库全书》。据不完全统计，销毁图书为 13600 卷，焚书总数约为 15 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为 170 余种、8 万余块，明代档案逾 1000 万份。假如乾隆皇帝不曾召集和珅等 360 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 多人抄写，始于 1772 年，费时 13 年，编成《四库全书》，尚存在世的中国古代文献要大大多于《四库全书》收录的体量，世间也不会增加无以数计真假难辨的篡改、编造、歪曲之作。

四

在正统的历史著作中，文学的地位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在讲述完宏大的生存斗争事件、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活动、历史风云之后，文学只是作为点缀用只言片语加以提及。在非教科书类的历史著作里，文学的踪迹几难寻见，一方面是因为学科的归化，文学不在史学之列，所以不为史学家所关注，另一方面，史学家重视物性化的历史材料，并以此为依据建构事件史与活动史，而对于构筑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的文学则相当忽视。这种忽视造成了人们认识历史的完整性的重要缺失。

文学作为构成历史的组成部分被忽略，其因由通过历史上统治者的态度和其实施的文化专制政策体现出来，自焚书坑儒以降，统治者为了维护话语霸权，对不利于自身统治的文化始终进行打压，文化禁毁活动几乎从未中断过，从世界范围来看，亦是如此。禁书是其常用的手段，在被禁的书籍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是文学作品。文学被禁，究其原因，不外乎文学以虚构、隐喻的方式书写了统治者不愿意面对的真实历史。文学对历史的书写，不仅具体历史事件是真实的，而且因文学修辞手段的运用，天然具有象征意味，其具体的形象表现不仅具有个性，更具有共性与普遍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九章中，对文学表现普遍性的属性进行了说明，“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则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8]81。文学对于历史的表现与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其真实性并不比历史差，它可以使用虚构和隐喻的手法进行创作，其形象性、叙事性及故事的表现力强于历史叙事，其感染力自不待言，而且其针对性无论是在统治者还是在民众看来都一目了然。像《古拉格群岛》《一九八四》《我们》等之类的作品所指清晰可辨。因此，统治者对于文学的重视，一点也不亚于对历史的重视，而且还会找出各种借口，查禁在他们看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文学作品，迫害相关作家。即使到了文明的 20 世纪，迫害也未停息，前苏联作家因与官方意见不合，遭查禁或迫害的作家、诗人为数众多，即使像布罗茨基、叶甫图申科、帕斯杰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作家，也同样遭受官方的打压和迫害，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要被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历史学家对于文学的轻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将文学仅看作是审美活动的产物，其主要功能在于审美，而非再现历史真实；二是即使文学能够真实地表现历史，由于其通常采用虚构、想象、隐喻和象征等相对自由的表现手段，其创造所运用的规范与历史的写作规范不符，历史学家无法依据自有的规范，使用文学材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但新

历史主义的宽广视域让人看到了文学的复杂样貌。文学是人的建构活动的产物,既可用于审美,也能作为认识、教育、娱乐、观念建构。文学是人学,文学不仅是审美活动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建构,文学不仅建构着人类精神史、观念史、心灵史,而且也建构着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的全景化视域,拓展了人们观看文学的维度,深化了人对于文学的认识,让人看到了新历史主义者为何如此看重文学在人类历史建构中的作用的深层缘由。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的重新观看,让人看到了文学在建构人类完整的精神和物质历史的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让人认识到文学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使用虚构、想象、隐喻和象征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对新历史主义使用的虚构、想象之类的词语的意涵有了新的认知。

新的视域带来新的视野、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看,被观看对象在新的观看中,其多面性、多维性、复杂性得以呈现。文学的多维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立体式的构成被重新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中,文学既是审美文本,也是历史文本、文化文本,在这种重新发现中,文学原有的那种广义的内涵得以重现,其最初的作为人类活动文献的定义得以恢复。

五

正统的历史学家小视文学在历史建构中的功能,或即使认识到文学的重要建构功能,也因学科规范的限定,不知如何使用文学文本来从事其研究,也不可能从真正的严肃意义上对待文学文本。然而正统历史学家做不到的事,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却做到了,这得益于其宽广的视域和在宽广视域中对文学的重新定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文化文本,视为人类生命实践的文献。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的实践,让人看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另一重要建树,即将文学领域与其他学科领域打通,打开因学科自定的边界,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各个专业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伦理、习俗、制度、宗教、文学、历史、哲学等,纳入以文化人类学为根基的广域文化视界之中,广泛利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资源,吸取对其研究有益的方法,进行一种大综合式新的探索与研究实践,并结出累累硕果。

新历史主义从广义的文学进入历史的研究领域,对历史进行一种别开生面的探索,运用多种研究策略与方法,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联系在一起,进行互文性的阅读。在比较阅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找出其与历史的关联;通过语境重置的方式,努力复原文学文本得以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文化环境;运用权力关系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找出内里的原初关系形态与结构要素,对官方历史遗漏的内容进行补足,对其删除的部分进行恢复,对其刻意歪曲的部分进行正本清源,对其伪造的部分进行揭露,对其篡改的部分进行改写。与此同时,注重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对历史进行多元化的重新书写。

对于历史的认识,新历史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基于实存意义上的理解。历史大于文本,文本是压缩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文本的延伸。人类的历史活动通过文本的承载而达于后世,承载过程是历史书写者淘选的过程,选中并通过文字书写下来的历史为后世所见,而未入选承载于文本之中的历史活动最终踪迹泯灭。历史的书写既有官方的书写,也有民间的书写;既有初始的书写,也有继后的续写;既有有组织的集体书写,也有个人化的书写。书写的文类、方式、风格、样式各异。正统的历史学家也知道,历史的书写是做减法,尤其是宏大历史的书写更是如此。当政者为了取悦民众,常喜欢宣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可阅遍古今中外宏大叙事的历史,也始终找不到创造历史的这个最大的群体——人民的踪影。人民在历史中永远是缺席的,在场的永远只是书写者认为重要的少数人。

为了使历史能够增加一些细节,显示出有别于公共空间的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人痕迹,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了五大卷本的《私人生活史:从私人账簿、日记、回忆录到个人肖像全纪录》,约 3000 多页,180 万字,为人们了解私人生活空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编录此书的目的,按乔治·杜比的说法,是想要让人读到较之宏大历史、其真实程度更高的“私人生活的历史”,这部历史所展现的是“私人生活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域,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9]7。

由于官方具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绝对话语权,加上其推介和倡导,官方所修的历史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民间书写的历史则居于边缘。一般而言,官方所书写的历史是其权力话语的集中体现,而民间书写则更多地显示为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述。民间书写的历史虽居于边缘,力量微弱,却是异于官方的另一种声音,对于官方力推的充满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

仍能构成实际的威胁，官方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或剪除民间的声音，或是通过严酷的文化整肃，或是通过文献汇集编纂等名义上的学术活动，来搜缴民间的文本文献，最终力图达成清除不同的声音的目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即是典型例证。这一被作为丰功伟绩记录在史册的事件，实则是文化洗劫和文化蒙难。鲁迅先生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此皆有专门的论述。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10]153 费正清则在其所著述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点明了清朝统治者借编纂《四库全书》之名，行使文化专制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 L. C. 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11]92。两位学者一中一美，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彼此相距遥远，但在如何看待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上，两人的观点却惊人地接近。

六

新历史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宏大历史中充斥着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其书写过程即是权力运作的过程，"成王败寇"既是其评判的原则，亦是其书写的原则，因此为王者撰写的大历史充斥着谎言也就不足为奇。要想接近真实的历史，就要诉诸其他的途径，寻找别样承载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记述文献。这也就是为何新历史主义者喜欢搜集趣闻轶事、奇异话题、意外插曲、偶然事件、异样事物、私人记录、民间纪事，探索和解析文学文本承载的内容的缘由。这些被主流历史话语排斥在外的文本，常常可以显示出历史的真实面容，雷蒙·阿隆在《论治史》谈到一句看似平常的记述，却揭示了一种暗含的历史真相，"笛卡尔曾在荷兰生活，这一事实让我们弄懂了为什么那个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阴影里"[7]129。

文学文本之所以为新历史主义者所青睐，是因为文学文本承载着无比丰富的内容，文学不仅表现人类情感，塑造人类的精神与形象，而且也表现和反映现实，以虚构和想象的手法，使事实真相得以变相地存留。文学文本中包含着与当政的统治者并不相合的他异性构成，但常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弥散地存在，得以逃过并不高明的文化审查者的注意而幸存于世。当政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可以将其意识形态化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其内在包含的他异性的构成又会对其统治造成麻烦，可这种他异性存在虽不利于当下的存在，却可能服务于未来。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对文学的完全禁毁，文学是当政者和社会允许其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具有他异性甚至反抗性的文化形式。

新历史主义者深谙其间的奥秘，深知文学的复杂构成、丰富的内涵和能够为其使用的方式。他们以文学文本的解读作为研究路径，采用适宜的探索方式与研究方法，达成自己追寻的目标。他们运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因人而异，但归结起来，大体有如下数种：

1. 背景重置。将文学文本进行历史的境遇化，把文本置入其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之中，尽可能复原制约或促成文本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习俗、伦理、宗教等要素，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形态以及与大历史的关系。

2. 语境分析。文本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语境，要了解文本表达的意义，需对语境展开分析，其中包括对不同历史单位形成的语境进行分析，对文本中的语境进行分析，对文化系统中的语境进行分析，对多次阅读的语境进行分析。

3. 互文性实践。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联系起来，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通约性，让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互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共同形成从历时态与共时态两重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对文学和历史进行重写。

4. 互主性实践。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皆为主体活动的产物，在文本的阅读与书写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文本原有的书写主体和文本中的主体相遇，不同的主体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在此过程中彼此可能发生视域融合，也可能产生视域冲突，一旦冲突发生，即采取厚今薄古的立场，消解冲突。

5. 话语权力分析。历史书写是权力话语实践，

在解读历史的文本时要充分考虑到权力和由权力派生的利益、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性对历史书写的作用和影响力，分析权力的结构与功能，解析权力对话语的支配作用和对历史形态的塑造。

6. 叙事与修辞分析。进入文本的历史是一种叙事与修辞，因此，应从叙事和修辞的维度对历史进行分析，查看叙事与修辞如何造就历史文本的形态，探讨叙事与修辞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与解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7. 多元化叙事。宏大历史的写作因官方权力的介入会造成本真、完整历史叙事的偏移、歪曲、删改与遮蔽，为了抵消官方权力介入历史写作的消极作用，应进行多元化的历史叙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性别、不同宗族与人群对历史进行尽可能多样化的书写。

事实上，新历史主义者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不局限于以上方法，他们会更多地使用任何他们认为适用的、从其他学科和理论借用来的方法。

七

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域、路径给人带来了理解文学与历史的新的可能性，也招致了各种各样的非议和批评。这些非议和批评，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的则源于误解。海登·怀特讲，人不可能找到历史，因为历史业已逝去，无法重现，不能复原，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找到被阐释和被编织过的历史。这样的表述就被指斥为文本历史主义，事实上，人的确无法直接触摸历史，人所能看到的是转域的文本化的历史，就是能看到历史的遗迹，那也不是其原有模样。对海登·怀特最深的误解，应是对其使用的虚构和想象的词义的误解。关于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海登·怀特在其著述《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专门给出了解释："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作是假设性构造和对实在的'好像'(as 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象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12]7

无论是否承认，新历史主义批评给人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其不仅对人的意识与对历史的认知判断产生了影响，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影响。为数众多的作家的作品都受到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观念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刘恒的《苍河白日梦》，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1934 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的《青黄》《风琴》《迷舟》，余华的《活着》《一九八六》《往事与刑罚》，叶兆言的《状元境》《追月楼》，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廉声的《月色狰狞》等，皆带有明显的新历史主义观念的意味。陈忠实《白鹿原》的出版之所以艰难，电影版的《白鹿原》和电视版的《白鹿原》之所以经历漫长的审查，与其作品表现的对那段历史所作的颇具新历史主义意味的诠释有着密切的联系。

相比传统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所提供的视域和观看历史的方式，的确可以让人尝试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来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对其进行重新解读。而这种认识历史、解读历史的方式，使人能够看到被官方的大历史所遮蔽的多元的他异性的历史存在。

杨显惠、郑念、巫宁坤等人也许并未关注过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写作过程中也从未想要尝试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看视角来处理写作的素材，以文学的形式来书写历史。但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巫宁坤的《一滴泪》，的确可以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来进行理解和解读，作品从个人或小群体的视角，表现了 1949 年以后知识分子坎坷多难的命运。

国内不少评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文章都宣称，新历史主义业已衰微，正在成为过去，有人甚至断言，新历史主义已经成为历史。这种说法缺乏充分的依据。事实上，新历史主义并未过时，也未成为过去，只是其存在方式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改变，以往是一批人集中在一起，现在是大家弥散开来，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继续依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看视角来从事着有关文学与历史的探索、研究、批评与实践，而且还有人不断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尝试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看视角来认识、评判和解读文学和历史。因此，不能从狭隘的意义上去判定新历史主义的走向与命运，妄称新历史主义已是穷途末路。

新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批评流派，它更是一种思维样式，一种对人类历史认知和书写的方式，一种研究路径和实践的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样式，它已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对人类历史认知和书写的方式，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书写；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实践的方法，它已经为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采用，为文学的创作者、文化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介入创作活动、文化实践活动的通途。新历史主义以弥散的方式，对诸多不同领域中的文化实践者、文学创作者、文化探索者和研究者产生着难以估量的

巨大影响,改变着他们的思维走向,影响着他们对现实与历史的认知与书写。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力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其深邃的影响力注定是广域的,深远、绵长、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辑,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Karl Popper .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II)[M]. George Routledge, London, 1947.

[5]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张文杰,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7]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M].冯学俊,吴弘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8]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利普·阿利埃斯,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第1卷)[M].宋薇薇,刘琳,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10]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2]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New Historicism: the Perspective and the Approaches

ZHANG Yu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hz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 cultural criticism, the New Historicism with a broad horizon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re-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paper develops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vision, the exploring path and the means of New Historicism. It points out that its panoramic horizon offer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observing the activities of human life practice and the symbol construction. Literature, as a way to understand history,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 New Historicism expands the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bolish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ry text and the historical text. It has revealed the false of the grand narrative by the power discourse analysis and rewrites histories with diversified narratives. As a mode of thinking, the New Historicism fundamentally changes the individuals' cognitive mode and writing mode of history. As an exploring path and an approach to practice, it opens up a new way for literary creators and cultural practitioners to get involved in cultural crea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New Historicism; perspective; approaches; text; writing

苏轼的生态意识和生存智慧

刘 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46)

摘 要: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却抵达了生存的天地境界。他一生德及草木,恩施动物,有着仁爱万物的慈悲之心。他乐于山林之乐,抱朴守真,过着简单、节俭的生活。他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葆有随缘放旷的精神境界,追求内心的安适和自由。苏轼戒杀生、尚素朴、与天同一的生存之道,蕴涵着万物平等、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关键词:苏轼;生态;生存智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09-06

冯友兰曾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类,其中,天地境界乃人生至高境界。冯友兰认为:"处于天地境界的人有着高度的觉解,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做他应做的事。"[1]500真正觉解的人参天地,赞化育,做一个对整个宇宙有用的人。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是生命个体身心修养的基本规范,"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生存至境。从这个层面讲,苏轼可谓抵达了生存的天地境界。他性好山水,仁爱万物;生活简朴,精神富足;随缘放旷,性命自得。在宦海沉浮的人生际遇中,苏轼超越了种种局限,最大限度地开掘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最终抵达了触目皆春、与天同一的人生境界。曾繁仁曾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性文化。"[2]3在充盈着生态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苏轼的生存智慧进行生态学的考察,也许并不牵强,尤其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更是必要的。通过探析苏轼的生存智慧,或许有助于人类寻回失落已久的天真、质朴,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理想社会。

一、德及草木,恩施动物

"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这是儒家的生活态度,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3]159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天地之间充溢着化育万物的生命力,它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古人称为"气"。阴阳二气的氤氲化合形成了日月山川、花草树木,当然包括人类。"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天道'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正如山川河流一样,是'大化'合法的存有,是'气'之流动所产生的结果。"[4]因此,"气"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自然"也就成了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有机生命体。苏轼一生"性好山水",自言"身行万里半天下",西起眉山,东至登州,北至定州,南至儋州,一生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北宋版图,他曾自豪地宣称:"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5]2190对自然丰富感知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苏轼,尤其是贬谪之地的荒山野水给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自然山水之间,苏轼感受着春华秋实的生命律动,和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存极境。"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5]437"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5]317鸢飞鱼跃、草长莺飞的生命世界跃然纸上,野桃、溪柳、沙水、鱼鸟,无不生动活泼,生机盎

收稿日期:2018-07-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轼生态型人格研究"(2018-ZZJH-314)
作者简介:刘晗(1978—),女,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然。在苏轼的世界里,“自然”有着天然的生机和意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生生之德”,即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冯友兰曾说,程明道不芟窗前绿草,为的是“常见造物生意”;又于盆中蓄小鱼数尾,时时观之,“观万物自得意”。所谓“生意”“自得意”,即万物的生机。冯友兰还指出,惟对宇宙人生有极高觉解者,才会对天地万物产生一种休戚相关的真情实感,才能得见自然物之“生意”,才能感受鱼鸟虫兽之“自得意”,获得极大的快乐和幸福。苏轼每到一处,无论如何困窘,总是置田舍,广植树。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东坡造雪堂,遍植桑、柳、桃、橘、茶等果蔬草木,真乃一个花果园。绍圣四年,苏轼建惠州鹤峰新居,亦在新居周围广种果木,“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5]2226。诗文形象写出了庭园内外果木繁茂的景象。元符元年,苏轼在海南买地筑屋,美其名曰“桄榔庵”。同年岁末,在屋舍旁边开建了小圃,里面种植了许多草木蔬菜。由此可知,苏轼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家园意识,每到一处,遍植林木,营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草木瓦舍、田园果蔬相亲相迎,感天地之浩然,体宇宙之博大,自觉抵达生机盎然、自在自足、和谐圆满的生存境界。

也许,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苏轼对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洞察,善于了悟自然生命的神奇与玄奥,他从不以异己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已内化为其内在的生命诉求。元丰三年,苏轼在被贬黄州的路上,看到湖北麻城原县令张毅为荫蔽行人在路旁种植的上万颗松树,在张毅离任后不到十年,只剩下不足十之三四。痛惜感慨之余,写下了《万松亭》,表达了爱护植物、保护自然的强烈愿望。苏轼还曾留遗墨“流响”于五祖寺,只因五祖寺弘仁大师曾为破峨山栽植松道,苏轼非常敬仰,游后留下了“流响”二字。苏轼对松树尤为喜爱,从小就喜欢种植松树,一生种松达数万株,在诗文中予以记载:“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岗。”[5]1027“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5]1902

苏轼融入自然,不仅仅是自我生命的内在诉求,而且包含着对天地万物的道德要求和生态责任。方东美曾说:“我们以平等的心情,待人接物,自不难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共证创造生命的神奇。惟有这样,我们在内心深处才能发展一种广大的同情心,把它发现出来,才可以布满大千。”[6]128所谓“布满大千”,即能够感受到内心与自然万物的同情和契合,从而尊重生命,敬畏存在。在自然面前,苏轼懂得“体”。入自然,悟自然,全在于一个“体”字。“体”意味着人类要抛却一己之私,充分扩展自我的同情心,使生命本性得以实现,从而认同万物,保全所有,自觉参与到天地化育的生命场域中。这是因为自然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生命体,人类作为其中的成员,与万物休戚与共,只有善待土地、山川、河流、草木等,确保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才有“返乡”“归家”之感,才能诗意地栖居。

苏轼对动物抱持天然的喜爱和仁慈之情,将悲悯之心施加到所有小生灵身上:“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5]1205“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5]2115充分显示了其仁爱万物的慈悲情怀。苏轼还将自己的仁爱之情落实到为官行政的过程中。在惠州时,他说服亲友出资买下一方陂塘,修建成水面开阔的水库,在其中养鱼养虾,为防止当地民众竭泽而取,还制订了合理捕捞的公约。即使流放到了海南,他仍然四下奔走,广为呼吁,力图改变当地“屠牛事巫”的陋习。当时岛上的原著居民有一种陋习,有病不问医,而是以巫代医,杀牛祷神。结果牛死人也死,烧香等于烧牛肉,于人、于神、于牛都是一场荒唐事。苏轼对此十分焦虑,专门写了文章,并拿去广为传播,力图阻止这种虐牛、害人、渎神的行径。苏轼还喜放生:元丰元年,曾和道潜放生于百步洪边,作诗《次韵潜师放鱼》记之;绍圣二年,于海会院旁做放生池;知杭州期间,疏浚西湖,理由之一便是“西湖是放生湖”……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均是天地造化所生,都有其生存的权力,人类不应为一己之私而轻易杀生害物。史怀泽认为:“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们不能对此不加理睬。我以为,这是在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盏新的明灯,并越来越亮。”[7]2罗尔斯顿也强调,“如果我们的良知能演进到能包容整个生态系统,那一定会是非常高尚的”[8]35。因为“生命应是自然的基本存在样态。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当我们努力捍卫自然时,我们也在试图拯救生命”[9]20。敬畏自然、关爱自然,就是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生命共同体。这样一种人,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

苏轼一生德及草木、恩施动物,有着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怀和宇宙风度。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断花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7]73。这才是最大的“善”,真正的“有道德”。因为“善是保持生命、

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7]9。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完美出发，遵循“以时”和“节用”的原则。“以时”就是遵照一定的时间或季节的限制，要等到动植物自然完成其生长周期或者完成一个生命周期；“节用”就是保持量的限度，不滥伐树木、过度捕杀动物等。“以时”和“节用”是人类对动、植物的仁德，苏轼曾说：“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11]114在中国的《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代典籍中，记载着不允许杀幼虫、胎、夭、飞鸟，不可伐木等一系列生态保护的律令，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人不违农时、爱物节用的生态情怀，至今闪烁着道德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中国古人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道”的具体呈现，人类只有消解对世界的占有欲望与僭越之心，以质朴、率性、虚静之心直面自然，才能在生机活泼的凡常存在中见出造物者的深意。如此，中国古人的爱物节用已提升到了人类个体生存的高度，遵从自然“生生”的秩序和目的，按照天地运行的方式行事，在自我实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葆有自然的自足性、自在性。

二、每加节俭，惜福延寿

苏轼一生始终抱持勤俭的生存理念，过一种简单、素朴的日子。对于物质生活，苏轼要求极低，他曾说：“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10]45要求不多，自容易满足，即使在最为困苦的贬谪时期，依然可以从野菜、清汤中感受到快乐和满足。在黄州，猪肉极为下贱，当地人几乎不食用，经济拮据的苏轼将其买回，精熬慢煮，制作出了今日所谓的美味佳肴“东坡肉”。在黄州，苏轼还发明了“二红饭”。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家人不得不经常吃大麦仁或赤豆，为改善饮食，苏轼将大麦仁和赤豆掺在一起，味道甚佳，苏轼戏称为“二红饭”。苏轼似乎天生有着享受生命的热情和浪漫，善于以欣赏的眼光对待日常而单调的生活，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鱼”等。但如果基于此，将苏轼拉平至“美食家”的行列，则极大消解了苏轼以诗意的眼光对待人生困境的生存智慧，广为流传的东坡美食几乎都是在其生活极其困苦的贬谪时期发明的。但如果我们认为，苏轼素朴的生活方式完全迫于生计，则有失公允。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十分痛恨迫于应酬而狂饮无度、铺张浪费的饮食习惯，称之为“酒食地狱”。元祐年间，苏轼再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时，对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依然极为反感。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在雪堂书下了《书四戒》，作为自己养生的座右铭：“出舆入辇，命曰‘蹶踬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11]2063可见，苏轼将“甘脆肥浓”之物视为养生大忌，提倡亲近自然、素朴简淡的饮食方式。在苏轼的诗文中，随处可见许多有关素食养生的内容，如枸杞、菊花、蔓菁、荠菜、桃花等，均为东坡所喜爱。晚年更是提倡节食减欲的生活：“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11]2371众生生活于世间，以眼、耳、鼻、舌、身等器官与外界接触，生发色、声、香、味、触等感觉，进而产生欲望，生贪婪之心，只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11]1499。惜福，就是要节俭，节约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资源，过一种清贫、简朴的生活。如此，有利于身体的康健。熙宁七年，苏轼知密州，日食杞菊，反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11]351。天然、素朴的生活方式反而获得身体的康健。不仅如此，素朴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精神生态的养护。因为，素朴的生活态度乃生命个体真淳本性的流露。鲁枢元认为：“素者，不染之丝也；朴者，不雕之木也，皆为‘自然而然’者。道法自然，因此‘见素抱朴’即得‘道’。不染不雕即物之本色与初心，素朴于是又具备了原初、本真之义。”[12]257只有在简单、素朴的生活中方能寻到生命的真谛，存在的本源。守“贫”抱“清”成了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特质。因此，真正爱惜生命的人，更乐于“山林之乐”，而非“富贵之乐”，追求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对财富、物质需求甚少，尽享精神的富足和愉悦，以终生感悟自然精神为乐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苏轼称得上独一无二的旷世奇才。他一生留下了《苏氏易传》《论语传》《书传》三部专著，成为北宋“蜀学”的领军人物；他创作了2700多首诗歌，300多首词，100多篇散文，诗、词、文均达到北宋文学的顶峰，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文人画……苏轼毫不掩饰他对文学艺术的喜爱，自称平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作文。鲁枢元也认为，文学艺术可以使人类感受一种奇特的“幸福”，因为，文学艺术是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精神需求，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一种人类生命活动辉煌灿烂的景观。

“其实大多数的奢华生活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反而成为人类向前发展的障碍。谈到奢华与舒适,聪明人实际上过着一种比穷人更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的哲学家都属于此例,他们的物质生活往往贫困不堪,但精神上却很富足。”[13]9鲁枢元提倡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中的高层次的生活”,认为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欲望已让地球不堪重负,应该从人类自身内部调整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也找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作为典范。他认为,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对外部物质生活总是较少地依赖,陶渊明、苏轼、陆游、曹雪芹、托尔斯泰、安徒生、凡高等都在困窘的境遇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和愉悦。物质越是简单,似乎越能抵达通达天地的自由人格,人类如果过分热衷于对外在物质、财富、名利的追逐,就不能站在安贫乐道的境地去审视人类的生活。苏轼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可以将平淡的甚或苦难的人生艺术化、情趣化,从而获得精神的丰赡和满足。贬谪期间,居无定所,衣食无着,遭遇常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困境,食“东坡羹”“二红饭”,还躬耕于田间地头,头戴蓑笠,脚着木屐,下地劳作,与农夫无异,甚至深以为乐。后来身居要职,生活富足,却常常怀念黄州时期的生活。在苏轼心中,京都的亭台楼阁、玉盘珍馐,比不上黄州的小桥流水、菜蔬汤羹。可见,苏轼注重的不是物质层面的丰盛,而是精神层面的丰足。苏轼在素朴的生活方式中获得了生命个体的“幸福”和“安适”。从现实世俗层面看,贬谪将苏轼推至生存的困境,从文化精神层面看,恰恰成就了一个真正丰满、本色的苏轼,从此东坡居士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格典范。由此可见,精神的富足似乎和物质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物质越困窘,精神反而越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问道德,大多旨在引领人裁抑物质生活,抵达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孔子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认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14]87。“孔颜之乐”更成为文人士大夫推崇的至高生存境界。许多文人士大夫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却乐在其中,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人性的温暖,这是真正的“富足”。老庄也推崇守“贫”抱“清”的人格。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5]176尚俭、尚朴、忌奢、忌盈成为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庄子看来,“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16]797。物质之丰盛反而对人有害,“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16]406。从现代生态伦理角度来看,过于奢侈的生活不仅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也注定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生态资源的枯竭。大自然以能量守恒为准则,够用就行,多则费。在大自然中,不存在无用的东西,也没有过分的东西,一切都恰到好处,只要够用就好。人类作为自然之子,理应生活简朴,约束自我的欲望,对自然万物抱持非常节制的态度,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11]6其实,人类生命个体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和能量都十分有限,生活简朴,精神富足,才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因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天地万物的价值实现是完全一致的。当代深层生态学者主张实现“轻踩大地”的生活形态,提倡居住在一个简朴的、原生的“小区”里,使消费和物质需求达到最小,尽可能使人类的生活对其他物种的影响降到最低。正如格里芬曾说:“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平衡。”[17]94因为,“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8]53。人类只有以平等、共生为理念,才能真正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生态位,从而调整自我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才能最大限度保全自然的多样性、完整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岔路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素朴、简约的生活方式,以“自然”为宗,以“够用”为好,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和消耗,使人的生命法则同于自然法则,让生命在自然中流转、展开,实现生命在现世的安顿和超越。

三、性命自得,与天同一

在遇赦北归途经金山寺时,苏轼曾自题画像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5]2303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居留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是苏轼遭遇人生困境的时期,也是苏轼一次又一次实现精神突围的时期。苏轼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无论凤翔、杭州、密州,抑或居京在朝,始终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坚守“以民为本”的仁政主张,为官一方,造福人民。“乌台诗案”似乎取消了苏轼所有的价值和信念,他饱满、坚实的精神世界遭遇生平第一次困境。在黄州,苏轼渐渐洗去了个体形迹的尘垢,也洗去了内在的分别之心,使自己从功名利禄的羁绊中逐渐解脱出来,在困苦而真实的生活中抵达生命的本源、存在的真实。无论《东坡八首》,还是《赤壁赋》,都充分展现了苏轼超越外在、乐在“心安”的旷

达襟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1]6 苏轼取消了对峙,消除了差异,将个人之悲喜、人生之沉浮放置于大化流行的自然中,不再执着于一时一物之得失,从容走进一种自然、自由的生活,在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中开掘了更为广阔的心灵境界。不得不说,这是苏轼的伟大之处。当再次被贬到更为荒远的惠州、儋州时,苏轼对人生的体悟更为本真、通透、深邃,将他人视为“地狱”般的生活过成了“天堂”。儋州,自古被称为“蛮荒之地”“瘴病之地”“鬼门关”,自然成了贬谪之人的畏途。据统计,唐代贬谪到海南的共有 27 人,宋代有 29 人。唐代贬谪海南的官吏中,最著名的是李德裕。李德裕被贬往儋州时已年过六旬,不到一年,李德裕便在忧愤交加中逝去。苏轼被贬儋州时,年岁与李德裕相仿,同样面临着“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困难处境,却在离开儋州时,深情地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5]2363 此时,丰富、本色、诗意、旷达的苏轼人格才真正完成,最终抵达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得、自适、自由的人生至境。常人把遭遇贬谪视为人生中的大不幸,而苏轼却将其视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因为正是在贬谪生涯中,苏轼得以在持续推进的“洗心”过程中,一步步完成了内在精神世界的超越,抵达心无挂碍的至高境界。

如果单从生命个体的日常情感来看,顺境则欣喜,逆境则困苦,这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也是人类生活之现实。但自然流转不息,世事沉浮盛衰,此乃天道、人道。荣与辱、穷与达、出与入,以“道”视之,全然没有本质的不同。人生如寄,风雨也好,晴天也好,都是生存的外显形式,属于生命中应有的不同状态,且瞬息万变,相互转化,又何必执着。如此,黄州、惠州、儋州,只是生命存在的自然境域;外在事功、山林之乐,也都只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样态,当超越了穷达、荣辱的分别和对待,就完成了对存在的超越、对价值的超越,全然回到与自然精神合一的自我,真正抵达随缘放旷、性命自得的至高境界。苏轼知密州时,密州连年灾荒,身为太守的苏轼也只能到郊外采摘枸杞、甘菊充饥,还为此写了一篇《后杞菊赋》,说道:“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11]4 所谓的贫富、美陋之别皆因人类的一己之私,世间万物即生即变,方成方毁,哪有一刹那的停驻。贵贱、荣辱、穷达、得丧、寿夭皆为生命的色彩,共同构成了整一的生命存在,且相互转化,流转不息,当破除了执念和偏私,就会以阔大的心胸坦然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际遇,无论苦痛、欣喜,经过岁月的打磨和心灵的过滤后,最终都会化为生命中最为醇厚的那抹静美,就都无须介怀了。苏轼一生历经贬谪,却始终以一颗超绝、旷达的心直面生命中的风雨阴晴,泯灭一切人为的对立和分别,内在与外在,此岸与彼岸,过程与结果,有限与无限,在生命个体自由的心灵里完成了统一,抵达了“心安”的生存至境。因此,苏轼的“心安”,绝非仅仅是身处困境中回归内心的自我安慰,而是穷达皆适的一种高贵品德和独立人格。在变动不居的生存世界里,苏轼始终追求一种“珍视自身的生命存在,努力超越种种窘逼和限制,执着于生命价值的实现,获取生活的无穷乐趣和最大的精神自由”[19]53 的诗意人生。

穷达皆适的人生境界有赖于苏轼淡泊虚空的精神世界。只有内心虚空,才能无往而不自得,坦然应对人生的各种磨难,保持精神世界的平衡,真正做到“任情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11]1671,完成对现实存在的超越,抵达超脱旷达的人生境界。王耘认为,“虚空”于心而言,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合于本体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与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自然是一体的,在“虚”中生出“实”,构成了世界。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尽在虚空中,乃自然全有,如果人类以一己之私“挟物”或“释物”,均不能“虚”,不能“安”。人类生命个体只有克服“小我”,超越行迹和欲望的牵绊,才能葆有人性的天然、真纯与素朴,“虚空”万物,“静观”自然,在与天地万物相遇相成中抵达“天全”的自由境界。苏轼有诗曰:“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5]673 苏轼凭着过人的智慧自觉将自我融入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自然中,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同体,抵达“天全”。“天全”就是物我相忘,天然自得,与天同一。这是一种天地境界。处于天地境界的人才真正走向成熟,完成了自我实现。

当代深层生态学家阿伦·奈斯认为,人类生命个体的自我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的自我;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只有达到形而上的自我,即生态自我的阶段时,才能自觉将个体生命融入到所有生命的自然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同一。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着内在的契合。中国古人相信:天、地、人共同处在一个相互交错、彼此影响的生命环链中,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万物化生”不是简单地物物相加,而是阴阳、刚柔、乾坤、天人之间的交感呼应。在人的身心结构中,存在着将自我发展为与天地合

一的真正潜能和巨大可能性,即自我精神和自然精神的合一。因此,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正如钱穆所说:“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地配合着讲……‘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20]这是一种有机整体、普遍联系的宇宙观。李约瑟称之为“有机的自然主义”。苏轼之所以能够使自我生命与自然精神融为一体,完全有赖于他的天地之心,而非一己之心。正是有着对自然生命的独特感受和对自然精神的深刻体悟,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苏轼总能将自我深植于自然之中,参与自然生命力内部的共鸣,使心灵与自然节律交感、共振,从而在尽物性、尽人性中抵达“天人合一”的生存化境。

参考文献:

[1]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曾繁仁. 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蒙培元. 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杜维明. 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J]. 世界哲学,2004(1).

[5]苏轼. 苏轼诗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方东美. 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7]阿尔贝特·史怀泽. 敬畏生命[M]. 陈泽怀,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8]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M]. 刘耳,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9]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 庄晨燕,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

[10]苏轼. 东坡志林[M]. 刘文忠,评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鲁枢元. 陶渊明的幽灵[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3]亨利·梭罗. 瓦尔登湖[M]. 田伟华,译.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14]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王弼注. 老子道德经注[M]. 楼宇烈,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17]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8]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19]王水照. 苏轼研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0]钱穆.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 中国文化,1991(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u Shi'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Survival Wisdom

LIU H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Su Shi arrived at the realm of existence in hardship life. He was benevolent to all creatures and showed sympathy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plants and animals. He lived a simple life and enjoyed spiritual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He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and pursed the freedom of the soul. H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was full of ecological wisdom.

Key words: Su Shi; ecology; survival wisdom

老舍在文学史叙述中的流变

——以20世纪30—70年代的文学史编纂为例

张 引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00)

摘 要:在1930—197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老舍的地位呈现出高开低走而又逐渐上升的趋势。1949年以前的文学史,对于老舍的评价较为客观和平和,也能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对作品提出独到的见解。对于其"幽默""讽刺"的创作风格尽管褒贬不一,但并未以此否定其作品的思想性;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前,大陆的文学史叙述中,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规约,老舍在文学史中的意义与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新时期,从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老舍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又得到关注。通过考察50年来老舍在文学史叙述中的流变,可以发现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视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此后文学史中关于老舍的书写。

关键词:老舍;文学史;流变;1930—1970年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15-08

一、1949年前文学史中的老舍

关于老舍研究最早的文字可以追溯到1928年10月《时事新报》所刊登的两则广告,这两则广告是为了推广老舍刚刚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从这两则广告中可以概括出老舍给文坛带来的"新意"是"讽刺的情调"与"轻松的文笔"。从此以后,老舍逐渐被文坛所熟知,关于老舍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多。[①]而老舍正式进入到文学史的叙述范围之内,则是在1933年由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以下简称《运动史》)中。《运动史》是"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1]32,以五卅运动为界,将新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老舍的创作被放在第二期(第六章)中介绍。《运动史》认为,老舍前期创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的共同点是"在作风上还保持着讽刺的风味,所描写的对象,仍不外顽劣古旧的人物"[2]225,并且对于这些作品从创作态度、人物性格、情节处理等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总括起来说老舍所持的创作的态度,是以夸张的、诙谐的、讽刺的笔锋,暴露中国腐败的社会,揭破一般愚蠢陈旧的人物的面孔,并向中国旧礼教旧风俗的壁垒上施以猛烈的攻击。他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很逼真动人,而处理如此复杂的情节,使之线索分明、从容不迫地发展,使人读了不觉得冗长与紊乱。就作风上说,在当时讽刺小说也不是没有,然像这样雄宏的气魄,冗长的题材,巧妙的诙谐,除了老舍的作品以外,尚找不出第二人。只就他打破当时一般作家的成规,另向新的风格方面创作而论,已经值得我们的佩服了。"[2]225可以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书写中,很难再见到对于老舍前期创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

在《运动史》出版十年后,194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中,只是在第五章"小说"的"第一派"中写到了老舍。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在论述新文学

收稿日期:2018-06-10
作者简介:张引(1991—),男,河北张家口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发展二十年来(1917—1937)的小说创作时,既没有给重要作家设置单独的章节,也没有按照文体(长篇和短篇)和时期来分类,而是选择"就作家们的派别来叙述"[3]85。但较为特殊的是,他并没有按照文学社团来划分作家创作,而是"就他们的作风"将这20年来小说创作概括为四个派别,而把老舍归为"以鲁迅叶绍钧作代表"的第一派里,这一派里的其他作家还有许钦文、王鲁彦、沈从文、黎锦明、冯文炳、王任叔等。李一鸣认为"他们取材是古老社会里的人物,大都用讽刺或幽默的笔调写出,他们纯粹是写实主义者,他们的手法,平淡而冷静的"[3]85。在这一派里,老舍和沈从文是除了鲁迅与叶绍钧之外,作者给予较多篇幅来论述的作家,但是往往引用小说原文就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篇章,这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的一个论述模式。在老舍的论述部分中,李一鸣对其创作的讽刺风格评价不高:"讽刺不免流于恶谑,不及鲁迅那样的深刻";但肯定了其语言的爽朗风格:"文字完全近于口语,爽朗得异常呢。"[3]85李一鸣在一些基本史实方面显然没有做过细致的考究,比如他认为老舍"好像是山东人"就犯了一个基本的史实错误。由于"范围的限制,材料的缺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所述的文学史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止,因而并没有涉及到抗战文艺的发展。而弥补了这一缺陷的,是蓝海(田仲济)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以下简称《抗战》)。

在史实考证和史料搜集方面,蓝海相对于李一鸣显然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作者在后记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写这本文学史的意图:"写这个小册子的目的便是企图弥补一部分缺陷,保存一部分史料,使它不至于全部失散。"[4]474而且蓝海作为"从头到尾亲身经历了那个伟大的时代"[1]71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研究抗战文艺时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史料,更是生活与亲历的见闻,这使得《抗战》中保留了不少有时代氛围的史实,给人一种极强的代入感,也增加了对那个时代的感性认识。正是由于作者这种战争亲历者的写作身份,以及在写作时较少受到建国后那种意识形态的规约,使得他对于一些现象和问题的思考能够从历史真实出发,"从占有事实开始,从事实引出判断"[1]71。以老舍为例,《抗战》对于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协"工作与文学创作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相对于建国后的文学史书写,对老舍1938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并在"文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史实的只字未提,《抗战》对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客观的还原:"'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实际是'文协'的主要负责人。老舍是最适宜的人选,也是两党都能够接受的,这事是周恩来同志苦心安排的。"[4]34而在涉及其创作时,《抗战》既没有刻意忽视老舍的成就,对于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选择性回避。全书有四个章节提及了老舍的战时写作,分别论述了老舍的通俗文艺、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的创作。

在论述其通俗文艺时,《抗战》指出,"老舍是当时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的最热心的人",进而认为《王小赶驴》是"他利用民间文艺形式表现抗战内容的较好的作品"[4]79,并且引用老舍的创作谈来总结其通俗文艺制作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抗战》把老舍的小说分为长、短篇两个部分论述,长篇论述了《骆驼祥子》《火葬》和《四世同堂》。《抗战》认为后两部小说尽管都"洋溢着抗战时代的浓厚气氛"[4]208,但《火葬》并"不是作者成功的作品",而《四世同堂》的主题思想与艺术表现俱佳。不过蓝海同时也指出由于"作者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对实际生活缺乏深刻的感受和体验,影响了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4]209。而在这里把长篇《骆驼祥子》归为战时小说略有不妥,对于《骆驼祥子》"写于抗战爆发前后"的判断实际上是有误的。事实上,老舍在1936年夏天就开始创作《骆驼祥子》了,同年9月16日,作品就已经在《宇宙风》第25期开始连载,至1937年10月1日第48期续完,并于1939年3月和1941年11月分别由人间书屋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骆驼祥子》是写于抗战前,而发表于抗战前后。

在论述老舍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时,《抗战》把目光投向了老舍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并把它放在了第六章第四节"黑暗的暴露"中。在这一时期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里,张天翼的《速写三篇》显然在文学史中的名气更大。而蓝海则敏锐地注意到了老舍的这篇"冷门佳作",给予了"写得非常出色"的评价。在之后的文学史书写中,除了王瑶的《史稿》以外,很少再有文学史提及过这部小说。另外对于老舍的戏剧与诗歌创作,《抗战》也有所提及,并在肯定这些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蓝海的《抗战》是第一本较为全面介绍老舍战时创作,以及对其创作给予充分肯定的文学史著作。在一些论述方面,这本书深刻地影响到了建国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该书关于老舍部分的很

多观点和句式都明显保留着《抗战》的痕迹。

二、1950—1970 年代文学史中的老舍

（一）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老舍形象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对老舍的文学创作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在全书的二十个章节中，有五个章节提及了老舍。这部文学史结构严整、宏伟、有气势，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革命四个时期的论述，将新文学分为四个阶段：1919—1927、1928—1937、1937—1942、1942—1949。每一个时期，《史稿》均设五章，分别评介文艺运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在每章之下，又将作家作品分别归纳为若干节。由于该文学史没有给作家设计单独章节，而是把这些作家放在每个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中来考察，所以老舍的文学创作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散落在不同的章节之中。《史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较少对作家的单篇作品、甚至是作家著名的代表作品作出细致的评析。但这恰好能真正凸显出王瑶的学术功力来，他所擅长的是对作家创作特点的高度概括，“评论创作言简意赅，很有概括力，往往能比较准确、精辟地概括出某些特色”[1]89。对于老舍创作特点的评论同样如此，有不少观点至今仍对读者有启发性，也影响了后来文学史的写作。

在《史稿》中，老舍首次出现在第二编：左联十年（1928—1937）中的第八章，“多样的小说”里第四节“城市生活的面影”中。在这一章中，王瑶对老舍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几乎逐一介绍评价，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关于早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王瑶肯定了老舍的讽刺风格，但由于“笑料太多，描写也过于夸大，讽刺便有点失去了力量”[5]267；而结构方面“过于松懈”，“每章开始总有很长的解释”[5]267，王瑶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老舍受到旧小说影响很深的缘故。他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对《骆驼祥子》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思想内容方面，“通过祥子的悲剧，作者深刻地揭露了那个社会的罪恶，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艺术形式方面，“善于用明畅朴素的叙述笔调，幽默生动的北京口语，简洁有力地写出富于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和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写实手法的运用和语言的凝练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不足之处在于“时代背景描写比较薄弱，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重大变化缺少联系，故事的结局是低沉的”[5]270－271。受《史稿》的影响，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阐释《骆驼祥子》几乎成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固定的阐释模式。直到新时期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才开始从这种思维定式中脱离出来，尝试从更多的角度来对《骆驼祥子》进行阐释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老舍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王瑶不仅给予了关注，还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比起以上这些长篇来，短篇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中的一些小说倒有写得很好的。”[5]268

此外，《史稿》还对老舍抗战时期的长、短篇小说、通俗文艺创作、抗战戏剧，以及长诗《剑北篇》等进行了逐一评述。王瑶并没有因为这些作品是服务于抗战宣传就不加分析、盲目地给予正面评价，而是以艺术性的标准来对作品进行客观地品评。在小说的相关章节中，王瑶尽管认为“作者的这种爱国热情和追求现实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而且也的确收到了鼓舞读者的效果”，但对老舍长篇小说《火葬》的艺术性评价不高，“不算怎样成功”[5]439；相反，对于老舍战时的各个短篇小说，王瑶却评价不低，“他的各个短篇也都刻有战争的烙印，精神都很健旺”[5]26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关注到了《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个老舍以往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并认为“嘲讽是非常有力的”。笔者认为，王瑶的这番评述大概是受到了评论家李长之的影响。后者曾在 1944 年《时与潮文艺》的第 3 期上发表题为《书评副刊：贫血集》的评论文章，对老舍写于抗战时期的五部短篇小说进行了评论，并认为这五部作品“都有着战争的烙印，都有着新的体验和新的智慧，文字上都超过了干脆俏皮而入于坚实硬邦，一点也不油滑”，“作品并不贫血，反之，却很健旺”[6]。在这五部作品中，李长之又推崇《不成问题的问题》为“最佳”，是当中最为“坚实”的一部。如果我们对比来看王瑶和李长之的评论，这其中的相似性就不言自明了，也似乎可以认为王瑶在写《史稿》的时候，的确是参考过李长之之前的评论的。

除了老舍在战时的小说创作，《史稿》还关注到了老舍为数不多的诗歌写作。关于老舍 1940 年创作的长诗《剑北篇》，王瑶认为“读起来太铿锵了，铺叙得也过于零碎，似乎反而受了民间形式的束缚。一到歌颂抗战的句子就又不能不陷于说明，诗的力量就比较减弱了”，但王瑶仍然指出其“尝试的精神仍然是很可宝贵的”[7]425－427。同样，在论述老舍的戏剧创作时，王瑶也是在充分肯定其“严肃地为抗战文艺努力贡献自己能力的精神”的大前提下，指出了老舍戏剧的诸多问题，比如，“情节太简单，动

作太少,演出的效果不算好",“主题过于抽象……因此人物也几乎成了抽象观念的代表",“舞台动作安排的还不够熟练,主题的思想性也未能很深入"[7]449-500。应该说,王瑶在评价作品时,同时顾及到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而没有单纯地以思想性的强弱来作为评判作品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史稿》对于《四世同堂》的评价,在第四编第十八章中的“腐烂与新生”一节。这一节主要介绍1942年以后的国统区小说。王瑶在介绍具体作家作品之前,对于这个时期国统区的小说创作有过这样的概述:“这些作品反映了国统区的现实,旧的腐烂的统治势力灭亡前的挣扎,和方生的新的人民力量的成长。"[7]690但是若以这个标准来看,老舍的《四世同堂》实际上是以沦陷后的北京为背景的,它并没有“反映了国统区的现实",而是反映了沦陷区的现实。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的瑕疵。尽管这样的划分有些不妥,但王瑶对于《四世同堂》艺术价值的评价与判断大部分还是中肯而到位的,比如他既肯定了其“结构匀称”“对话传神",“对暴露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统治是有效果的"等优点,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回避。他认为:“书中的人物也多少有些类型化了;汉奸都是小丑,面善良的又几乎都是无力的。"[7]691-692王瑶的评价是准确的,他所描述的实际上是老舍作品中一直存在的通病,即对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描写都不到位,缺乏深刻性。老舍最擅长描写的其实还是那些所谓的“老派市民",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保守、中庸、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老中国儿女"的落后国民性;但他们也不乏优点,老舍对于这些人是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所以诉诸于笔下的时候很容易把他们写得精彩,让人信服。而一旦涉及到“新派"和“正派"人物的描写,老舍却总是容易陷入“漫画化”“标签化"的陷阱之中。当然《史稿》中有些评论却有失偏颇,比如王瑶认为《四世同堂》“对于人民力量的坚持奋斗方面写得少了一点……如果能把城外人民抗日武装的活动和城内斗争呼应起来,那不仅可给读者以更大的鼓舞,而且城里的那些善良不屈的人物也可写得更有力量一些"[7]691-692。黄修己就认为,这种“把写了什么或没写什么作为衡量成败的重要标准,并且贯彻全书,便造成对不少作品的批评失当"[1]91。

总的来说,王瑶的《史稿》对老舍的文学创作还是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尽管这其中存在着以是否符合革命潮流来评价作品高低的倾向,比如在总结老舍前期的小说创作时,因其作品和当时的左翼文学潮流有一定距离,而批评其“思想性是比较薄弱的"。但在大多数时候,王瑶还是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文本出发,来对老舍作品的独特性进行把握,发掘优点,对缺陷也绝不回避。之所以说其全面,是因为相对于后来文学史中过于关注老舍的小说创作而忽视其他文体创作的现象,王瑶的《史稿》显然对老舍的创作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把握,论述涉及到了他的长短篇小说、诗歌以及话剧,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原给读者一个更为全面的老舍形象。但《史稿》并未对老舍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进行必要的介绍,而且对于老舍在“文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只字未提,明显有违历史的真实,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史略》与《初稿》中的老舍形象

在王瑶的《史稿》之后,还有一些文学史也相继出版,比较有名的有1955年7月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同年10月出版的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以下简称《史纲》),以及1956年4月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由于王瑶的《史稿》在1952年受到批判,批评者普遍认为《史稿》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性、思想性不强,“对无产阶级对于新文学的领导,包括思想影响、组织领导等,都说得很不够"[1]94,所以对于接下来文学史的编写者们来说,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在编史过程中鲜明地表现出“正确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背景下,王瑶《史稿》之后的文学史著作,无论是《史略》《史纲》还是《初稿》都开始大幅度向政治倾斜,向革命史靠拢,文学史书写的政治化趋势也愈加明显,“在文学史编写中也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1]97,在这种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对于老舍的文学史评价也自然而然留下了这种“政治化"的痕迹。

在丁易的《史略》中,首次以作家的政治态度而不是文学上的影响来给作家划线。在这种划分标准下,老舍被列入了比“革命作家"更低一等的“进步作家"的行列之中。虽然作者对于《月牙儿》《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批评它们对“前途看不出一点光明",比起那些“站在革命立场来从事写作的"作家来说,老舍“积极的政治意义却是不及前者来得大"[8]78。不难看出,这一阶段新文学史编纂的鲜明的“政治化"痕迹。而刘绶松的《初稿》是“清算胡风、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以更加‘正统’的姿态出现的一

部教材”[9]100。他写这部文学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力图让《初稿》更加政治化,“更能显现新文学发展作为阶级斗争历史的‘规律’,也更加富于战斗性、批判性和排他性”[9]100。

《初稿》大体上也采用了王瑶《史稿》的“按文体分章、按文学史发展时期分编”的编写方式,并没有给予重要作家单独的篇章。关于老舍的论述也同样分布在不同时期的章节当中,但相对于《史稿》来说,涉及到老舍的篇幅已经大大缩减,如果说王瑶的《史稿》还算较为全面地涉猎了老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创作,那么《初稿》对于老舍战时的戏剧和小说创作却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对于老舍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则只字未提。而且由于“政治化”写作模式的需要,对于老舍的评价也很难再像前者那样做到客观与公正。关于老舍的论述,首次在《初稿》中出现是在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判”中,这一章主要介绍这一时期(1927—1937)的小说创作。从这一节的题目可知,《初稿》把老舍放入这一节中,是肯定了老舍对于“腐旧的社会生活中某些灰暗的角落”的暴露与批判的,但同时也认为老舍的思想性不强,“缺少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的正确思想”[10]362。而《骆驼祥子》尽管表现出了老舍“对于集体主义的赞成和向往”,较之以往也显示出了“作者思想的进展”,但是《初稿》仍然认为“故事的结尾太低沉了,太阴惨了”,看不到发展的前途。对于老舍这一阶段在创作中体现出的“幽默”风格,《初稿》是不假思索地持批判态度的,“因为作者是那样‘抱住幽默死啃’,‘油腔滑调’不免遗给作品以浮浅的毛病”“他的‘故示宽大’的‘幽默’作风,损害了它,冲淡了它”,而《初稿》肯定《骆驼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没有作者所一贯具有的‘油腔滑调’的毛病”[10]363。

《初稿》在“绪论”中强调研究新文学史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观念”,这也可以看作是《初稿》基本的文学史观:一是“划清敌我界限”,凡是“反人民的作家”,就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二是分别主从,即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三是把对鲁迅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上来。所以和丁易的《史略》一样,《初稿》在严格遵循“分别主从”的要求的前提下,在论述老舍30年代的创作时,也把老舍放在了比“革命作家”低一级的位置,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支有力的同盟军”[10]324的一员。另外,由于抗战时期老舍是以国统区作家身份进行创作的,而《初稿》对于国统区的创作又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国统区的作家,如所周知,是在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之下进行创作的,因此,在小说创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向。”[10]449《初稿》在评价老舍抗战时期的创作时,就必然会受到这种潜在意识的影响,进而导致无法全面、客观地对老舍的创作进行把握和认知。比如在评价老舍的《四世同堂》时,《初稿》就这样写道:“但也由于作者生活幅员与思想水平的限制,这部作品也同国统区其他许多小说创作一样:还不能本质地描写时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黑暗的暴露多,光明的描绘少。”[10]608“黑暗的暴露多,光明的描绘少”,这种对于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指手画脚,诸多苛求,其实并不符合该书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9]103。

正是因为老舍一直不属于刘绶松所推崇的“革命作家”的行列,所以他在评述老舍时就总会先入为主地判定其“思想水平”不高,这似乎已经成为了论述者的一个僵化思维定式。实际上,认为国统区的作家创作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是《初稿》中对国统区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评价逻辑。《初稿》认为,文学创作客观上的限制主要是由于国统区作家们“所处的环境的确是太黑暗艰难了”,“在反动统治下面作家缺少深入生活的自由”;而主观方面的限制则是因为国统区的作家们没有能够像解放区的作家们那样,“直接地受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与加意培植”[10]452,“没有掌握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缺少观察生活和理解生活的正确思想武器”[10]377。这样一种认知逻辑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并没有坚持从作家的具体作品出发,通过分析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客观、真实地呈现出作家作品的面貌。这种文学史的编纂实践,“不顾历史事实,理论为先。实是政治为先,按照政治的要求来描绘、阐释历史,实际上歪曲了历史”[1]108。国统区的作家,自然包括老舍在内,都在战争时期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力能扛鼎之作,其水平并不亚于甚至有些超过了解放区文学的整体水平,但《初稿》却置这些历史史实于不顾,尤其是对于老舍这样一个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总务长,对于抗战文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不仅没有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他领导“文协”这一史实竟然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③相继出版。出于实际教学的需要,这些文学史

加强了对作家作品的论述,老舍的《骆驼祥子》由于成为日常课程教学的范文,这几本文学史对于这部代表作的论述也进一步深化。尽管这些文学史开始给老舍设置了专节来论述,但其地位仍然被排在“革命作家”的“民主主义作家”或“进步作家”之后,可以说对于老舍的总体评价仍然几乎没有进展。

(三)“唐弢本”中的老舍形象

“文革”结束以后,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是唐弢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唐弢本”)。1979 年 6 月,该书的第一卷问世,接着于 1979 年 11 月和 1980 年 12 月陆续出版后两卷。这也是“文革”后第一部总结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唐弢本”对老舍的叙述分别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在“唐弢本”第二卷中,把老舍与巴金、曹禺一起放在第九章中叙述,而在排名顺序上,老舍已经被排在了曹禺的前面。而在之前的一些文学史版本中,老舍的文学史地位并不高,他的位置或被放在曹禺之后,或在洪深之后,甚至有的还在胡也频、叶紫、殷夫以后。另外,尽管老舍仍然没有在这本文学史中单独成章,但其篇幅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从这些细微之处隐约可以察觉到老舍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逐渐被重视起来。

在“唐弢本”中,一个明显的改变之处就是出现了以往很少被写入文学史中的“作家生平介绍”的内容,作者运用大量的具体事实,很形象也较为全面地勾勒出老舍的生平和思想发展历程。“唐弢本”提及了老舍“满族人”的身份并强调他“出身贫寒”“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的经历,认为“这些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11]780。对于老舍最初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唐弢本”也进行了相应的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唤起了老舍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 1924 年去英国教书以后”[11]780。对于老舍在抗战爆发以后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的历史史实,也进行了还原,而没有像之前的几本文学史一样选择回避与遗忘。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弢本”中,特意强调了老舍在 1939 年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这一事实,这也是相对于以往文学史书写的一个独特之处。总之,所述老舍之生平,专业的研究者也许觉得并无新意、独特之处,但却是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必须要掌握的知识。掌握了这些 ABC,才能为进一步学习、研究老舍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种加入作家生平的文学史书写完全符合教材要求,同时也是历史著作应该有的写法。

“唐弢本”对于老舍前期的创作评价并不高,认为这些作品尽管“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但因为老舍当时以“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11]780-781。这种批评模式沿袭了建国以后的文学史对于老舍创作“幽默风格”与“思想内涵”之间关系的一贯认知,它们大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老舍幽默的文风影响了其思想性的深度,这也是老舍前期作品不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唐弢本”对于其后期作品的评价明显高于前期,认为老舍 1932 年至 1936 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风格和内容确实在逐渐发生变化”,体现在“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结构也较前精炼紧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展”,这是由于老舍“对于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识”[11]780-781 的缘故。“唐弢本”花大篇幅论述了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细读,尽管其中很多观点明显保留着前人文学史中的痕迹,但也不乏自己独到的见解。

“唐弢本”在最后总结老舍创作时指出了其作品“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影响,主要是取其幽默风趣和用语力求机智俏皮的特点”,体现出研究者的国际视野;而且开始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把握老舍创作的独特性,指出老舍的作品不仅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读者”,而且还有“较高的国际声誉”[11]790,这些均体现出老舍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的一个事实。

三、关于老舍文学史书写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回顾与考察老舍在将近 50 年的文学史书写中的流变,笔者发现其中存在着这样几个普遍的问题:

(一)因袭前人评价多而鲜有新发现

在文学史书写过程中,有时因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所以后来文学史书写的观点与模式就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导致对于作家作品的论述多呈现出“重复书写”的现象,而鲜有新观点的发现。例如,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尽管只是对老舍战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但其论述的大体框架和价值观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启发很大,也为后来老舍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建国以后出版的几本文学史,在描述老舍创作、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创作时,基本上都是按照蓝海的思路进行

的,而很难有所突破。例如,王瑶的《史稿》对老舍战时小说、话剧、诗歌、通俗文艺以及报告文学的论述,就基本沿袭了《抗战》的观点与写法。而王瑶的《史稿》,也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后来文学史的写作。比如在《史稿》之后出版的《史略》与《初稿》中,都以是否符合革命潮流的标准来衡量老舍的创作,并认为老舍的作品的思想性普遍薄弱;而对于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阐释与解读,基本上也都是按照《史稿》中"社会批判"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论述与阐释,很少有采用其他研究视角对《骆驼祥子》得出新的结论,发现新的问题的。总的来说,建国前的几部文学史(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的独创性,较之建国后要更强一些,作者的个性也能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建国之后,尤其是50—7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受政治的影响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编纂者往往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与观点,对于老舍的书写也就往往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况。

(二)对于老舍散文创作重视不够

1930—1970年代的文学史对于老舍在散文方面的成就有所忽略,重视不够。尽管老舍以小说见长,散文创作并不多,但对于老舍这样一个写作的"多面手"来说,"散文创作"应该在老舍的文学史书写中占据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大陆文学史的编纂者对于这方面的重视不够,反而是1979年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司马长风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中,专列一节,讲述老舍的散文创作,并给予了"几乎篇篇都是佳作"[12]138的极高评价。

(三)对老舍生平资料介绍不够

除了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外,在这之前其余文学史中都没有对老舍的生平进行详细的介绍,关于老舍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其满族旗人的身份、其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以及1926年在英国经许地山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史实,我们都无法从文学史中获得;甚至从建国以后到新时期之前的文学史书写中,对于老舍在1938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职的重要史实都缄口不提,不得不说是有违"史家精神"的,也使得人们无法从文学史中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的老舍形象。

(四)对于老舍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知与挖掘

除了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对于老舍"夸张、幽默、讽刺"的文风给予了充分肯定之外,后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文学史书写中,普遍认为老舍的这种幽默的文风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即使是像《骆驼祥子》这样不再"具有'油腔滑调'的毛病",也会因为没有设计一个光明的结局、没有过多地与时代相联系而受到指责与批评。另外,在章节的编排上,老舍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自成一章"的待遇,甚至有时还因为自身不是革命作家身份的缘故被排在极为靠后的位置,这显然与老舍的实际创作水平是极不相称的。随着新时期以后老舍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老舍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也逐渐得到了提升,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艺术贡献也开始被人们广泛熟知。

注释:

①除了文中提及的《时事新报》的两则关于老舍小说的广告,最早研究老舍的文章是朱自清以"知白"为笔名于1929年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1930年代随着老舍创作的日趋成熟,关于他的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李长之1934年1月发表于《文学季刊》的《离婚》、赵少侯1935年9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尹雪曼1936年9月发表于《文艺月刊》的《老舍及其〈离婚〉》等。

②比如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就从"现代文明病"的角度对《骆驼祥子》进行重新阐释,认为这部小说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4页;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论者则注意到了《骆驼祥子》中的象征意义与隐形结构,并指出文本中含有风月宝鉴的色戒成分,最终要揭示出"色便是空"的大结局。参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376页。

③这些文学史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初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和文学史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2]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 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
[3]李一鸣.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M].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3.
[4]蓝海(田仲济). 中国抗战文艺史[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5]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6]李长之. 书评副刊:贫血集[N]. 时与潮文艺,1944 - 04 - 27.
[7]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8]丁易.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9]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刘绶松.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1]吴怀斌,曾广灿. 老舍研究资料(下)[C].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12]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M].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Narrative Evolution of Lao She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Taking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n 1930s—1970s as an Example

ZHANG 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narrative change of literary history during 1930s—1970s, it is found that Lao She experienced a status tendency that flied high first, stayed low later and then gradually went up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is period. In a relatively free and relaxed environment in literary history before 1949, criticisms on Lao She seem to be more objective and moderate. And unique opinions about works, which were given after carefully reading the texts, could be seen.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praises and criticisms on his "humorous" and "satirical" writing style, they do not negate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his works.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mainland,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Lao Sh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have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vention of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the unique value of Lao Sh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since the publishing of Tang Tao'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eanwhile, through the study of Lao She's evolution in narr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during these 50 years, a couple of problems in compiling literary history could be found. Facing these problems and trying to solve them would be extremely helpful for the subsequent compilation of Lao She's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Lao S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evolution; 1930s—1970s

王国维学术研究方法类型初探

孟 勐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王国维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提倡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国维作为开风气的大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学术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哲学研究到文学戏剧再到经史之学,王国维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除了与他的天资和勤奋有关外,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二重证据法、阙疑法、系统研究法、分类归纳法、阐发研究法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当今的学术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阙疑法;系统研究法;分类归纳法;阐发研究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4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23-04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这么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1]陈寅恪其实谈的是学术创新的问题,以我们今天的理解,创新应不仅包括研究对象广度和深度的开拓,也应包含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的研究方法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研究方法中轻归纳、不求实证、缺乏怀疑创造精神的局限暴露出来。近代学者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对新思想方法的传入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对西方科学的研究理念进行介绍和宣传,并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加以吸收和创造。王国维就是杰出代表之一。他对于中西方思想方法的融合和运用,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见一斑。本文将试着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梳理并加以探讨。

一、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自提出以来,在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其实在此之前,王国维已经通过对甲骨文字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步形成了“二重证明法”的概念。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担任导师时,在他的《古史新政》课上正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理念,他谈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得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2-3

王国维所说的“纸上之材料”即文献资料,“地下之新资料”是考古资料。就王国维那个时期而言,正是甲骨文发掘的时代。1898年,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偶然出土第一批甲骨卜辞,此后专家们开始对此进行搜集和研究。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为我们考证和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几乎同时,研究者们在敦煌发现汉简等古代文物,这些实物的出土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资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运用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研究古史古籍的,它实则就是以实证史,以史考实,打破了传统经学从文献到

收稿日期:2018-05-20
作者简介:孟勐(1995—),女,河南邓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文献的研究模式。如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发掘出的甲骨卜辞与此时代记录有关的论著,如《天问》《山海经》等拿来作比较,得出《天问》中的“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该”和“恒”都是季的儿子。由此,通过王国维的考证,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得到了确认,殷商史的体系大致上建立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作序中曾高度总结了王国维一生的治学方法,主要分三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1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是二重证据法的精髓所在,王国维在文献、经史方面的应用最为突出。“二重证据法”也是对清代考据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乾嘉考据学派重视客观文献史料,它治学的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王国维常用的“考之古音以通其谊(义)之假借”的治学方法,就是从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的研究方法发展而来。但王国维在考证中,将研究材料的范围扩大,将野史、文学作品(如《楚辞》)等考据学派不采用的资料都拿来作为参考证据,以研究古史古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就是由此编撰而成。“二重证据法”不仅拓宽了史料的来源,而且提出了检验以往文献的问题,是对学术界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

二、阙疑法

阙疑是指对有疑问的地方要保留,对疑惑不解的东西不妄加评论,这是一种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阙疑法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论语》中孔子有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这是子张向孔子学习求官位得俸禄的方法时孔子所说,即多听,有疑问的地方先予以保留,对其余无疑问的谨慎地说出,这就能减少过失。这种方法对于古文的研究,尤其是文献的整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后来的学者们多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治学方法。许慎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文字学当中,在《说文解字》中,我们常见“阙”字的出现,其实就是表示对此存疑不能妄下定论。

王国维同前辈学者们一样,将“阙疑”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中。他曾坦言自己读《尚书》“不可解”,但同时也认为前人的解释是“强为之词”,不可通,他不能赞同。这并不是王国维否定前代学者们的成就,而是认为各时期的学术成果有其肯定之处,但也需不断推进。这表明了王国维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他反对跟在古人后面人云亦云,但也不完全地否定古书,而是独立客观地对待古书材料,在新旧材料中相互借鉴,融会贯通,获得确证。如在《国朝金文著录表》中,王国维对彝器的年代进行了考据,最终只确定了一少部分器物的年代,对于大部分器物的年代和作者没有确定的证据来把握,所以,王国维均表示阙疑。同样,在王国维的其他论著中,对于他不能确定的事,都坦诚表明“不详”。王国维对“阙疑法”的认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学术素养,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益的启迪。

三、系统分析法

朱光潜在谈中国人的心理时说:“偏于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4]3王国维作为中西文化交汇时期的学者,他的学术观念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他也曾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5]117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被郭沫若高度评价,认为可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为中国文艺史上的双壁。在谈及研究中国戏曲的原因时,王国维在他的《三十自序·二》中说道:“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又说:“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因此,我们从《宋元戏曲考》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王国维的系统思想。从宏观上来看,《宋元戏曲考》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七章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及发展演变;第八至十三章以元杂剧为中心,论述了它的渊源、时地、存亡、结构和文章;第十四、十五章论述了南戏的渊源、时代、文章;第十六章“余论”为最后一部分,是对我国戏曲的总结和影响的阐述。整个结构清晰明确,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除了《宋元戏曲考》,我们也可以从王国维的另一部著作《人间词话》中看到系统分析法的应用。《人间词话》一共有64则,以“境界说”为核心展开。64则词话按照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九则,主要阐释了王国维所指“境界”的内涵以及与境界相关的,如“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概念;第二部分是第十到五十二则,王国维主要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详细论述他的境界理论,并以境界为艺术评判的标准,将词家、词作进行区分;第三部分是五十三到六十四则,主要阐述了词在创作过程

中的具体问题，其中渗透了王国维的美学理念，如对“真”“自然”的重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较之中国此前的词话论著，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严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重感悟，常用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缺少分析、论证。王国维在吸收西方重逻辑、重实验的学术观念后，将它与中国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融合，使理论的阐发与作品的引证联系起来；《人间词话》除以境界为中心外，相关概念之间也组织成一个有联系的系列，全文在结构上三个部分之间也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分类归纳法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6]98这是王国维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谈，指出中国文化研究缺少分类归纳。分类法为实证主义所长，王国维受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的影响，将分类法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创作当中，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对各时期的戏剧形式进行了分类，如将宋代的小说杂剧分为六个类别：小说、傀儡、影戏、三教、讶鼓和舞队。具体方面又对院本名目进行了分类，在院本名目下分十一个子目，详细阐述金院本的状况。在另一部著作《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同样运用了这种方法，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有我”和“无我”主要是通过主体的情感状态表达的显隐来区分的，正如王国维所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则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根据境界审美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美”与“宏壮”。在境界的创作中，王国维又区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造境”多为浪漫主义诗人所运用，“写境”多为现实主义诗人所运用。而依据“造境”与“写境”的特点分为“不隔”与“隔”，即是否达到物我一体，水乳交融的状态。王国维通过对诗词的分类，使研究对象更加细化，两两对立的分析，使研究更加清晰透彻，因此使得《人间词话》作为最负盛名的词话著作，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五、阐发研究法

阐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常用的一种研究类型，它是指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中一些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加以相互阐释，相互发现。王国维处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交汇点上，他的一些思想观念、学术研究方法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产物。王国维善于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文论和作品进行阐释，在接受西方的理论中，以叔本华的影响最为深远。叔本华融合佛教的哲学思想和重视艺术的特点，都使王国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进行阐释的典型性著作，它与传统词学的不同在于王国维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探讨，使研究进入哲学视界。“境界说”中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最富有哲学意味，王国维对这两者的划分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这里的“我”不仅指审美主体及其情感，而且指人们普遍拥有的意志和欲望。在“有我之境”中，主客体是相互对立的状态，“我”的意志尚存。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而在“无我之境”里，主客体达到了和谐，主体意志和情感不再那么强烈，甚至已经摆脱个人意志的束缚。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叔本华看来，人都有生活之欲，并受意志支配。只有意欲灭绝才能得到解脱，而这又并非简单事，因此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之作更为难得。除此之外，叔本华的审美直观、天才论等观点也可在“境界说”中找到痕迹。可见，《人间词话》既接受了西方哲学理论的洗礼，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融贯中西，对中国美学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运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也是立足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和悲剧观，来阐发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的，开创了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的新风气。

在王国维之前，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以索隐和评点为主。索隐即索引，是对古籍的注释考证。这种方法类似于清代的考据之风，为从小说中考证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评点是受为经书作注影响，对小说也进行点评。王国维否定了“贾宝玉即是纳兰性德”的说法，也批评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提法，认为以此法读小说是不懂文学艺术的特质。王国维在接受西方的理论思想后，运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和美学观来诠释《红楼梦》里

人物的悲剧命运。

叔本华的哲学充满浓厚的悲剧性,他认为人都有原罪,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恶人造就的悲剧;第二种是盲目的命运的悲剧;第三种是因人们不同的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悲剧。这三种悲剧以第三种最为强烈,是"天下之至惨也"。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正是第三种悲剧,是人生的悲剧,而这悲剧的中心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王国维从新的角度来阐释《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价值,是采用西方哲学与美学观点来阐释中国古代小说的最早范例,开启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新范式。

六、结语

王国维作为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从实证求实的立场出发,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是中西融合与创新的结果。他立足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既继承了我国前辈学者求实阙疑的学术之风,又吸收了西方科学的逻辑归纳之法,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将两者加以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采用中西文论互释的方法,使其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王国维的治学方法除了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之外,在近代学界也起到了更新观念、奠定范式的作用。其一生治学生涯形成的一整套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陈桓敦煌劫余录序[M]//陈寅恪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王国维. 总论[M]//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3]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一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朱光潜. 抗战版序[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姚淦铭. 王国维文献学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6]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M]//王国维遗书(第 5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ypes of Academic Research by Wang Guowei

MENG M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As a master figure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Wang Guowei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building China's modern academic system, promot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s an open-minded scholar, Wang Guowei's academic researches involve many fields. His academic activ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philosophical studies to literary drama to history studies, Wang Guowei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part from his talent and diligenc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re also indispensable factors. His method of dual evidences , the method of doubt,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study, the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and induction,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not only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at that time,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lightenment for today's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Wang Guowei; dual evidences method; questioning method;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 classification and induction metho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基于灰色理论预测人口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朱家明[a],胡榴榴[b],王 杨[a],胡逸群[a]
(安徽财经大学 a.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b.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建立Leslie模型,利用Matlab对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我国未来的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的预测;其次,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得出不实施新政策下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预测,并与之对比;再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利用EViews、SPSS等数学软件编程,给出人口结构与人均GDP的预测;最后,结合预测结果,提出我国人口发展的合理化生育政策建议。

关键词:Leslie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多元回归分析;人口新政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5
中图分类号:C924.21;N9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27-04

1971年,“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这项特殊的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但也带来了另一重大人口问题:过高的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改变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生育政策,推行“全面二孩”政策。这一政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讨论。林杰等对基于不同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李咏馨等基于综合评价法对人口可持续发展模型进行了研究[2],本文基于Leslie矩阵和灰色预测模型,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一、基于Leslie模型分析新政策对我国未来人口的预测

(一)数据准备

利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根据最近五年(2012—2016)数据得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生育人数,并计算出不同年龄阶段妇女生育人数占总出生人数的比重(简称出生比),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阶段妇女生育人数占总出生人数的比重

年龄段/岁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生育人口数/人	535800	5536600	7322600	3572000	410780	303620	178600
出生比	0.03	0.31	0.41	0.2	0.023	0.017	0.01

(二)研究方法

我们利用Matlab软件建立Leslie矩阵[3],对我国2017—2030年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分析。

将人口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划分为若干个年龄组,假设人口的生育率与死亡率不随时段k变化,只与年龄组有关。记存活率为S_i(1-死亡率),生育率为b_j。

人口数量为$x_i(k)$的变化规律为:当时段$k+1$时,第一个年龄组的数量是各年龄组在时段k的生育数量之和;第$i+1$年龄组($i=1,2,\cdots,m-1$)的数量是时段k第i年龄组存活下来的数量。由此得到

$$x_1(k+1)=\sum_{i=1}^{p}b_i y_i(k),k=0,1,2\cdots \quad (1)$$

$$x_{i+1}(k+1)=s_i x_i(k),k=0,1,2,\cdots;\ i=1,2,\cdots,m-1 \quad (2)$$

收稿日期:2018-05-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流猜想,Fulkerson-覆盖及相关问题”(11601001);安徽财经大学教研项目“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acxkjsjy201803zd);安徽财经大学教研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数学类专业课程《数学建模》教学内容的研究”(acjyyb2018006)

作者简介:朱家明(1973—),男,安徽泗县人,硕士,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数学。

其中(1)(2)是差分方程,记人口数量在时段 k 按年龄组的分布向量

$x(k)=[x_1(k),x_2(k),\cdots,x_m(k)]^T,k=0,1,2,\cdots$

由生育率和存活率构成的矩阵 $L=\begin{bmatrix} b_1 & \cdots & b_m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cdots & 0 \end{bmatrix}$

则(1)(2)可表示为 $x(k+1)=Lx(k),k=0,1,2,\cdots$

当矩阵和年龄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 $x(0)$ 已知时,可以预测人口数量在时段 k 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x(k)=L^kx(0),k=1,2,\cdots$

通过使用 Matlab 软件,依据往年的总人口、女性人口、出生婴儿数等数据,计算出该年份的生育率、繁殖率、女性人口比率、存活率,建立 Leslie 矩阵 L,通过公式计算出,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7—2030 年我国总人口数(单位:亿人)

时间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人口数	13.9329	13.9998	14.0652	14.1274	14.2114	14.3486	14.4906
时间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总人口数	14.6386	14.7998	14.9839	15.1831	15.3769	15.5955	15.8059

同时利用该模型计算出(0—14 岁、14—64 岁、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见表 3。

表 3　"全面二孩"政策下 2020—2030 年中不同年龄结构

(单位:万人)

年份	0—14 岁人口数	15—64 岁人口数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2020	25579	100837	14858
2021	25608	101641	14865
2022	25865	102754	14867
2023	26408	103627	14871
2024	27056	104454	14876
2025	27497	105622	14879
2026	27683	107274	14882
2027	27836	109109	14886
2028	28179	110700	14890
2029	28717	112343	14895
2030	29284	113395	15380

(三)结果分析

将 Leslie 矩阵的结果("全面二孩"政策下 2017—2030 年我国人口总人数)绘制成折线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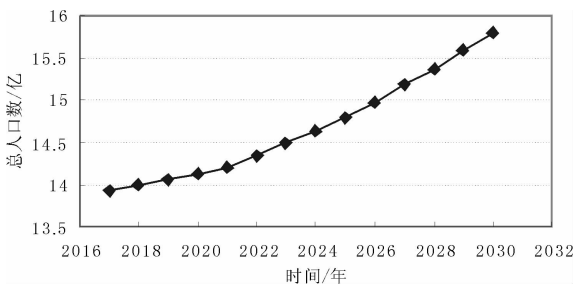

图 1　2017—2030 年我国总人口数

从 Leslie 矩阵计算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我国的人口总数显著上升,且上升速度不断变快,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我国人口出生率有了显著提升。由此可以得出,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状有积极影响。

二、基于多元回归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数据准备

查找并整理得出过去 20 年我国人均 GDP、0—14 岁人口数、15—64 岁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人口数、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二)研究方法

1. 相关分析

以人均 GDP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 0—14 岁人口数、15—64 岁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人口数、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做相关分析,并得出线性值[3-4],见表 4。

由 R^2 线性值可以看出,0—14 岁人口数、15—64 岁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人口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死亡率与人均 GDP 成较强的线性关系,总抚养比、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 GDP 线性关系较弱,故而剔除总抚养比、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3 个因素。

2. 回归分析

建立 0—14 岁人口数(X_1)、15—64 岁人口数(X_2)、65 岁及以上人口数(X_3)、少儿抚养比(X_4)、老年抚养比(X_5)、人口死亡率(X_6)与人均 GDP(Y)的回归方程[2,5],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Y=-94971.93-5.830X_1+0.3965X_2+26.7606X_3+5910.311X_4-19989.81X_5+1016.823X_6$$

表 4　各变量的 R^2 线性值

自变量	0—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人口出生率	人口死亡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线性值	0.823	0.795	0.97	0.658	0.78	0.971	0.262	0.755	0.393

由回归分析结果得出,F 检验对应的概率值为 0.00,小于 0.05,各因素对方程的影响较为显著。

但由 t 检验可以看出 15—64 岁人口数(X_2)、人口死亡率(X_6)的 t 检验不通过,因而剔除这两个因素再做回归分析。得出新的回归方程如下:

$$Y = -4673.53 - 5.72X_1 + 30.59X_3 + 5729.21X_4 - 23882.49X_5$$

做自相关检验发现 0—14 岁人口数(X_1)与少儿抚养比(X_4)相关性较强,65 岁及以上人口数(X_3)与老年抚养比(X_5)相关性较强,因而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最终以 0—14 岁人口数(X_1)、65 岁及以上人口数(X_3)为解释变量,以人均 GDP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Y = -89357.46 + 0.664598X_1 + 8.781313X_3$$

最终,把 Leslie 矩阵计算出的 2020—2030 年我国人口情况代入回归方程,得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我国人均 GDP 情况,见表 5。

表 5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均 GDP(单位:元)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人均 GDP	58115.02	58195.76	58384.13	58780.13	59254.7	59574.13
年份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
人均 GDP	59724.09	59860.9	60123.98	60525.44	65161.2	—

(三)结果分析

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我国人均 GDP 产生影响,尤其是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抚养比对于人均 GDP 的影响尤为显著;从多元回归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国人均 GDP 一直呈上升趋势。当然,影响人均 GDP 除人口结构以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同方向变动,且这一发展状况是基于我国特定国情的。

三、我国人口合理化发展的生育政策建议

(一)研究思路

首先预测出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的人口结构情况,并将人口结构情况代入多元回归方程得出不实施人口政策下我国的经济情况预测;然后将它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经济情况预测进行对比,进而给出合理化的生育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根据收集到的 1996—2015 年我国人口结构情况,利用 Matlab 建立灰色预测模型[5-6],预测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 2020—2030 年我国人口结构的情况,见表 6。

表 6　"全面二孩"政策下 2020—2030 年我国人口结构(单位:万人)

年份	总人口数	0—14 岁人口数	15—64 岁人口数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2020	224070	18909	109020	16376
2021	226410	18476	110200	16899
2022	228780	18052	111380	17439
2023	231170	17637	112580	17995
2024	233590	17232	113790	18570
2025	236030	16837	115010	19163
2026	238500	16451	116250	19775
2027	240990	16073	117500	20406
2028	243510	15704	118760	21057
2029	246050	15344	120040	21730
2030	248620	14992	121330	22423

以 0—14 岁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自变量,代入上述回归方程对人均 GDP 进行预测,得出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 2020—2030 年我国人均 GDP 预测情况,见表 7。

表 7　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 2020—2030 年我国人均 GDP(单位:元)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人均 GDP	67012.19	71317.04	75777.16	80383.77	85163.86	90108.66
年份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
人均 GDP	95226.29	100516.1	105987.5	111658	117509.6	—

(三)结果分析

由回归分析得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均 GDP 情况如图 2 所示。

根据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我国人均 GDP 发展态势都呈上升趋势,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均 GDP 增长幅度明显要低于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均 GDP 增长幅度。由此可以看出,从短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可能会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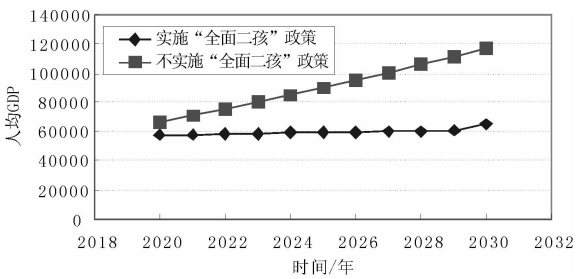

图 2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均 GDP

这可能是“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不断增加的生育费用、婴幼儿抚养费用等导致的。但从长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可以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提高我国劳动力数量,这是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的生育政策,给出以下建议[6]。

第一,要实施适当的“全面二孩”政策,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生育限制。过高的生育率除了降低人口老龄化,还会带来高的社会抚养比,在短期内会减缓经济发展的幅度。

第二,人口政策的实施需要结合民情。如果普遍社会生育率不高,人们生育积极性低,可以进行一定的鼓励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长期发展下去必然带来社会抚养比提高,劳动力缺失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第三,把握好实施生育政策的度,及时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综合考虑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选取最为合理的生育政策。

第四,人口出生率不仅仅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还会随着社会环境、人们心理因素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生育政策的选择,还需考虑到心理因素的影响。

四、结束语

综合利用 Leslie 矩阵、灰色预测模型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行预测,同时利用回归分析得出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预测得出的人口结构代入回归方程预测出我国未来的人均 GDP。预测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减缓我国经济增长态势;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的实施是有助于改善我国目前不合理的人口结构的。任何一个政策的实施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缺陷,我们要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辨证地选择政策,对于人口问题更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用全面的眼光衡量。

参考文献:

[1]林杰,朱家明,杨静. 基于不同政策对未来人口数量及结构的预测[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38(8):40 - 43.

[2]李咏馨,朱家明,吴梦晗,等. 基于综合评价法的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模型[J]. 高师理科学刊,2017,37(7):26 - 29.

[3]严政人,魏玉蕊,陈庆炜. 基于 Leslie 模型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影响[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7):44 - 47.

[4]谢会萍,朱家明,张素素,等. 基于 Leslie 模型的人口结构评价分级与预测[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17 - 20.

[5]董贵萍,陶雪晴,陈益杨,等. 基于人口预测模型对实行二孩政策的研究[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29(2):140 - 146.

[6]陈宁.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96 - 10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Prediction of the Impact of New Population Polic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Grey Theory

ZHU Jiaming[a], HU Liuliu[b], WANG Yang[a], HU Yiqun[a]

(a.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b.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 - child” policy on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Leslie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actual data is analyzed by using Matlab. Then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a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 - child” policy are predicted. Secondly, the grey predic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 is obtained under the non -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olicy and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one. Thirdly,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forecast of per capita GDP are given by using EViews, SPSS and other mathematical software. Finally, combining with the forecast results,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Leslie model; grey prediction mode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new population policy

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研究

张新星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事业发展部,郑州 450008)

摘 要:近年来,河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设立或参股政府投资基金,基金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在发挥撬动社会资本杠杆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基金管理专业化水平不高、项目渠道来源单一、财政资金大量结存、绩效评价不够完善等问题,需要从强化风险防控制度设计、创新基金运行模式、理顺参与主体关系、健全监督评价机制、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规范管理、防控风险,更好地放大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各类社会优质资源向战略重点集聚,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关键词:政府投资基金;风险防控;绩效评价;河南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6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31-06

近年来,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迅猛,但其管理、运营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基金规范管理的相关制度还不够健全,基金的设立、运营、终止等发展体系还不够成熟,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大了政府投资基金面临的各种风险。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在风险防控方面遭遇到几个困局:一是退出渠道不畅。IPO上市门槛高、等待时间长、综合成本大,而股权收购和转让,企业价值难以直观放大,同时,各地产权交易市场分散、缺乏政策规范,价格并不公允,种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投资对象的高风险性,使得基金所投项目很难以理想价格退出,或将带来财政资金损失。二是扩大政府隐性债务。各地城镇化基金纷纷涌现,部分以虚假股份和真实债务形式保证固定收益,投向保障房和土地一级开发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扩大隐性负债的新通道,若政府对基金回报兜底,当土地出让收入无法覆盖本息时,很可能成为政府的直接债务。三是政策性市场性关系处理不当。政府投资基金更为关注资金安全和发展红利,可能会适当让利甚至不设收益要求,而社会资本则寻求利益最大化,两者利益关系一旦处理不当,势必影响基金整体的运作效率、收益和风险管控效果。四是监管评价机制不健全。政府侧重于基金募集、投资,对投后管理缺乏关注,有的基金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也存在一些行政力量干预,基金偏离了市场化运作轨道,增加了投资风险,出现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的问题。

政府投资基金作为创新型融资方式,可以有效撬动财务杠杆,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放大财政资金作用,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强力助推器。但目前设立的各类政府投资基金尚处于创立探索阶段,如何保证其健康稳定发展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一、政府投资基金的概念

(一)产生背景和发展渊源

政府投资基金的前身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财政涉企资金的基金化改革密不可分,产生于政府鼓励创业投资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十部委

收稿日期:2018-08-3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政府性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2017D008);2018年度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政府引导基金风险防控研究"(182400410181)
作者简介:张新星(1983—),男,山西阳城人,工商管理硕士,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事业发展部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项目投资。

于2005年11月联合发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对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主体、扶持方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企业的设立和展。”2007年7月,旨在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200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对引导基金的设立运作进行了细化和规范。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北京、上海等地纷纷设立引导基金,率先开启财政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尝试。在多年的具体实践中,引导基金也逐步突破了传统的创投领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也开始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引导基金的发起设立也由发改委牵头逐渐转变为由财政部门联合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发起。

随着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启,政府对财政涉企资金扶持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2014年10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又在12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随着国家对企业的税收、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得到全面清理,财政涉企资金扶持方式得到进一步改变和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这一概念也得以明确。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活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要求,鼓励“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为促进政府投资基金的健康持续运行,财政部2015年11月制定了《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2月又出台了《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政府投资基金的相关事宜。

(二)主要特点和运作模式

政府投资基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政府单独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其中,政府出资应符合《预算法》规定,符合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一系列预算安排;第二,与传统的风险补贴、拨款、贴息等无偿方式相区别,基金的主要运作方式为政策性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有偿方式;第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基金的主要投资领域,以支持该领域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主要目标。

在实际运作中,政府投资基金主要包括母子基金、专项基金两种模式。在母子基金模式中,母基金层面通常采用平行投资的架构,以吸引大型金融机构的参与,放大杠杆优势,再由此借助各管理人的投资特点,通过子基金投向标的企业。在专项基金模式下,财政资金联合行业龙头、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本共同设立,采用单层基金架构,重点支持特定行业或特定类型企业。

二、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开展情况

(一)制度保障逐步规范

河南省于2008年启动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运行等工作,开启了财政涉企资金的基金化探索改革序幕,并在2012年、2013年先后出台了《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河南省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的落地实施,从投资对象、组织结构、投资管理、操作程序、退出机制、收益分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

伴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发布《关于省级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省级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试点方案,开启河南省试点改革工程。2017年3月,河南省财政厅结合河南省情实际和财政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两年来的实践经验,又制定出台了《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5个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基金设立、运作模式、组织架构、风险控制、退出机制、预算与资产管理、绩效考核与监督管理、受托管理机构及基金管理机构的选择标准、受托管理机构的履职程序和规范、投资项目的备案管理等,为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各类基金发起设立如火如荼

2015年,在河南省制定的省级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出了首批设立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文化产业等四支政府性产业发展基金,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筹备设立各类政府投资基金,先后设立了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PPP开发性基金、“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至2016年8月底,河南省级财政涉企基金数量已达八支。在基金设立过程中,根据河南省情不断创新基金的内容模式。比如,PPP开发性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首获国家批复,开创了以基金方式支持鼓励PPP模式推广应用的先河。同样,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作为省内首支天使投资基金,践行了国家“双创”战略,旨在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2016年9月,河南设立了首支“一带一路”

发展基金，总规模达1000亿元。2016年10月，央企扶贫河南开发子基金成立，暂定总规模20亿元。2016年12月，河南省设立了1000亿元规模的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2017年1月，河南省战略新兴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成立，采用“1+N”母子基金架构，形成总规模1000亿元的母子基金群。

在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蓬勃发展的同时，河南省各地市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筹备设立各类产业发展基金。2016年4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全国第三、河南首支超百亿元产业投资基金——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基金规模300亿元。2016年10月，郑州市确定设立100亿元的制造强市发展基金，全面促进工业发展。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中原航空港基金公司发起总规模30亿元的通航产业发展基金，漯河市政府携手中原证券、平安银行成立漯河市产业投资基金……近两年来，河南省各地、各行业一大批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投运，规模已达数千亿元，呈现多点开花局面。

三、政府投资基金风险防控需要关注的问题

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在财政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基金管理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平还比较薄弱

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基本都能满足有专业机构具体受托管理的条件，但是一些基金管理机构、团队对基金的操控能力还相对偏弱，基金管理的专业化能力还有待提高。一是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有相当比例仍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深受传统国企决策流程和程序的影响，决策时间较长、效率不高。二是一些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基金运作，行政干预一定程度存在，市场化运作程度不高。三是河南省优秀的私募投资机构较少，基金管理机构水平良莠不齐。

（二）撬动社会资本能力欠佳

目前，河南省已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大多出于对发展本地经济、培植壮大财源的考虑，通常规定了基金的投向，即必须将大部分资金投向本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项目的选择范围，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调研发现，政府投资基金所投项目往往因为行业收益低、周期长，难以吸引社会资本，许多基金在对外募资时，经常以银行配资的方式来满足项目资金需求。随着国家金融监管政策日趋严格，银行配资的方式和额度也势必受到影响，若基金无法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未来发展将面临较大的财政风险。

（三）项目来源渠道单一

一是政府投资基金普遍有投资地域限制，在本省、本区域可投企业、项目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一些投资价值不高的项目能得到基金支持的现象，从根源上加大了投资风险；二是投资基金的项目渠道有限，在一些基金项目来源中，由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推荐的占据了较大比例，政企合谋也会加大投资风险。

（四）财政资金大量结存

调查显示，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普遍存在投放率不高、财政资金结存的状况，这是基金规模激增、管理能力不足的直观表现，也是质量与效率不匹配的具体体现。目前，河南省基金管理机构有的没有对基金发展做出翔实可行的规划，有的缺乏足够的专业投资能力，有的优质项目储备不足，有的暂无合适项目可投，随着基金规模的快速扩张，钱虽然多了，但“花不好、不敢花”仍一定程度存在。财政资金大量沉淀，虽然形式上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资金闲置，效率不高，效益不佳，也带来了一定的财政风险。

（五）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尚需完善

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通常面临财政部门、发展改革部门、证监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同部门的监管侧重点各有差异，但无法避免会有重复，个别时候还有矛盾之处，政府在评价基金绩效时，缺乏一套合理的评判体系。调查显示，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在绩效评价时，较多关注投出项目成功率，较少关注项目综合收益率，使得许多基金管理人员顾虑因素较多，难以完全按照“二八原则”投向一些真正有潜力的企业或行业。

（六）风控制度还不够具体有效

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河南省各类政府投资基金还缺乏扎口管理，特别是缺乏统一部门、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考核等，一些投资基金重复设立、层层设立，省、市、县（区）各级基金运作方式不尽相同，客观上存在效益不高和收益流失的风险。有的基金没有把握好“本源”，没有处理好基金公益性与收益性的关系，有时过于偏重盈利性，忽视了弥补市场失灵的公益属性，没有达到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初衷和预期效果。

四、加强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的建议

（一）加强基金风险防控制度设计

1. 建立完善项目筛选机制。完善项目投前的筛选程序，委托会计师、税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对项目开展尽职调查，从而规避部分风险。同

时,对每一个拟投项目,完善审批环节,加强过程管理。比如,可以通过政府推荐、管理人初步调查、中介机构尽职调查、投委会审议、董事会决议、托管人复核等几个环节,逐渐剔除风险高的项目,最终留下优质项目。

2. 探索财政出资适当让利制度。2015 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合理确定财政出资让利措施,财政资金注资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原则上与社会出资同股同权。政府投资基金,其设立初衷是就是要充分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既引导社会资本,更要引导人才、技术、平台等全要素资源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集,发挥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资本带动的促进作用,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从基金投向看,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投向"市场失灵"突出的领域,存在其他社会资本不愿投、不敢投的情况。因此,基金可以采取向社会资本让渡部分分红等让利措施,财政资金可以少分甚至不分收益,但必须严格加强风险控制,保证财政资金不受损失。同时,财政让利应明确具体范围,对于市场主体不愿从事的微利、无利行业或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可以采取让利措施,对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应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投资基金不得向社会出资人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不得保证最低收益。根据所投领域的不同,基金可以给予不同的失败容忍度。

3. 投入资金应分阶段有序进行。政府部门可以与社会资本签订出资方案,约定具体的出资节点、时序,也可根据政府本级财力状况、预算安排、投资进度、用款需求等灵活掌握、合理调控,采用分批、分次拨付的方式将财政资金注入到基金中。为加强对被投企业的道德约束,防范委托代理风险,投资基金可以与被投资企业签订协议,约定分阶段向子基金或项目注入资金。若采用跟进投资方式,应在合同中约定分阶段投资的具体策略,如果项目前一阶段投资达不到预期效果,投资基金可以不再继续投资,真正起到审查监督作用。

4. 适当放开投资地域限制。一些投资基金特别是部分经济欠发达县(市)、区设立的基金,可以适当放开投资地域限制,避免资源闲置浪费,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对于政府参股比例较低的基金,不需要对基金投资地域做过多的限制,应当允许其跨地域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如果基金所投企业有好的技术水平和成熟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对接当地资源优势,积极借鉴引入进来,带动、回馈本地发展。

5. 建设基金信息服务平台。基金管理政策、投资信息在平台上公开,方便投资方、融资方和基金管理机构对接。部分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成效也可通过平台向社会公示。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熟悉产业政策、了解项目情况的优势,将本行业重点项目提供或推荐给基金管理人,建立投资项目库并及时更新,以便遴选、对接投资项目。

(二)创新基金运行使用模式

1. 构建联合参股机制。省级基金可以与中央基金、市县基金互相参股,充分发挥集群优势。各级基金上下联动,聚少成多,可以获得更多的谈判优势,扩大投资项目可选择面。省级基金参股市县基金时,应结合全省区域与产业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各地产业基础和产业特色,对重点地区、重点产业进行政策聚焦,促进各地更好发挥资源优势。

2. 探索可转债投资模式。可转债是一种灵活的投资模式。在企业运行初期以明股实债方式进入,可以保障投资基金前期不受企业经营初期的影响,只要适当控制投资比例及采取有效的增信措施,确保企业有适宜的偿债能力,就可以降低风险。后期当企业实现产业化经营或产能扩大运营平稳后,基金按照约定条件将债权转为股权,可以增强与企业的密切联系,实现更好的投资回报。

3. 以信誉担保方式资助企业。企业在初创期或产品处于研发阶段时,短期内难有较大的投资回报,同时还面临大额的资金需求,而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额度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审慎评判后,若能采取政府信誉担保,则可以大大增加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机会,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尽快实现产业化经营,助推企业提升造血能力,早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三)理顺基金参与主体的关系

1. 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导向作用。投资基金的发起设立协议,重点是要保证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能够正常发挥,要解决好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根本目标和市场化运作机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因此,在一些涉及引导作用发挥的关键问题上,可以设置一票否决权等特别条款。同时,要把握好特别条款的设置尺度,减少基金运作的行政干预,避免因决策程序过于复杂导致效率降低。

2. 平衡好政策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予以保证,要建立制度明确基金目标、实现目标过程中出资人、管理人、受托人等各个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此外,还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基金可持续、滚动发

展。除采用固定管理费和退出收益让利等常规手段外，还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项目困难问题解决情况、提供的多样化增值服务等因素对管理费进行一定比例的浮动，达到激励目的。

3. 建立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政府投资基金的参与主体中既有政府有关部门人员，代表政府出资行使监管职责，又有完全市场化的管理团队，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操控基金，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注重规避风险，而市场主体愿意承担“高风险、高收益”下的博弈机会，两者对基金项目的风险偏好、决策意见等有着较大差异，平衡解决好这种差异或矛盾才有利于基金的健康发展。避免投资风险转嫁给政府部门，需要设计安排好参与主体间的风险共担机制，即政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风险，不能为吸引社会资本而作出减少同类竞争、予以财政补贴、进行项目扶持、提供配套基础设施等特别承诺，防止出现被投资机构绑架的情况。

4. 设定基金的提前退伙条件。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需要实现投资方向政策导向正确和资金安全稳定使用两个目标相统一，加强日常管理、避免资金受损尤为必要。为确保资金安全，需要在基金发起设立章程或协议对财政资金的退出条件进行明确约定，即除正常投资期满顺利退出外，要充分考虑各种意外情况，比如基金的投资方向偏离政策目标的，资金使用或未按协议约定严格履行的，基金长期闲置实际投出率不高的，或者其他章程协议未具体约定但影响基金效益的，财政资金可以提前退伙，并且无需征得其他出资人同意。在财政资金退出权益的计量方面，应聘请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出资权益评估，作为退出价格参考依据。

（四）健全完善监督和绩效评价机制

1. 加强风险监管体系建设。一是采取安排项目人员进入所投企业董事会等适当的方式加强管理；二是加强对所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控制，政府投资基金对所投企业的股权比例通常有限制性规定，往往居于企业的中小股东地位，要通过定期对生产经营活动、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防范企业实际控制人的道德风险，防止基金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同时，基金管理机构也要定期向出资人出具管理人报告，揭示基金运作情况；三是对政府投资基金业绩的考核，既要看基金本身的投资回报率，还要看基金运作对产业发展的整体促进作用。

2.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绩效评价体系，考核指标应包括硬指标，也包括软指标，既有业绩考核，也有行为考核。指标应贯穿基金运作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事前指标着重考核设定政策目标、选择管理机构等情况，事中指标主要考察市场化、专业化管理程度及运作合规性等，事后指标重点考核项目完成情况、政策目标实现程度以及经济效益等。要建立健全对收益让渡项目的风险分担和考核评价机制，委托中介机构定期对基金投资运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财务收支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进行监督检查。除提交年度投资计划、出资证明等一般性的监管措施外，政府投资基金应当对各子基金和投资项目的运行情况作出风险评估，对风险性较大的进行重点监管。基金运营机构要及时报告投资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制定风险防范制度，从制度、技术、操作、市场等多方面着手，切实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效益。

3. 主动提供增值服务。为更好地防控投资风险，政府应积极协调社会资源，为所投企业提供包括制定发展战略、优化企业架构、规范公司治理、设计激励约束机制、招募管理团队及核心成员、推荐中介服务机构等在内的多项增值服务，帮助所投企业并购重组、公开上市等，使企业经营战略更加明晰，盈利能力和公众形象明显提高，促使投资基金能顺利实现退出。

（五）加强风险防控保障体系建设

1. 推动基金所投企业主板上市。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发掘河南省在农业、交通运输、制造业、互联网等方面的优质企业，加大对河南省企业主板上市的支持力度，对符合上市条件、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企业给予政策指导，鼓励券商、银行、投资机构等积极参与上市辅导和项目投资。

2. 推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快速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可以为企业提供有关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类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河南省已确定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为省内唯一合法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做大做强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的展示、交易等功能性业务，开展路演、公关等创新服务业务，将为地方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也将丰富政府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

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制定政府投资基金人才专项工作计划，加大对投资基金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强化职业培训，鼓励行业从业人员与国内外领先机构加强交流合作，鼓励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到基金公司挂职锻炼，提高专业管理水平。支持引进熟悉金融创新、资本运作、拥有相关行业背景、从业经验丰富的优秀基金管理团队和人才，给予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并在落户、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

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五、结语

时至今日,河南政府投资基金已走过了十年历程,在发展和演进中,其风险控制水平在逐步提高和改善,财政资金对引导产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效用在日益体现。但政府与市场的职责界定还比较模糊,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信息不对称难以消除,社会资本的逐利性与政府财政的公共性相悖仍广泛存在。特别是在防风险攻坚战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的隐性债务仍在增长受到了更多关注,政府隐性债务规范清理、金融监管政策日趋严格给政府投资基金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只有不断探索完善政府投资基金风险管理的模式、手段,切实提高财政风险防控能力,才有助于提升基金的投资能力和管理效率,推动其在吸引社会资本、引导投资方向和发展社会经济重点领域行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兰英.促进政府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建议[J].中国财政,2017(2):76.

[2]徐文舸.政府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国际镜鉴:基于对以色列、澳大利亚的比较分析[J].国际金融,2017(5):51-59.

[3]王东刚,陈泰榔.后地方债时代的政府融资新模式:政府投资基金[J].区域金融研究,2016(12):55-58.

[4]相德伟,李志英.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问题、分析与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6(19):2-27.

[5]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EB/OL].http://www.hncz.gov.cn/2017/0302/1066.html.

[6]新乡市人民政府.新乡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EB/OL].http://www.xinxiang.gov.cn/sitegroup/root/html/8a818183609cec6d0161e5827ec61a91/20180302151045680.html.

(责任编辑　许峻)

Study on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Xinx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Henan Daily Newspaper Group, Zhengzhou 45000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in Henan Province have innovated financial investment methods, established or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type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s. The amount and scale of the funds have expanded rapidly. It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inciting social capital and improved the use of financial fund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issues such as low level of professional fund management, single source of project channel, a large amount of financial funds, imperfec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o on have arisen. As a result, it's necessary to design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perate mode of innovation fund,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afeguards system so as to better amplify the guiding effect of financial funds in inciting social capital, guide various types of high-quality social resources to focus on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suppor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Henan province

木桶理论视域下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的短板及对策研究

郭 艳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献信息中心,郑州 450002)

摘 要: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但目前还不是文化强省,与先进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借鉴木桶理论,分析河南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过程中存在的创新、产业、协调等三个短板,建议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河南文化建设,以创新驱动助推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群众的获得感完善河南公共文化服务。

关键词:木桶理论;文化高地;短板;河南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7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37-05

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提出的"木桶理论",认为水桶的盛水量不是由最长的那一块木板决定,而是由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限制,即"短板效应"。这一理论常常被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其实对区域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不论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都影响着区域文化的发展水平。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文化资源丰富,但目前还不是文化强省,与先进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16年11月,河南省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总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找到河南文化发展中的短板,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一、河南与全国文化发展先进省(市)情况的比较

文化高地的目标对河南文化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寻找河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差距。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作为全国文化发展的第一梯队,近年来文化快速发展。本文选择这五个省(市)来与河南进行比较,从而寻找制约河南文化建设的短板。

1. 资本要素

资本可以为文化发展带来物质保障,是区域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规模、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政府投入及大型文化企业数等。文化产业规模是衡量一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河南文化产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增速连续13年高于同期GDP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4年实现增加值984.66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2431.8亿元,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一;2015年实现增加值1111.87亿元,其中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005.51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2016年实现增加值1212.80亿元。[1]但与全国文化发展先进省(市)相比,河南的差距还比较大(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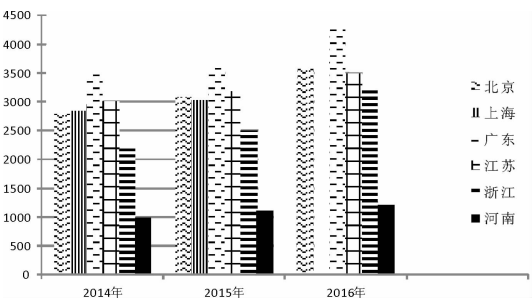

图1 2014—2016年京、沪、粤、苏、浙、豫文化产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反映了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014—2016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年度全国平均

收稿日期:2018-08-17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河南加快构建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短板与对策研究"(2017B359)
作者简介:郭艳(197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化建设。

水平(见表1,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河南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相比差距更大。

表1 2014—2016年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情况

年份	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河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2014	3.76	2.82
2015	3.97	3.00
2016	4.14	3.00

政府是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涉及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离不开政府的投入。近年来,河南投入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逐年增长,为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提供了资金保障。但总体来说,河南财政资金在文化方面的投入还是非常不足:2013年河南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0.29%,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倒数第四;2014年河南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0.29%,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倒数第三;2015年河南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0.30%,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倒数第四。[1]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主体,影响着区域文化产业的实力。骨干文化企业作为行业内的标杆,已经成为衡量区域文化产业水平的重要指标。“十三五”期间,河南实施“双十工程”,着力打造10个省级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和10个省级重点文化企业,培育壮大文化产业主体。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文化企业入选“双十工程”,为河南省文化高地建设提供了主体支撑。但是迄今为止,已经评选了十届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中,河南仅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上过榜,说明河南的文化企业总体来说在全国的竞争力不强。

2.消费要素

消费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河南一方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多样的文化产品,刺激群众的文化消费。2016年6月,洛阳被列入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第一次)26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之一;2017年2月,郑州被列入第一批(第二次)19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之一。这两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对于河南培育文化消费增长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但河南的整体文化消费水平不高,虽然2014年至2016年河南的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在逐年增长,但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差距较大,就连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未达到(见表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而成)。

表2 2014—2016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情况比较(单位:元)

地区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全国平均水平	1723.10	1915.30	2086.00
北京	3268.30	3634.60	3686.60
上海	3311.40	3718.10	4174.60
广东	1965.00	2117.30	2451.20
江苏	2238.20	2423.80	2514.50
浙江	2169.00	2428.30	2794.30
河南	1160.80	1337.20	1439.50

3.技术要素

如今,文化与科技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科技已经渗透到文化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科技不论是对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文化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后,谁占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也就具备了文化创新的主动权。近年来河南科技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断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2014年,洛阳成为国家级文化和科技创新融合示范基地;2016年,国务院批复同意郑洛新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国家政策的落地为河南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但总体来说,由于河南创新资源不足,创新能力不高。2015年全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前五名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南排名第21(指数为48.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57%)。河南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不高与研发投入不足有密切关系,如2016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494.2亿元,投入强度为1.23%,在全国排名第16。[2]

4.劳动力要素

文化作为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对于从业者的素质要求更高。文化发展的高地往往也是人才的聚集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这5个文化发展先进的省份也是人才竞争力较强的地区,在全国31个省(区)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处于前五名。而河南排名第21位,名次处于中后位。[3]

文化与人才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发展需要人才,另一方面,文化发展还能促进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河南文化企业的数量为3208个,在全国排名第五;年末从业人员的数量为485821人,比北京、上海的还多,在全国排名第六,可见河南文化产业带动就业的能力并不差。

相对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而言，河南省人均创造的主营业务收入还不算高（见表3，根据《河南文化产业统计概览2014—2016》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表3　2016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情况

地区	企业单位数（个）	年末从业人员（人）	营业收入（万元）	人均营业收入（万元/人）
北京	3539	481281	81954489.8	170.3
上海	2362	420874	87718650.2	208.4
广东	7327	1836989	158740156.0	86.4
江苏	7571	1204576	144131185.5	119.7
浙江	4616	565788	71466558.6	126.3
河南	3208	485821	35808935.6	73.7

区域文化的发展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资源要素、制度要素等。就河南文化发展的现状来说，这些要素并不是河南的突出问题，甚至有些要素河南还具备优势，如资源要素。在此本文不作比较分析。

二、与文化高地目标相比，河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短板

1. 创新的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不仅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文化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实现河南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国内文化建设先进省市，无一不是改革创新走在全国的前列。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2010年至2016年连续7年在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二，2017年跃居全国第一。正是由于在这种创新能力的引领下，文化产业壮大成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6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为4256.63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为5.26%，占全国文化产业总量的1/7，连续十多年领先全国各省区市。[4] 在一定程度上，观念的保守僵化是区域文化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河南长期是个农业大省，受计划体制的影响较深，科技创新资源不足，区域创新能力不强，创新已经成为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的一大短板。它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成为河南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致命软肋”。河南文化发展中创新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理念的短板。理念是指导实践的先导。如果发展理念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那就会影响河南文化发展的全局。长期以来，河南文化发展还是遵循传统思维，缺乏“互联网思维”和融合理念。二是人才的短板。河南虽然是人口大省，但还不是人才强省，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仅为21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称。文化繁荣不仅需要“高峰”，也需要“高原”。目前，河南文化领域在全国叫得响的领军人物不多，同时缺乏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文化人才。另外，河南在科技人才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而现代文化产业更是“智慧产业”，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南文化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人才不足是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的另一短板。

2. 产业的短板

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河南文化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短板就是文化产业。产业的短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规模小。2016年，河南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为1212.8亿元，与全国文化产业领头羊广东的4256.63亿元相比，少了3043.83亿元。2016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4.14%还低了1.14个百分点；而北京、上海早在2014年就已超过10%。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河南文化产业结构中传统的文化制造业份额过大，核心产业地位不突出。2016年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增加值之比为50.20∶13.00∶36.90。[5]723 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发展相对滞后，2016年河南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为3580.86亿元，其中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企业的营业收入为54.60亿元，仅占1.5%；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的营业收入为215.70亿元，仅占6.0%。根据文化发展的实践来看，新兴文化业态往往能够带动区域文化产业的繁荣。广东省的文化产业之所以成为全国的领头羊，很大程度上与“互联网+文化”等新兴文化业态的快速发展分不开，全国APP总榜安装量前三名（微信、QQ、酷狗音乐）均为广东企业。仅酷狗音乐就拥有5.5亿用户和30亿移动端、30亿PC端安装量。2016年，广东数字出版总产值18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4] 目前河南的文化产业结构还存在不合理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河南文化的发展质量。

3. 协调的短板

文化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文化的协调发展。目前，河南文化建设仍存在三个不平衡。一是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相比较城市，河南的农村文化设施和基本条件还比较薄弱，虽然现在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但基层仍有一些文化设施老旧、不达标。另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

整体不高，农村文化消费还是比较落后的。2016年，河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为18088元，其中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为2079元；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为8587元，其中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为949元。[5]282,294从总量上来看，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二是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河南各省辖市之间文化发展水平差距比较明显，郑州、许昌、开封、洛阳等市在全省走在前列，其他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远远落在后面。2016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前三名的郑州、许昌、南阳均超过百亿元，但与此同时，全省还有8个省辖市增加值未到50亿元。2016年，许昌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13%，在全省遥遥领先，开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48%，但是全省还有6个省辖市的比重尚未达到2%。三是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平衡。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供需矛盾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每年有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但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却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河南的文化领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过剩”与“短缺”并存，一般性的文化产品供给过多、质量高的精品不多。

三、补齐突出短板，加快构建河南文化高地的对策

为了补齐短板，有效推进河南文化高地建设，今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1. 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河南文化建设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个新发展理念是聚焦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而提出的，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要补齐河南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短板，首先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传承创新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文化协调发展，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和有序开发；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原文化进一步“走出去”；坚持共享发展，就是文化发展要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切实增强老百姓的文化获得感。

2. 以创新驱动助推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创新能力密不可分。创新能力突出的区域即使自身文化资源不丰富，也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例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移民城市，并无太多文化资源，但由于创新能力超强，2016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1949.7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10%，[6]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当前河南文化发展中突出短板之一就是产业短板，这很大程度上与创新能力不强有关。河南作为创新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今后要深入挖掘培育本地创新资源、科技优势。一是推进“文化+科技”，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优化河南产业整体布局，加快发展移动多媒体、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不断提升河南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原创能力。二是借助“文化+互联网”，实现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当前，河南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等传统媒体亟需深度融合发展。今后，可以依托大河网络传媒、大象融媒体等，建立以传统主流媒体为龙头、融媒体集团为引领、“三微一端”为支撑的媒体框架，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三是做强市场主体，使企业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只有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能更快更好地把握创新机遇，才能把科技创新应用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河南应当加强培育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出版印刷等龙头企业，打造陶瓷、玉器等有河南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牌企业，壮大现有的文化产业园区。

3. 以群众的获得感完善河南公共文化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成了重要的民生问题。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工作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公共文化服务具备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等特点，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了实现有效供给，河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应放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加大政府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度。近年来，河南不断加大对文化的政府采购投入，积极打造五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但是投入依然不足。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大投入,增强文化惠民力度。特别是要加大文化扶贫力度,在贫困地区积极实施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二是推进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构建开放兼容、内容丰富、传输快捷、运行高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4. 以人才战略支撑文化高地建设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区域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竞争,人才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要素。河南打造文化高地,离不开人才强省战略的支撑。今后,要围绕河南文化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发现、培育、凝聚人才,激活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是制定政策,吸引急需人才。实施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树立“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引才用才理念,通过刚性引才与柔性引智两条路径,集聚国内外高端文化人才。重点引进一批能够引领文化创新发展、带动产业转型的领军人才、创新团队,以及一些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二是加大培养力度,打造文化豫军。依托省内高校及部分文化相关专业发展较强的外省高等院校,建立河南文化人才培养基地,培育贯穿文化创作、生产、孵化、消费各个环节,包括文化开发与保护、文化经纪、文化组织管理、文化贸易与交流等方面的全链条人才。加大力度培养高层次的文化领军人物,继续实施“中原千人计划”“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河南省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等专项人才培养工程等,发挥国家艺术基金、扶持艺术发展专项资金等的导向作用,在出精品的同时出人才。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文艺骨干、文化能人。三是营造良好环境,留住人才。积极搭建项目平台,让文化人才有所为。出台文化创业扶持政策,支持大学生来河南干事创业。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文化人才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完善文化人才考核和评估机制,建立以德才兼备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分配制度改革,探索以知识产权、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7)[Z]. 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7:7.

[2]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17-10-10)[2018-08-09].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710/P020171012374292508458.pdf.

[3]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研究报告(2017)[EB/OL]. (2017-06-15)[2018-08-11]. http://www.rmlt.com.cn/2017/0615/478772.shtml.

[4]新浪网. 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首破 4000 亿元连续 14 年居全国之首[EB/OL]. (2017-09-26)[2018-08-11] http://city.sina.com.cn/focus/t/2017-09-26/141069675.html.

[5]2017 河南省统计年鉴[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6]人民网. 深圳文创产业成绩显著 2016 年增加值占全市 GDP10%[EB/OL]. (2017-02-05)[2018-08-12]http://sz.people.com.cn/n2/2017/0205/c202846-29669276.html.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the Short Slab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e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ckets Effect Theory

GUO Yan

(Document Information Center,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Henan is a province full of cultural resources, but not a strong cultural province at present. Compared with some advanced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Based on the Buckets Effect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short slabs: the short slab of innovation, the short slab of industry and the short slab of coord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important cultural highland in Henan.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advice as follows, comm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Idea,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Henan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improv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Henan by making people have a sense of gain.

Key words: Buckets Effect Theory; cultural highland; the short slabs; Henan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public cultral services

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对策研究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郑州 450044)

摘 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既是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又是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举措。河南省当前既具有政策基础、物质基础和内生动力等多重优势,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文化投入力度不够、文化建设人才缺乏等诸多挑战。结合河南实际,提出了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实现路径与保障措施。从促进文化资源产业转化,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构筑中原文化城市群,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河南省;文化高地;文化资源;文化品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8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42-06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于2016年10月率先提出了"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战略目标,这既与河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又与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高度契合,充分展现了河南省委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一、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优势与挑战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河南既拥有多重优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蓬勃发展,全民精神文明需求日益增长,民族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战略势在必行。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河南加快构建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也面临难得的机遇。[2]

(一)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拥有多重优势

第一,省委、省政府站位全局,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大力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加快文化改革发展,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塑造中原人文精神",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近年来,河南省陆续发布实施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5—2020年)》等一系列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推动河南文化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省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变。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上述政策方针深入贯彻落实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彰显了对文化建设

收稿日期:2018-08-27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旅游业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对策研究"(182400410616);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基于创新驱动的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策研究"(2017B068);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对策研究"(2018-ZZJH-575)
作者简介:王运涛(1977—),男,河南开封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和成人教育研究。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河南省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文化建设成果丰硕,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夯实了物质基础。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生产总值2017年达到4.5万亿元,年均增长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3]伴随着经济大省地位的更加巩固,河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越来越精准化,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越来越深入,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的效应越来越突出,文化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大力推进文明河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持续弘扬,社会诚信体系加快建设,全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文化工作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文化产业发展和市场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全省文化呈现繁荣兴盛的局面。

第三,河南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利用能力不断增强,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提供了内生动力。近年来,河南文化产业的增加值明显高于其他生产总值,文化创意产业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并已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态势。2016年,河南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212.8亿元,连续13年高于同期GDP增速,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新的增长点。2017年前7个月,河南省文化产品出口8139万美元,同比增长82.86%。[4]濮阳杂技、登封少林武术、郑州动漫等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出了河南文化软实力的品牌。在此基础上,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关于印发河南省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若干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政策的制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构建了中长期规划和健全的政策扶植体系。

第四,河南拥有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优势,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提供了宝贵资源。河南作为我国文化资源大省,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从夏到宋3000多年里,河南始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形成了政治文明的鼎盛和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占其四,悠久的历史锤炼锻造出底蕴丰厚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这里的根文化、汉字文化、姓氏文化等是发展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5]从古至今河南孕育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名人,现代河南文化发展更是百花齐放。丰富的中原文化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的文化遗产,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奠定了扎实、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面临的挑战

一是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亟待提高。就目前来看,我省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数量较少,龙头企业缺乏,参与跨省竞争、国际竞争的能力亟待提高。文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传统文化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新兴文化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譬如,河南省是旅游资源大省,又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资源整合能力不强、创新发展思维滞后、体制束缚现象严重、资金与人才匮乏是当前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加大宣传与塑造经典产品相结合、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6]

二是文化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文化产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2015年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虽然同比增长12.9%,但占GDP比重只有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支柱性产业占比5%差距较大。[7]究其原因,“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政策落地难、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不稳定、城乡文化消费动力不足”[8]等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三是文化投入力度不够。我省人口多、底子薄、历史欠账较多,2015年各级财政投入文化事业经费人均仅有21.7元(全国平均水平49.7元),位居全国后列,在中部六省中也是最少的。《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提到,到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左右,到2020年达到7%左右,而河南目前的发展低于4%的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虽然政府在文化产业扶持上加大力度,但是资金短缺、投入不足依然是阻碍文化发展的最大问题。

四是文化建设高端人才依然匮乏。当前,文化企业人才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文化产业发达城市,河南省缺乏文化建设发展方面的高端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因此,亟需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吸引和培育更多既懂经营又懂文化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将创意文化、中原文化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专业人才。

二、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落实“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部署，推动我省文化改革发展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进展。坚持文化高质量发展，主动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提升艺术创作质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文化产业发展和市场监管水平，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效，提升文化工作保障能力，推动河南文化繁荣兴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中做出更大贡献。

（二）目标任务

1.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艺精品工程、文化惠民工程，着力提升艺术创作质量，提升文化工作保障能力，推动河南文化繁荣兴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重要保障。加强大运河河南段沿线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打造华夏文明核心区展示平台，让文物保护利用融入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企业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业务合作，做好陈氏“太极拳”申遗、宝丰县说唱文化曲艺展演。

2.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揽精神文明建设全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行动，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全社会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引领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从细微处抓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核心价值观走进每一个角落、每一户家庭，凝聚起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3. 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不断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加强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培养，促进公民的身心协调发展，实现公民素质的自我展现、自我提高，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4. 全社会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风尚更加浓厚。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引导人们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崇德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5.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加快构建标准化、均等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中原文化大舞台”“舞台艺术送农民”“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文化惠民品牌，实现文化惠民全覆盖。创新服务方式，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如安阳的“321”文化共建模式、平顶山的“文化客厅”等多种文化服务模式，实现文化的精准推送。

6.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重点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推动文化小康顺利实现并不断巩固。

7. 加快建成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基地、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基地。明确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战略定位，做大做强祭祖寻根文化系列品牌，深入挖掘中原根亲文化旅游资源，建立紧密配套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体系。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把河南建设成为保护展示和传承弘扬中华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展示河南形象，让美丽河南在世界上闪亮起来。

三、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主要路径

（一）实现文化符号和元素融入发展，提升河南形象感染力

文化符号和元素是区域文化的集中体现。通过精心提炼中原文化符号和元素，将无形的文化内容有形化，融入到文化活动、新闻宣传、大众教育等各方面，有利于形成极强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9]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真正打造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彰显区域文化独特的魅力，不仅能够对外吸引眼球，对内提高向心力，而且能够促进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10]因此，有效提升河南形象感染力，要依托各类媒体传播文化符号和元素，在电视台、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全面融入特色文化符号和元素，并对其进行全方位解读、宣传和弘扬，逐渐构建起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和价值认同。大力弘扬河南精神、传播河南价值、凝聚河南力量、讲好河南故事，构造起具有国家意义的文化河南和印象河南，全面增强河南在国家和全球范围

内的感染力。同时,要加强对河南周易文化、儒释道文化和诸子文化等元典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阐发、展示,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建成一批主题基地,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依托登封少林寺、焦作陈家沟,建设少林武术和太极拳展示体验园区,打造世界功夫之都,把中原历史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融入到提升影响力过程中,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重塑影响力中实现传承创新。

(二)促进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发展河南文化生产力

一是加强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建设。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载体,加强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的指导巡检、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价,提高园区、基地的带动和辐射效应。推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相关工作,适时在各地市级文化文物单位推广,在全省树立一批文创企业先进典型和文创产品知名品牌。充分利用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和基金,重点支持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等新型文化业态发展。

二是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建设。积极拓宽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推动文化和资本对接,举办文化企业项目路演、融资对接和项目推介活动,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各类投资机构投资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扶持新业态扶持资金带动效应,在评审过程中引入观察员制度,让政府扶持项目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注入。积极搭建文化消费平台,探索文化消费新模式、新渠道,进一步拓展文化产品的销售渠道,推动相关产业的传承和发展。

三是不断扩大文化产业影响力。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河南省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需求,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推动中心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扩大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中原文化与国内外其他类型文化融合互动,积极带领企业参加国外和国内举办的各类文化产业交易活动。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整合节庆会展活动资源,形成一批集文化产品展出、评比、销售、招商引资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盛会。

(三)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强化河南文化的带动力

一是突出中原优势,打出中原品牌。充分利用中原文化资源,依托中华姓氏、宋文化、功夫文化、甲骨文文字、轩辕故里等根亲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发掘民间工艺、民间演艺、民俗文化,如开封汴绣、禹州钧瓷、平顶山汝瓷、洛阳唐三彩、朱仙镇木版年画、淮阳泥泥狗、西平棠溪宝剑、浚县民俗、宝丰魔术演艺、镇平玉文化、濮阳杂技等。深入开展“文明河南·欢乐中原”“教你一招”“舞台艺术送农民”“春满中原”“百城万场”等品牌文化活动,鼓励支持各地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实现市市有品牌、县县有特色。加快提升“大宋·东京梦华”“水秀”“隋唐百戏”等演艺品牌价值。

二是结合区位优势,构建大中原、大文化理念。根据各地实际,出台依托中原文化整合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长期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吸引民间资本,把具有示范性、能够展现地方文化特色的工艺艺术、文化名城和文物遗存丰富的地区项目列为财政支持对象。针对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出现的同质开发、无序竞争、低质开发、失当开发等现象,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对项目进行深入了解,统一协调。

(四)构筑中原文化城市群,提升河南城市群文化聚合力

一是加强中原城市群之间的文化合作共享。一方面,要持续强化中原城市群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挥中原城市群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遗产保护,推进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保护利用,拉近各城市间的文化距离。另一方面,着力推进公共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共同建设一批服务项目,建设全面覆盖、互联互通的特色文化产业带,加强区域间文化产业协作,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建立合理有序的文化产业地域分工和布局体系。

二是构建中原城市群间的文化传播平台。紧紧围绕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文化精髓,深挖功夫、姓氏等中原文化特质,以历史传统优秀资源为合作基础,共同组织好国家级文化交流活动,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全面提升中原城市群文化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全方位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重塑中原城市群的文化魅力。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惠民工程、体育赛事、文化市场合作机制,形成城市群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文化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

(五)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激发河南文化创造活力

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贯彻落实中央、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精神,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活力。出台深化文化体制和文化企业改革的配套政策文件,大力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逐步完成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科学设置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真正把文化企业特性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融入法人治理结构之中。

二是加快文化企业转型升级。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改革是相辅相成、一脉相连的，改革是为了促使企业转型发展，而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改革这一手段才能实现。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国有文化企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并推动并购重组。同时，全面加强媒体建设，扎实推动媒体融合，由原来的“体验式”向未来的“服务性”拓展，利用大数据进行整合营销和增值服务的开发，真正实现国有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增值，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以，要降低门槛，在国有资产控股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文化企业改制重组或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要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宜退则退，灵活运用产权制度。此外，探索性开展特殊管理股试点、股权激励试点、员工持股试点等多个试点，不断优化股权结构。

（六）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增强河南文化辐射力

1. 搭建平台载体。进一步建立健全“走出去”政策促进、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重点扶持以曲艺、功夫、陶瓷、民俗、杂技、姓氏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机遇，鼓励河南文化艺术团赴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演出。做好“河南文物精品展”赴国外展出，支持海外少林文化中心、太极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持续开展中原文化海外展系列活动，积极搭建中国文博会、中国文化年、丝路瑰宝展等交流平台，不断扩大河南文化知名度。

2. 讲好“河南故事”。利用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吸引海外人士走进河南、了解河南文化的发展现状，大力讲述“河南故事”。通过让海外人士到我省参观考察、亲身体验等形式，为海外新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和社团新力量讲述河南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快速发展的现状，通过他们言传身教，带动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和认同河南，增强河南在海外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3. 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充分发挥对外文化贸易对于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提升河南文化软实力、推进产业和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作用。支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创意设计、数字影视、网络电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以创意为核心、具有高增值性的新型文化业态，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新增长点。以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为基础，逐步在美、欧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文化贸易平台，形成合理布局。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内外重要国际性文化展会和文化活动，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产业交流合作。

四、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保障措施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两手抓”的思想原则，抓规划、抓项目、抓人才、抓高层次文化平台建设、抓高端文化品牌建设、抓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抓“文化高地”建设投入，促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提升跨越。[11]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现实意义，将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对文化建设发展的统筹协调和组织推动，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完善和细化相关政策措施。要加快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宣传思想文化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对外文化贸易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形成推进对外文化贸易工作合力。

（二）加大投入力度

建立公共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公共财政每年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创新文化投资机制，拓宽文化投资渠道，鼓励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向文化领域合理流动。设立相关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各地组建专业文化投融资平台，提高文化资产运行质量和效益。

（三）完善政策法规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离不开法治保障。要加快文化立法的步伐，在文化立法中既要注重保护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的科教人文资源，又要根据当前文化发展的新形势新需要，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法治保障，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完善文化行政执法体制机

制,规范执法程序,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通过良好的文化法治环境,不断推动全省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四)建强人才队伍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涉及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得到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支持和努力。要按照《河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河南省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要求,深入推进"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原文艺人才培养工程、优秀青年社科理论人才培养工程、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建设工程。突出问题导向,深入推进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改革,加快建设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制定切合实际的人才教育培训计划,综合运用集中培训、挂职锻炼、交流任职等多种方式,提高文化人才队伍综合素质与能力水平。

五、结语

在加快推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河南提出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为全省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充分彰显了推进文明河南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要求,持续深化文明河南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为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的理想信念动力、思想文化引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2]刘翠玉.河南省加快构建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战略思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3):82-85.

[3]谢伏瞻.在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河南日报,2016-11-07.

[4]陈关超.河南省文化产业连续 13 年高于同期 GDP 增速[N].中国文化报,2018-01-12.

[5]韩啸.河南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及对策[J].新闻爱好者,2012(12):15-16.

[6]张祝平.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J].学习论坛,2016(10):66-70.

[7]河南文化产业增加值首破千亿 比上年增 12.9%[N].河南日报,2016-09-27.

[8]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15 年河南省区域文化竞争力分析评价报告[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38-60.

[9]徐西平,杨晋,刘涛.弘扬中原文明 提升河南文化软实力[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3):89-93.

[10]刘新业.媒介融合背景下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策略[J].才智,2017(27):249.

[11]李庚香.河南"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指导原则和重大举措[J].领导科学,2018(5):27-31.

(责任编辑　姚虹)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n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Key National Cultural Highland in Henan Province

WANG Yuntao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key national cultural highland in Henan province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boosting the overall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in new era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mov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nan economy and highlight Central Plains. At present, Henan embraces advantages as policy foundation, material basis and inner motivation.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ow quality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adequate cultural input, lack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nd so on.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He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general idea, targeted missions, realizing path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portant cultural highlands in China.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cultivating regional cultural brand,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city group of Central Plains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 Henan province; national cultural highland;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brand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

袁升飞,鲍君惠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郑州 450003)

摘 要: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在申遗成功后,其保护和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存在开发利用工作处于浅表层次、遗产价值的研究挖掘工作尚待加强、专业人才短缺、世界文化遗产衍生发展和经济社会融合不足等困难和问题。对此,建议树立科学理念,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战略保障;注重人才培养,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智力保障;以人为本,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利用高新科技,全面提高遗产的展示利用水平,发挥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业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郑州;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通济渠郑州段;遗产保护利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09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48-04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与作用,将其作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组成部分。古都郑州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分布于登封市区周围,包括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岳寺塔、观星台、会善寺、嵩阳书院、少林寺常住院、初祖庵、塔林等8处11项历史建筑,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各类文物珍品6700多件。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包括通济渠索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附属文化遗产有惠济桥、荥阳故城城址、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纪信墓及碑刻、荥泽县城隍庙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为郑州城市发展储备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也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了关键支撑。与北京、上海、重庆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刚刚开始,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大潮中如何保护和利用,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助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现状

(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保护和利用工作

2010年8月1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9处世界遗产。申遗成功后,登封市从更高层面开展了一系列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分别成立了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和登封市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站,健全了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机制。2015年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和安防体系建设,目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和监管已部分实现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2015年“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在登封市举办,论坛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面向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等议题进行讨论,唤起了更多社会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感与自觉性,为登封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管理全市丰厚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近年来,登封市先后实施了少室阙保护房、遗产

收稿日期:2018-08-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郑州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的郑州城市文态研究”(ZSLX2018799)
作者简介:袁升飞(1978—),男,河南鲁山人,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馆员,从事文博研究。

监测中心、太室山白鹤观修缮、塔林保护维修、中岳庙峻极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监控体系等大小工程16个，涉及本体维修、安防消防、监测监控、环境整治等方面。今年以来，登封市成立遗产环境整治工作指挥部，全面开展保护嵩山和世界文化遗产综合整治活动，对违规违法建设等行为进行集中执法，同时加快实施各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围绕“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2018年登封市文物管理局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展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成果。观星台、汉三阙等文化遗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对公众实行免费开放。嵩阳书院开展的“拜孔仪式”，让游客参与其中，感悟儒家文化。这些宣传活动，使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群众，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之中，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二）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会议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一段重要河道，成为郑州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后的第二处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郑州市文物局每月按时向国家大运河监测预警平台上报监测数据和遗产监测报告，结果表明，运河遗产本体、水质水位、行洪功能、河床驳岸等状况一切良好。郑州市政府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以及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的有关要求，在惠济区古荥镇依托大运河附属遗产——纪信庙，建设郑州运河遗产博物馆，集中展示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相关运河文明。目前博物馆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中。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确立启动的“四大重点文化片区”建设是新时期针对郑州文物大市资源优势提出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针。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位于惠济区，众多遗产点位于惠济区古荥镇，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古荥运河文化片区建设。2017年国家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战略之后，市文物局向市政府提出建立“郑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领导小组”的申请，统筹全市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市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批示“结合古荥运河片区抓紧推进”，市分管领导批示文物部门抓紧落实有关工作。按照国家发改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要求和上级文物部门工作部署，市文物局、市发改委、水务部门、惠济区政府协调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摸底调查，对大运河文化带相关资源进行梳理并制定了《郑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题报告》。此外，我市还加强了与全国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联系：2017年参加了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中国联络员工作会议和理事会会议，作为会员城市确认组织章程、目标责任。2017年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出版了《郑州大运河》一书；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宣传片拍摄制作并于中央四套《国宝档案》播出。

二、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

（一）开发利用工作停留在浅表层次

两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的开发利用工作处于浅表层次，与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结合度不高。尽管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进行了河道及周边环境整治，遗产展示标识系统也在积极建设中，但全长约19公里的运河与沿线已形成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等并没有有机融合，游客体验、娱乐购物、留住设施等更是不足。“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8处11项历史建筑尚未穿点成线，各建筑缺乏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无法满足游客多样性需求。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线路长、遗产点多、周边景区和其他文化遗产也较多，游线、交通、人员等如何组织都需要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这一高度统一规划、顶层设计，减少或避免各唱各的调。

（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停留在表面

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挖掘工作尚待加强，深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文化影响力仍需不断增强，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申遗前期，各遗产点在历史文化价值研究挖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没有持续的文化研究发酵和新的遗产成果展示，申遗实现的文化轰动效益后继无力，尚未形成相应的学术研究热点和重点。以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为例，“运河科研工作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但对于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而言，这些是远远不够的”[1]。目前我们对运河文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对运河文化的价值认知缺乏基本的分类及评估体系，科研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跟不上，文化遗产无法活起来，无法说话讲故事，更谈不上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添力量。

（三）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短缺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专业性很强，目前，郑州市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文物修复、陈展设计等专业的人才极为缺乏，特别是学术领军人才、年轻后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亟需加强。人才缺乏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市文物保护、藏品整理、研究展示等业务工作。此外，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工

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对文化遗产工作者的素质要求越要越高。由于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导致队伍整体素质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提升，极大影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承、宣传和展示利用工作的建设步伐。

（四）世界文化遗产衍生发展和经济社会融合不足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工作中，目前尚存在文物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系统和跨系统多部门、多渠道、多行业联手合作成为短板，全域文化建设和大旅游协调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县市区各自为战，缺乏相互融合和取长补短，虽然形成了各自特点，但却与全市生态建设、城镇建设和观光旅游等没有真正结合起来。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例，“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处于低端环节，例如纪念品的品质较低、样式老化、品种单一，文化产业的链条延伸度低，游客参与、体验、表达的产业品种缺乏，尚未形成产业化、规模化、高端化的发展模式，其经济效益并未完全开发出来”[2]。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成果共享程度较低，社会经济效益战略性分析较为缺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衍生发展，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

三、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利用的建议和对策

为全面有效保护郑州市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切实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工作，促进遗产保护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民生，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支撑，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树立科学理念，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战略保障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利用过程中，需要着重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必须树立‘保护先行、保护为重’的理念，把‘保护’置于‘开发、利用’之前、之上”。[3]在确保文化遗产获得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促进保护、利用和开发的有机结合，同时加大文化、文物、旅游开发之间的融合力度，赋予古老的文化遗产以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风貌，使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既要满足当代人鉴赏及受教育的需要，又要保证后代人公平享有文化遗产资源的权利。”[4]保护和开发是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资源的永续利用，而不是为了眼前和近期的利益。既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遗产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也不能片面强调保护，忽视对历史文化的利用和开发。三是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尊重、保护各方利益，有效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尤其是调动遗产所在地居民的积极性，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包括地方政府、组织、居民，外来旅游者以及相关研究者等人员在内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以整体利益和目标为导向，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最后在整体的工作推进中，完成整体目标，使各方都能受益。总之，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世界文化遗产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二）注重人才培养，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智力保障

人才培养方面，建议委托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要注重培养既懂文保又熟悉旅游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市、县区要尽快出台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重点引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专业人才、旅游人才和相关的经营管理人才。有计划地选送专业技术人员到高校、科研院所学习进修。联合市、省、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深入挖掘遗产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积极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知名院校建立长期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协作关系，加强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和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推进我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此外，还需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文物管理机构人员的培养与培训。建议省、市文物、人社部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文物管理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讲解员、安全管理员等工作人员，在培训培养、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重点关注与倾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和社会宣传提供智力人才支持。

（三）以人为本，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以创意为先，以创意人才为本，需要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扶持，鼓励创意企业从郑州区位优势、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布局特点出发，从市级层面对发展我市文化产业的规划目标、发展战略、文化创意产业布局、重点发展行业和项目扶持、规范文

化创意产业市场秩序等。建议在“古荥运河文化片区”规划中突出创新创意、引进共享创业共享办公理念。“古荥运河文化片区”不仅是城市的文化消费区,也应该成为城市创意产业的聚居区,成为创意行业汇集和创新型人才激发碰撞灵感的“郑州文化硅谷”。“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依托的是历史,服务的是现代,目的是借助文物资源,打造新型体验,因此,在展示利用的过程中要对现代人的欣赏感受及消费体验进行充分调研,特别是对即将成为社会消费主流群体的90后、00后一代年轻人,关注他们追求文化品味,追求个性化消费的理念和消费习惯,引导并适应他们的需求是世界文化遗产展示利用工作能否具有吸引力和长远性、生命力的关键。

(四)利用高新科技,全面提高遗产的展示利用水平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施遗址、文物建筑、石质文物、纸质文物等数字化保护示范工程,构建文化旅游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文物展示、专题论坛、学术研讨等形式,打造以文化博览和文创产品交易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平台,创新多元文化碰撞、交汇与融合载体,建设多元文化体验之城。充分利用好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契机,牢牢抓住新时代文物事业发展新机遇,切实把以“古荥运河文化片区”和“生态促遗工程”等为代表的郑州文化工程,作为郑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工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文化品牌和城市形象展示的品质窗口,积极打造具有中原底蕴特色、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国际化现代化文化大都市。

总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是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保护和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更加艰巨,文化遗产资源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文化事业的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形成全社会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生动局面,从而全面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任伟.后申遗时期大运河郑州段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反思[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8.

[2]刘涛,赵君,李秀清.“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4(5):25.

[3]朱耀光,周远方.河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建议[J].河南社会科学,2016(4):114.

[4]李斌.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武夷山为例[J].行政与法,2013(1):5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Zhengzhou National Central City

YUAN Shengfei, BAO Junhui

(Zhe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Mount Song Civilization,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historic buildings in the “heaven and earth” of Dengfeng and the China Grande Canal Tongji canal Zhengzhou section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after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Bu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superficial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research and excavation of heritage value,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the derivativ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refore, we should set up a scientific concept to provide strategic guarante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talents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guarante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mprove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mprove the level of display and use of the heritag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untry. The important supportive role of the central city construction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 Zhengzhou;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Heaven and Earth” historical buildings; Tongji canal Zhengzhou secti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三维度”论证

牛东芳
(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摘 要:TRIPs协定开宗明义写道“知识产权即私权”,该宗旨目前尚未真正得到法律学界的认可,仍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是一项公权力或公权与私权混合型权利。一项权利放置于公权领域或者私权领域,将带来不同的法律效果。知识产权从封建王权脱身而来,涉及言论自由、公共福祉等利益平衡,自身已然具有极强的公权外观,如果不从更为深刻的法律理论上确认其权利性质,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将有可能被扭曲,损害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阻碍科技进步。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纵向”“横向”和“深度”三个维度分析来看,知识产权的本质为民事私权。

关键词:知识产权;民事私权;社会系统论;法哲学原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0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脱胎于西方封建特权的知识产权,它只是在近30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和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也是公司企业等经济主体竞相追逐的对象,争议标的额之大凸显知识产权的价值。然而,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它并没有像物权、债权一样被理所当然地归入民事私权范围,理论界对于其究竟属于公权、私权抑或公私二元的性质一直争论不休。

国内许多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对于知识产权的属性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吴汉东先生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更多地受到来自公法的保护、干预和限制,但这仍然是知识产权法自身要求和立法宗旨所必须的,并通过法律平衡和调整机制设计完成,这些情形没有也不应该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1]刘春田先生认为: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志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2]王利明先生认为:知识产权是同时兼备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性质的权利。[3]国内另一种以冯小青教授为代表的折衷观点认为,知识产权虽然有着个人私权利益在其中,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对公权的依赖使其内在属性兼具了公权和私权双重含义。在这一观点之下,知识产权由于具备了公权属性,因此它要更大程度上缩小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4]有学者则直接明了地认为,随着知识产权客体的扩大,以及知识产权日益侵害公共领域的知识财富,公权力对于知识产权的干预被不断强化,使得知识产权已然脱离私权领域而应被当做公权的工具。[5]

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讨论包含着众多层次的意义,它应当是一个立体而三维的深度证成而绝不仅仅是平面的阐述。对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探讨也并非简单的形而上的决定,它源自当前社会发展中由于对知识产权性质产生质疑而导致的一系列非法伤害,例如行政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过分干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私权利益未得到全面认可、公民对他人的知识产品的肆意滥用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对知识产权的性质认识不清。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是利用了公共领域中应当为全人类共有的知识,因此知识产权人在此基础上的知识产品不应得到私权保护,其他公民可以进行免费使用。又或者认为,知识产权是国家干预下赋予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本质上是公权并非完全属于私权,知识产权人要服从公权力对它的配置。这极大地缩小了知识产权人的私

收稿日期:2018-06-28
作者简介:牛东芳(1990—),女,河南郑州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

权利益。正是由此，本文期望通过对知识产权属性的多角度论证而使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归本正源，还原其私权面目，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天才之火”不被熄灭。

二、知识产权公权与私权属性争论的本质

（一）知识产权性质争议的原因

造成知识产权性质争议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在于知识产权的历史沿革。从历史上看，知识产权真正的产生时间要从 1623 年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垄断以及摒弃刑法和由此产生之没收的法律》（简称《垄断法案》）算起。在此之前，知识产权只是以国王特权的形式存在着，国王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作为个人的荣耀的象征赐予个人，它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发明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深层次的人格利益，而是为了避免技术外泄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维护封建统治地位，这些特点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内涵。而到了《垄断法案》《为鼓励知识创作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法》（简称《安娜女王法》）和《拿破仑法典》，发明人、作者和商标权人的利益才正式得到保护。在这三部法典中，知识产权的核心轮廓被构筑起来，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得到重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由此开端。由于知识产权在封建特权和公权领域内的徘徊良久，并没有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纳入民事权利范畴，使得知识产权的性质晦涩难辨。

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依赖公权力。知识产权的权利强度类似于物权，但传统的物权可以由权利人凭借一己之力来维护，物权人通过控制物权的客体，对客体进行占有，从而享受到物权的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实现物权的价值，而知识产权却在这一点上有着重大区别。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本质上传递的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经过传播和利用，能够产生出巨大经济利益或者人身利益。尽管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能够凝结在具体实体物上的信息，但仅仅控制单一的实体物，还不能实现权利的垄断。因此，知识产权人很难独自阻止他人利用这种信息（尽管商业秘密也可以成为一种信息的保护手段，但权利人需要自己承担风险，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后，无法取得知识产权这样便捷高效的保护），不得不依靠公权力的统一管理，于是，知识产权需要对其专利、商标等信息到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形成了以公开信息让渡一部分私权来换取一定时间内的合法的垄断的局面。由于公权力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识产权也时时刻刻都在与公权力打交道，因此它与其他民事权利似乎有了差别，导致知识产权的私权中融入了公权的因素。

最后，知识产权涉及了与言论自由、公共福祉等利益平衡问题，它不是权利人能够肆意获利的权利工具，它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域以及强度范围内进行私权使用，而当社会对于某一具体知识产权发生公共性质的需要，知识产权也必须让渡出其私权利益，来服务公共事务，例如知识产权法中必要的合理使用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就掺杂了强有力的公权行政干预色彩。这一点也使得知识产权的性质具有迷惑性。

（二）知识产权公权与私权属性争论的根源

知识产权属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 3 个多世纪，知识产权是属于公权范围还是私权范围争论的意义在于知识产权人能够在多大的领域内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和经济利益。如果将知识产权看作是一项公权，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对知识产权人进行干预，例如在公共利益以及国家调控面前，公权力能够更加强势地要求知识产权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无限制地扩大知识产权的公权范围。如果将知识产权定位于私权框架内，那么将更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人在处理知识产品时，可以像处理其他私有财产一样对知识产品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三、从“三维度”定义知识产权私权属性

（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在社会横向系统中的映射

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社会法律制度，它同其他法律部门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因此要对知识产权的属性进行考察，必然要将它同当时横向的社会结构相联系，在它所依附的社会系统中寻找证成论据。近现代的任何学科派系的学者，对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事实上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社会系统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也相互制约。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于知识产权的定位以及属性的理解有着关键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梳理出知识产权产生的社会环境，从而确定知识产权的性质。

在社会系统的构造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放入政治结构——市民社会财产法结构中来剖析知识产权的性质。

在政治结构中，它包含的内容是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管理与被管理以及平等主体之间的交往。有

国家后产生了政治观念,而个体是组成国家的成员,也是家庭的一份子,个体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市民社会。因此,在政治国家中,是由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三个子系统组成。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就将"伦理"分成了三部分:国家、市民社会以及家庭。在调整上述三个子系统时,应当分别运用公法、市民法和伦理道德。在权利配置方面来看,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法和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私法表现为"公权力—私权利"之间相辅相成而又紧张对峙的关系。[6]政治结构之下的知识产权上位系统便是市民社会结构。社会成员最初的状态是自然界完全自由的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以及财产利益,按照一定的契约组成了具有社会秩序和其他保障措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成为了市民。因此,市民社会的组织目的就在于维护个人人身和财产利益,在这一目的基础上,形成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的特征就在于主体地位的平等,市民法是以私权为本位。按照罗马法体系,市民法是由人法、物法和诉讼法构成。这种立法体例不仅为大陆法系所继承,也深深地影响着英美法系。财产法是由物权法、债法和知识产权法构成。这三者的区分标准在于它们调整对象的属性不同。知识产权虽然可以为权利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外观极为类似于绝对权物权,但它仍然没有被划分进物权领域,原因在于,知识产权虽然也是一种绝对权,但知识产权的客体属性却更特殊,知识产品不像物权客体一样能够明码标价,依靠权利人自身就能够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它极易被其他社会成员滥用而得不到有效制止,必须依赖法律的强制力来将权利垄断归还给知识产权人。另外,知识产权人在利用知识产品收益时,还要承担比物权更大的社会公益责任。而物权和知识产权放诸财产法系统中,在于它们在进行权利利用以及受侵害寻求法律救济时都必须通过债法的方式进行。

通过对知识产权存在的社会系统的框架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的属性。例如,在市民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时(如主体地位是否较为平等、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达到了何种平衡的条件下,出现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二)历史观第二维角度下知识产权制度的诞生

公元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以专利权和著作权为代表的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案诞生,这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雏形初现。事实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很早的中世纪就已经发源,却到了这个时候彻底立足于世界之中,不免让人遐想。在中世纪,出于维护王权的需要同时提升国力来抵御外敌,知识产品事实上也受到了国家保护。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专利法是英国于1623年颁布的《垄断法案》。在此之前的1602年,Darcy v. Allen一案暴露了在封建特权时代的专利保护实际上是王权垄断的产物。该案是由Allen提起,他认为被告销售的纸牌侵犯了其专利利益。而被告则认为,这种垄断实际上干涉了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而且这种随意的垄断导致价格上涨以及质量的不可控,后来该案原告败诉。许多年后,经济学家利用该案来说明"特权"与寻租的关系。如果有方法能够通过特权来垄断社会资源,那么从事创新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少,并且这种垄断并没有创造经济价值和技术进步。因此到了17世纪,当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经就绪,科技的存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时,拥有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们不甘心技术成果被他人窃取,也不愿将科技成果被王权垄断,因此在革命中通过了《垄断法案》。该法案禁止王权对专利的垄断,鼓励社会真正的创新,并且拥有对该创新的所有权。

国王将自己需要的著作或者专利以封建特权的形式授予给出版商、引入科技的外国人或者其他王室成员,尽管知识产品得到承认和保护,但是知识产品真正创造人的利益被搁置一旁,因此,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保护。直到17世纪,在英国发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系统时,尤其在思想意识领域,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以及建国要领形成体系后,司法中的普通法脱离王权管辖范围,议会的决议能够压制王权的肆意扩张,市民阶级开始重视自身劳动所得的私有财产权,并将私有财产权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意识要素已经达到了耦合的平衡,尽管英国尚未成为世界最强国,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诞生已经有了配套的环境。因此,在《安娜女王法》中,原先将著作权授予给出版商转移给了作者。这部法律被称作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案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谁最终得到了著作权,而是作者可以自由地获得著作权,并对其进行收益、使用和处分,不需通过王室授予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利益。因此,《安娜女王法》是一部真正保护私权的知识产权法案。

(三)知识产权私权性质的法哲学第三维度论证

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哲学原理,近现代学者提出

了不同的产权理论。如洛克、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人格财产权理论、萨伊的“无形产品”理论、麦克劳德、凡勃伦的“无形财产”理论以及考特、尤伦的“知识产品”理论等。[7]这些理论为我们建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及完善知识产权疏漏之处提供了丰厚的学理基础,它们论证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正当性,为我们对知识产权的私权认知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

1. 劳动财产权论在认定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上的应用

劳动论在认定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方面最早是由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引证的。1769 年,英国最高法院受理了一个关于著作权是否能成为私人财产权来继承的案件。法官们认为,有形财产可以被继承人所继承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那么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所创作出来的著作也应当享有独占的印刷和出版权。这一案例当时引发了法官们的争论,但大多数法官还是支持了曼斯菲尔德法官的意见。他认为,按照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者付出自己的天赋和辛勤劳动而创作出来的著作并获得金钱收益是具有自然法上的公正性的。作者在出版前和出版后同样拥有该著作也是合乎自然法的原理以及道德上的恰当性。这部著作所享有的权利是属于私权范围,可以被继承人合法继承。这个意见在后来几个世纪中,都被大不列颠王国所肯定。该案是最早用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来说明知识产权是属于私权领域的权利。

后来,陆续有许多法学家对知识产权私权属性进行的主张和说明。1878 年,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向英国皇室委员会主张专利和著作权在法理和道德上应当属于个人私权。他认为,法律的公正性体现在社会成员能够承担和享受自己行为导致的利益和损害。如果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付出天赋和劳动取得了知识产品,那么该产品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归属于该社会成员。学者柯慈纳(Israel Kirzner)也支持这种论证。他认为,自然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将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并将产品创造出来,这种“经由创造的所有权”应当归于个人,这种理论(被称作是“探寻者—保持者”理论)诠释了知识产权私权的合理性。知识产品正是创造者利用自己的智力天赋和思想资源并结合恰当的劳动所得到的成果,这种劳动成果相比于有形财产是艰辛并且更难取得的,对于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权利毫无疑问属于个人。这种归属按照洛克的观点,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自然法上的先天性。

2. 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中的“自由意志”和人格财产权精神

到了 18 世纪,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由交易的需要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在政治、经济、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冲击。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个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时期,德国自由主义法学家康德提出了“自由意志”理论,该理论拓宽了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基础,也为知识产权私权化在另一个层面提供了助力支持。这一理论同样为知识产权私权属性提供了依据,甚至说,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更需要自由意志理论来支撑。知识产权的客体实质上是无形物,权利人很难对其进行自然占有,而知识产品作为权利人意志创造的外在对象,更加需要纯粹法律上的占有来保护,使得个人财产不受干扰。从共同意志层面来说,知识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财产权的一种,决定因素并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对知识财产的承认和尊重。但是,知识产品本质的无形性也超出了财产权人的控制能力,因此它也更依赖于国家的暴力机关来履行职责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黑格尔将知识产品看作是个人人格的衍生品,它反映出的人格在更深层次上来说是意志自由。如果将知识产品放入公权理论,那么个人的意志自由将受到强力的不合理干涉,这不利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形成和意志的自由交流,势必将阻碍社会的进步。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意志自由决定了知识的高度。

3. 社会工具论对知识产权性质的认定

在知识产权制度构建中引入社会工具论的经典著作是《知识财产法哲学》,它是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德霍斯(Peter Drahos)于 1996 年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在当代知识产权法领域掀起了理论研究的热潮。

第一,知识产权是在“抽象物”上设立的权利。德霍斯认为,抽象物是一种大脑的智力思考,它的存在是独立的也是不可否认的,抽象物也是知识产品内部所包含的精神构思架构了通向知识产权的桥梁。最早有抽象物的记录是古典哲学斯多葛学派,罗马法上的“无形物”(incorporeal things)也就是“不可触及的物体”(intangible object)。但当时罗马法上的无形物指法律制度中种类繁杂的权利(不包括所有权),德霍斯对财产的有形与无形的划分,并不决定于权利本身的不同,而是在于权利的客体。抽象物的特征有无形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和时间,例如信息、数字或者某项功能,这些抽象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依赖人们的大脑活动而产生,可以说是人

类在有形物上添附了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抽象物的无形性，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说，抽象物并不能实际的列举，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假设的范围，因此法官在判断抽象物的界线时比有形物困难许多。但是，社会的发展需要确认抽象物的存在和价值，它已经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利益冲突日渐激化，因此财产权制度应当在此发挥作用。在德霍斯看来，知识产权应当属于无形财产，这就像“法律假定在某些抽象物中存在着权利。盘尼西林的分子式和化学结构即是抽象物的例证，许多人需要、使用并依赖于这些物，由此产生了基于抽象物而形成一种新的财产权利形式”[8]。

在识别抽象物时，应当注意到抽象物与有形财产之间的关系。在罗马法上，无体物对应的是有形财产主观拟制的财产权利，也就是以实在物为客体的财产权，这样一来，无体物与实体物和物质化财产就有了相似性和关联性。[9]基于罗马法对无体物的认识，德霍斯提出了抽象物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其一，抽象物本质上无法存在于客观世界，如果想被外界感知获得形而上的特征，那么就需要将抽象物表达出来。正如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如果抽象物的创造者希望获得财产权的认可并能够主张知识产权保护，则需要将抽象物具体化、有体化，例如在专利制度中的专利说明书，或者在商标制度中提交给登记机关的商标图样。通过将抽象物表达出来，创造出抽象物的有体外衣才可以使抽象物获得财产权的认可。其二，通过控制抽象物的有体形式展示出财产权的意义。根据上述，抽象物只有在获得具体的形而上的表现形式之后才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除此之外，这种控制抽象物有形的形式也是创造者实现其私人利益的途径。德霍斯认为，抽象物可以被包含在各种有体物之中，当抽象物的所有人例如著作权人、专利权人以及商标权人正当地获得抽象物的财产权后，就能够获取无限多种类和数量的有形物，正如专利权人通过申请专利对技术垄断，在该技术指导下的机器、设备等将都有可能成为权利的垄断对象。因此，抽象物成为未来世界攫取有形财产的有力杠杆。当抽象物中的财产权利被法律认可后，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对抽象物财产权利以及财产关系的安排意义重大。

第二，抽象物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并应当被赋予私有权利。财富或者资本通常来说是私权的来源。在过去，评估社会财富分配和集中形式时，主要考虑的是资本的分配范围，通常是以生产工具或者设备厂房等加以识别。然而，在许多有形资产的背后，却有着抽象物的支持。美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魏步伦认为，现代工业企业的主要资本基础已经转变为无形物。现代企业能够在同行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核心要素是对某种无形物的垄断。例如对商誉的垄断，有了商标法的保护，消费者可以通过商标背后传达的信息来识别商品，现代市场营销的核心是创造出一种印象，以说服消费者选择购买对其有价值的产品。

第三，抽象物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密切相关。前述了许多与抽象物相关的法律理念，与抽象物最紧密相关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架构。抽象物由于其并不会因为他人使用或者侵犯而受到减损，且抽象物可以通过有体化来控制现实世界的物，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有所限制。它所获得的报酬不以抽象物的存在时间为限度，而是由特权形式授予其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的独占垄断权利，这一能够超越他人的暂时性权利就是特权，一旦超过该特权限度即不受保护。在知识产权中，抽象物上设立的个人财产权垄断会在社会当中构成一种特定的“人身依赖关系”（person - dependent relationship），正是在这一特殊性之下，如果放纵个人对知识产品进行无休止的利益追逐，那么将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限制公众的个人自由。如果对所有的抽象物都放任个人追逐财产利益，那么在抽象物和财产权之间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令人感到担忧。一旦个人主动进攻性财产权种类增多、范围扩大，他人的消极自由范围就相应地缩小，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限制的主体，总会在某个层面遇到知识产权的障碍，社会长期面临不受干预权利的侵扰，久而久之就会酿成权利滥用的危险。因此，这种滥用的财产权制度不能促进社会这个共同体的进步反而阻碍了自由，根据这一结论，德霍斯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有碍自由的特许权。”

二是打破了公共的分配正义，扩大了贫富差距。如前所述，知识产品是创造者付出智慧和劳动将抽象物具体化的过程，要刺激创造者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并且达到自然法上的私权保护目的必然要给予创造者以知识产品私有财产权独占性的保护，知识产品的独占性使得知识产权人通过一个抽象物控制更多的具体物或者通过一个抽象物而垄断更多相关抽象物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其他的社会成员便丧失了自主研究的能力和自由，必须依靠抽象物所有人的许可进行活动，社会资源极大地倾斜向了抽象物所有人。在抽象物上设立财产权极有可能

造成增加社会少数人的力量和个人的威胁程度的后果,需要由赋予个人权利的法律进行限制,使其不逾越自由的边界,保证社会在合理的轨道上运行。而抽象物的这一危险恰恰与知识产权相联系,知识产权的客体就是这些捉摸不透的抽象物。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产权客体往往与社会的重要资源相联系,如果对抽象物的拥有者不加以任何限制,那么该知识产品一旦获得了知识产权保护,个人贪婪的本性将使得其无限制地追逐个人利益,抛弃社会契约的原则。

因此,在社会工具论的观点看来,知识产权无疑是一种个人私权,但这种私权属性在人的本性面前可能面临社会危险,如果这种私权没有合理地被限制,知识产权不仅不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反倒有可能使社会重新进入一种知识产权人的"奴隶制社会"。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德霍斯提出的知识产权工具论就是用来解决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负面影响。总而述之,德霍斯的知识产权工具论是从相反的方向证成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四、结语

知识产权属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 3 个多世纪,知识产权是属于公权范围还是私权范围争论的意义在于知识产权人能够在多大的领域内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和经济利益。如果将知识产权看作是一项公权,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对知识产权人进行干预,在公共利益以及国家调控面前,公权力能够更加强势地要求知识产权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无限制地扩大知识产权的公权范围。如果将知识产权定位于私权框架内,那么将更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人在处理知识产品时,可以像处理其他私有财产一样对知识产品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知识产权应属民事私权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其中公权力干涉的程度如何,都不应将其归入公权力范围或者公权与私权交叉部门。只有如此,才能激励创造者更加积极地为社会贡献聪明才智,使"天才之火"代代延续。但这并不是说知识产权人就能够无限制地垄断知识产品,有权利就有限制,知识产权人也必然要对社会公益有所付出,这也正是社会契约精神的精要。

参考文献:

[1]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2005(10).

[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

[3]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25.

[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5.

[5]李永明,吕益林.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8).

[6]金海军.知识产权私权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

[7]吴汉东.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J].法学研究,2001(6).

[8][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M].周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34.

[9]吴汉东.法哲学家对知识产权法哲学解读[J].法商研究,2003(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Three – dimensional" Argu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IU Dongfang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TRIPs agreement explicitly states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private rights", which has not yet been really recognized by the legal circles. There are still views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a mixed right of public power or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A right placed in the field of public rights or private rights will bring different legal effec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comes from the feudal monarchy and involves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such as freedom of speech and public welfare.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identify the na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from legal theories, avoid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which may lead the harm to one's proper right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clear all the problems referred above by studying in three dimensions: vertical, horizontal and depth. Then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s a private right from its historical origin under the analysis of western property philosophy.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ivate rights; social system theory; philosophy of law

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表达

宋天骐
(烟台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农地"三权分置"的两种声音都有一定理论依据,但反对论中的立论依据解释方向有误,支持论中的解释路径差异化,导致支持论本身的种种矛盾。肯定农地"三权分置"的积极意义,需要全面理解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其立论根源在于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农地"三权分置"在话语表达上不应过分苛求,"三权分置"和"三权分离"具有同样的表达效果。将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权利用益物权的观点有待商榷,政策目的、物权功能、权能分离理论只能辅助立论,而不能成为立论的本据。土地经营权的权利配置应注意基本权能的特殊性。

关键词:三权分置;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权利配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1
中图分类号:D9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58-09

十几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不断关注"三农"问题[①],而处理"三农"问题的基点在于妥善处理农村土地问题[②]。由于历史和国情,我国农民普遍形成了对土地的依赖和特殊情感,土地既是其成长的原点,也是其生活的依靠。近代以来的土地改革,让农民从饥饿贫困的边缘走了出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性改革,不仅让农民收获温饱,更引导他们迈向小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基于当时农村现状的土地产权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农村的经济变革。换言之,制度红利几乎用尽,农村土地亟需变革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收入。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和放活土地经营权"。于此,我国农地"三权分置"作为全国性政策的设想初步形成,但"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三权分置"法律制度还未完善。笔者梳理学界对"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和土地经营权性质的争论,提炼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表达,并希望对未来相关农地产权制度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之辩论

不可否认,农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设想来源于经济学界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持续关注。经济学界基于"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推演出农地"三权分置"的权利配置方式;然而,在此权利配置已上升为国家政策时,法学界仍存有不同声音。这些争论中,既有应否构建新型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之辩论,也有农地"三权分置"的基本概念是否合理之辨析。其中,"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和性质之争尤为突出。

(一)"三权分置"抑或"三权分离"的话语表达之辨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语言学视角下,相较于"三权分置",采用"三权分离"的话语表达更具有优势,其理由主要有:其一,政策话语表达应当一致,尤其是针对同一问题,前后矛盾的政策话语会误导已

收稿日期:2018-08-17
基金项目:烟台大学2018年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三权分置:土地流转与土地商事经营的法律透视"(YDYB1803)
作者简介:宋天骐(1992—),男,山东威海人,烟台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经形成内心确信的相关主体。1978 年以来的农地产权改革,改变了最初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产权配置方式,代之以实施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使用的政策话语是“分离”,法学界的话语也采用“两权分离”。其二,农地产权改革的探路者采用“三权分离”的话语表达,江苏、上海、四川等省市的政府文件都采用“分离”的表达方式。③其三,权能分离理论支持“三权分离”的话语表达。法学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三权分离”理论,政府文件中采用权能分离理论表述“三权分置”不够准确。其四,尊重语言表达规律。“置”的设立含义与“离”的分离含义不同,“离”更突出权利的来源和所有权行使的弹力性。④

笔者认为,就“三权分置”或“三权分离”的话语形式而言,其实质并无不同(为行文的统一,本文采“三权分置”的术语表达)。“置”与“离”在农地产权改革的法律语言体系下,二者都可体现对语言规律的尊重,都能阐释产权配置、传达政策意蕴,可以一体使用,但同一文件中应保持一致。⑤针对农地产权改革这一同类问题的政策话语,并不强行要求字语的同一性,能够准确传达政策意蕴、解释改革内容的表达为佳。农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意蕴本在于创设,“置”能够契合其意,“离”强调的权能分离在说明权利的来源和创设意味上较弱。⑥至于改革试点中的话语表达,其本就是探索和开辟之举,却并不代表试点的话语表达就更准确。

(二)土地经营权配置之争

在法学界,关于土地经营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些声音总的来说可分为反对与支持两种意见。反对者称,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路径不符合物权法逻辑,而且违背“一物一权”[1]原则。定限物权的生成,都必须具备相应母权、基础,而所有权是产生定限物权的母权、基础。[2]依据权能分离理论和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表征,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二者都包含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所以,二者在内容上相互冲突,在性质上无法兼容。试图寻求突破的“权利用益物权说”,在比较法上没有可靠依据,其权利为客体的观点,不仅不能脱离与土地的关联,而且易使物权的行使与实现产生混乱。相对而言,现有农地“两权分离”的理论架构可以破解农地流转经营的困境,避免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不利法律后果,确保土地的农业用途,规避集体成员失地的社会风险,因此,无需重新配置农地产权。

支持者虽认可“三权分离”的权利配置,但对其权源与合理性论证有所争议,主要有三种论辩,即权利用益物权说[3-5]、农地使用权说⑦、所有权行使方式说⑧。

权利用益物权说认为,现有用益物权客体过于狭窄,不能充分发挥权利配置的效能,不利于资源更高效地配置,应当依据多层权利客体理论,拓展权利客体的范围,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以自身本权为标的设立土地经营权。换言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既是用益物权具体类型之一,也可成为其权利客体,从而土地经营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客体层次分明的两类用益物权,彼此之间可以共存,但不发生冲突。

农地使用权说认为,当前观点对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解析存在误区,其原因在于顶层制度设计的矛盾——担保立法层面中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却严格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民法解释上有“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而“转让”的权利限制程度显然重于“抵押”,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却严格限制其“抵押”,这有悖于民法原理。集体成员承包土地的资格当然涵摄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内容之中,因此,认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可以分离出其本不含有的内容,就已经陷入了理论误区。为了高效配置集体土地资源,不应局限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与否,而应统筹农地使用权体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体构建,同时推进土地产权市场的一体建设,让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享有的土地权利发挥更大价值。换言之,“三权分置”的权利构造可以是“集体土地所有权 + 成员权 + 农地使用权”。

所有权行使方式说认为,土地经营权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脱胎其中,却并非权能分离的当然产物,而是具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之一。用益物权具有支配性,可以直接支配客体而发挥其使用价值;具体而论,土地经营权就是直接支配土地而利用土地使用价值的定限物权。复杂高深的权利配置理论未必能将“三权分置”政策解释清晰,简洁明了的基础理论延伸有时也能发挥强大作用。从土地所有权的内涵着眼,将权利行使方式多样化,既可以避免繁琐设计的制度成本和理论负担,也可以有效解释政策内容,实现政策目标。

(三)“三权分置”的解释之立论

制度演进过程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的内含性特征⑨,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推进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内含着路径依赖的特点。换言之,制度生长的文

化、经济、社会等背景，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制度演进必须遵循的轨迹。回顾近代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改革，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和贯彻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是农村自生的土地经营形式——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完全推广也依靠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理论上，对土地改革政策和法律依据的理解和阐释，也多依循着路径依赖的特点。上述反对论的权能分离理论、“一物一权”都是在既有内容基础上的演进，支持论中的权利用益物权说提出的权利客体多层理论、农地使用权说对农地经营权利的整合也依赖固有民法理论，并未脱离农地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虽然诸多观点都有着路径依赖的特征，但准确理解“三权分置”的观点应当达成一致。

1. 反对论提出的权能分离理论解释存在偏差，“一物一权”观点理解狭隘，而且回避抵押融资的问题。第一，用益物权不是所有权权能分离的产物，土地经营权也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分离的产物，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分离来解释土地经营权的权源，就已经陷入误区。第二，“一物一权”原则不意味一块土地上不能共生两个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在性质和内容上并不冲突，可以共生，也可共存。第三，农地“三权分置”可以走出抵押融资困难的迷途，既让务工农民保证农地收入，也让新型农业经营者摆脱资金困境，走向农地规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康庄大道。

2. 支持论的多层权利客体理论使用益物权体系混乱，而整合农地使用权的观点也有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制度演进过快、基础理论准备不足等缺陷。第一，为了解决反对论所称的内容冲突，学者提出多层权利客体理论以层次化区分土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两大客体，然而无论何种层次的权利客体，最终都无法摆脱对“土地”的利用。因此，理论上划分用益物权的客体层次，实践中无法发挥作用。土地之上的权利行使，即使经过多次权利流转或客体嫁接，都难以脱离“土地”这一紧缺的生产资源。作为客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成为土地经营权作用于土地的媒介而已，并无很多实践意义。我们知道，物权的支配性在于其对物的直接管领和控制，而配置物权关系应当简洁明确，以避免物权关系不适当复杂化架空物权的支配性。[6] 多层权利客体理论为求解释的便利性，强行复杂化用益物权客体，也使得权利行使和实现在理论上复杂化。第二，长远来看，统一的农地使用权概念利大于弊，它可以简化权利体系结构，整合土地利用。正因如此，现阶段的权利整合显得步伐过大，而农地使用权的基础理论研究尚有不足，会导致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同时，短期内完成这样的权利整合，也会导致制度成本过高，整合效率低下。因此，现阶段解读“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不宜采用农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理论。

“三权分置”政策致力于释放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经济活力，实现农民集体和集体成员的土地权利的增值，以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应当准确理解其政策意蕴，不盲目追求理论创新，而是扎根土地所有权基础理论，做到政策理解的合理合法、理论解释的清晰明了、制度设计的简洁可行。上述几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难掩其解释路径的不足。

笔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理论内容丰富，可以解释“三权分置”中土地经营权的应有内涵，避免理论误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转包、互换、出租等土地流转方式，其实也是权利行使方式。土地经营权能够抵押、转让，既是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也是权利行使方式的演进。政策中的“放活土地经营权”，实质在于释放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力；集体土地不能抵押、转让，但权利可以抵押、转让。[10] 传统上，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包括土地承包，但严格限制处分；新形势下，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具化为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不是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分离产物，也不是土地所有权具体行使的方式，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性行使方式。此外，对土地经营权的行使会架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担心是多余的。

举例而言，集体成员甲承包一块集体土地，期限为 30 年。在第 10 年时，该集体成员计划外出务工，遂将该块集体土地转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乙。因该地块与乙自己承包地相邻，乙将两块土地整合以便于规模经营。次年，因资金问题，乙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进行融资。到期后，乙未偿还债务，银行拍卖该土地经营权（限制为农业经营），丙拍得该土地经营奴。期间，乙仍需向甲支付土地应有的费用；30 年期限届满，土地仍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甲仍可要求承包土地。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不会影响土地经营权的行使和实现，即便因抵押期限届满无法偿还债务而拍卖土地经营权，也不会抵销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行使土地承包的资格。反对论所谓的集体成员失地的风险没有出现，现阶段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可实现。

二、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定位

在制度设计上，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是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焦点争议之一。我们知道，《物权法》第5条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因此，现行物权制度体系下难以出现法律规定之外的用益物权种类和内容，也就无法为“三权分置”政策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实际上，物权理论和立法实践都有推导土地经营权性质的营养因子，深耕其中，便得几味。

（一）土地经营权的概念之辨论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政策话语是否符合法律表达，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并不符合法律语言学的要求，理由主要为两点：第一，“经营”语意多元，不能准确表达经营主体的权益；第二，土地经营权不能体现政策意蕴中的创设之意，其语意偏于中性。④

笔者认为，法律语言学表达法律概念、诠释法律内涵，并非僵化地套用固有概念，而且法律属性的概念有法律特有的意蕴。“经营”虽语意多元，但都能体现使用和收益的权能，尤其是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股份置换，其无不体现经营的特征。政策意蕴中的创设之意，并不在于将法律概念新型化，承认土地经营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这本身就是创设。

（二）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之探讨

理论上，对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有着不同讨论，主要有“债权说”“物权说”“二元说”三种。至于“无用说”⑪以及“废弃说”⑫两种观点，因与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意蕴相悖，不能自我理论周延，也限缩理论解释和创新，有较大的局限性。诚然，政策和经济学表达上的权利用语与纯粹的法律概念用语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法律解释的逻辑周延。无论是“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还是“经营权能”的解释，都无法否认土地的耕作与经营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本就是经济学上的。经济学上的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正如经济学上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所得出的农地“三权分置”结论，并不会影响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一样。因此，下文主要针对“债权说”“物权说”“二元说”三种观点展开讨论。

1. 债权说

“债权说”认为，土地经营权与不动产租赁权没有实质区别，土地经营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债权而已。不动产租赁权可以解决农地流转的问题，理论创新的土地经营权并没有更大价值。从其权利来源而言，土地经营权派生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土地流转合同产生的[7]，其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依据，只有在农地流转时才有价值[8]。从实证法而言，物权法定原则在理论上有缓和的趋势，但这难以动摇理论根基，新型物权的构建必须有物权法的确认，现阶段为适应政策要求和农地流转需要，可以赋予土地经营权一定的担保功能，但必须承认其债权的性质。

2. 物权说

“物权说”论证视角多元，从多层权利客体理论而言，土地经营权是区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型用益物权，其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客体媒介，间接作用于承包土地，发挥农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3]从政策目的和物权功能而言，土地经营权不同于所有权的使用权能，创设新型用益物权不存在现实障碍；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原初目的就包含将“三权”置于私法的同一层次上一体保护，而且不同流转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都具有物权功能。[9]从权能分离理论而言，土地所有权权能分离方式可推导出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具体的弹性分离和土地信托的权能分离方式还可论证土地经营权权能的独特价值。[10]

3. 二元说

“二元说”认为，对于土地经营权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第一，以流转方式的性质差异来界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物权性质的流转，如转让、互换，土地经营权就属于物权；债权性质的流转，如转包、出租、入股，土地经营权就属于债权。第二，以权利的分离路径和产生基础来区分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确权确股不确地之土地经营权具有物权化的合理空间，而确权确地之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比较妥当。⑬

笔者认为，“债权说”只看到土地经营权作为物权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对债权救济保护效益的相对弱质化、权利公示效果的相对化、融资担保性的差异化视而不见。该说看到了土地经营权具有的担保功能，却不敢承认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同时，该说批驳“物权说”解释路径的种种不足，却没有直接支持债权性质的立论依据。“二元说”看似类型化分析不同生成路径的土地经营权，却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无论是确权确地，抑或是确权确股不确地的两种类型⑭，都不会影响集体土地上原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和财富增值功能，不会消灭农民的身份资格和土地承包资格，也就不会改变土地经营权的性质。

而依据流转方式的性质差异来类型化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大有缘木求鱼之意。权利犹如行驶在大道上的汽车,流转方式则是具体路况,汽车并不会因为具体路况的差异而改变其为汽车的本质;同理而言,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也不会因流转方式的差异而改变。

"物权说"肯定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但解释路径的差异化使得其物权属性扑朔迷离。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有权利平衡之意,而具体阐释权利平衡的路径却难以圆满。多层权利客体理论提倡的分层化客体,使得"三权分置"错位,而让土地经营权独木难支。就比较法而言,其基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权利或动产用益权,主要是为特定人的生活需要而设定的[11]4,也会因权利人的死亡而消灭、不能被转让或继承。相对而言,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转让、继承,也有承包期限和农业生产主体的要求,这与用益权在权利内容、存续期限、权利主体等方面皆不相同,因此比较法上用益权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而从政策目的和物权功能角度论证,虽然可形成逻辑自洽,但没有找到土地经营权的权源和立论的延展论据。至于权能分离理论的论证,只能作为论证体系的一个侧面,难以确立土地经营权物权性质的本体。

(三)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之立论

准确理解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既不应片面追求理论引入和创新,也不能忽略政策意蕴和实践需求。所有权理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寻求适当的解释,不必舍近求远,从所有权理论中深度挖掘,就可得到答案。

1. 从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来看,用益物权既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又是具体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之一,还是对所有权支配性实现的一种限制。[11]38-53而土地经营权也是以所有权为基础产生的,可以看作是所有权在土地上行使的一种方式,但土地经营权却不是对所有权的限制。我们知道,我国现行法禁止土地流转,土地所有权也无法实现处分权能,作为政策所设计的土地经营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处分权能,如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入股合作等。

2. 从所有权的权能分离理论来看,所有权具有四大主要权能以及管理、经营等其他权能,但用益物权绝不是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结果,其相应权能的行使是自身性质所固有的。⑮退一步论,可以对所有权的使用权能作广义解释,管理、经营权能都可看作是使用权能的应然内容。"经营权能"与"土地经营权"中的"经营"一词是否具有相同含义,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应在于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入股合作等流转方式是否具有物权意义。我们知道,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难以脱离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⑯而土地所有权在行使方式上有一定局限性,即在使用权能的实现上有一定局限性,不能通过抵押或其他融资方式实现土地交换价值。一定程度上,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可以解决融资困难,能够缓解农地规模经营的资金压力,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这也就是土地经营权权能独立性的价值所在。

3. 从用益物权的立法和理论上看,缺乏处分权能的用益物权概念并不实质影响土地经营权处分权能的实现。我国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无法完全实现,而基于土地所有权而生发的土地用益物权在处分权能的实现上,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我国《物权法》第 117 条规定的用益物权权能不包含处分权能,这也是后天不利。生发上的先天不足,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成长上的后天不利。

我国《物权法》虽然并未直接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权能,但流转方式中的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实际发挥着部分处分的功能。[12]《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五节单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2008 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增加股份合作的流转方式,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增加抵押担保的融资方式,这都表明政策和立法中客观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并使处分权能不断完全化。既然客观层面规定了用益物权的具体处分形式,且实现情况良好,那么用益物权概念中明确处分权能就不存在现实障碍。

从理论上看,用益物权能够实现处分权能,这与作为其母权的土地所有权不能实现处分权能并不矛盾。比较法上,土地所有权或用益物权能够完全实现处分权能,这是其历史、文化和制度演变的产物。我国法上,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难以实现,并不存在过多理论和实践的掣肘,也只是我国历史、文化和制度演变的结果。但这只限制事实处分的行使,并不影响法律处分的实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土地,因涉及土地所有权归属而无法完全处分,尤其是集体成员的承包土地,无法转让、抵押和入股;而"四荒"地因其特殊性,可以转让、抵押和入股。转让、抵押和入股属于权利的

处分，实质上是将土地本身所有的交换价值通过用益物权的行使来实现。

理论上担忧土地因流转对象范围的扩大，造成集体成员失地的风险[17]，可以通过物权体系的完善和抵押担保在债权实现方式上的限制来规避，甚至可以让政策性银行或政府金融、土地管理部门参与土地经营权的拍卖、变卖，以实现失地风险的最小化。

4. 从权利保护的效果来看，相对于物权保护而言，债权保护在实现权利人权益方面相对薄弱。前文已述，即便支持土地经营权债权性质的学者也不否认物权功能和物权保护的优势；既然如此，面对民法典编纂的大背景和物权编体系、内容发展的具体情势，肯定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应是趋势使然。

5. 从土地国情和土地所有制来看，其内在机制决定了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不断扩大的土地流转规模和依旧单调的土地流转去向之间的矛盾[18]，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也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科技化发展。“所有—流转—经营”的模式是现有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内在机制。坚持土地公有制的理论前提，坚守“集体土地，集体所有”的现有基础；统分结合的制度内涵即为“统”与“分”，然而，现实却仅体现为土地分别流转至农户，农户分别经营，地方上很少或几乎没有统一经营的范例。其实，这就是现有农村土地经营的迷途——集体缺统，农户少营。要整合土地，发挥规模效应，不仅要集体层面合理规划土地统一经营，而且要个人层面解脱土地流转的束缚，间接地让新型农业经营者经营土地，形成市场化的规模经济。

6. 从土地经营权的权因来看，其产生可总结为两种物权路径，其一是土地所有权具体行使而成，其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行使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涵摄于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之下，土地经营权也可以涵摄于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之下。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制强调集体成员的身份性，土地所有权具体行使也难以解释土地经营权。集体土地有承包地和“四荒”地之分，“四荒”地能够直接由非集体成员获得，但承包地只能由集体成员基于其自身的身份而获得，这也就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不能涵摄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经经营权人可以自行经营土地[20]，也可以设立土地经营权负担，由新型农业经营者经营土地。无论何种物权路径，实质上都坚持土地经营权物权性质的立场，在物权的基点上讨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经营权也只有在流转时才能发挥经济价值，而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行经营时，土地经营权则内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不发挥其融资担保的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生发于土地所有权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具备处分权能，这一处分权能既是理论延伸的当然结果，也是立法实践的应然内容。土地经营权在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和科技化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在农地权利配置方面平衡集体成员和经营主体的利益。土地经营权承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处分，并因其抵押担保功能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产生权利类型的独立价值。土地经营权具备物权权能，在弹性分离和土地信托[21]上大有作为，同时有政策目的、物权功能、现实国情与制度内在机制的回应，应当认定为物权性质。

三、土地经营权的权利配置

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其权利内容应当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区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源于土地承包合同，其权利内容中的土地转包、互换、出租等流转方式在流转对象上限制在集体成员之内；而土地经营权则直接由所有权的行使而设立，即集体经济组织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而产生土地经营权，其权利内容中的抵押、入股等流转方式没有流转对象的限制。

（一）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当时国情和农民需求而设立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历史进步性也不可否认。其历史局限性在于严格限制了土地流转和集体土地取得的身份性，而其历史进步性则在于充分肯定了农民的实践创造和土地种植收益。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使命和法律含义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增多[22]，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相对减少，这都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相对弱化。但农村人口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还不能彻底抛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维系原有社会保障功能，其提高农民收益的功能则可由土地经营权实现。

土地经营权作为全国性政策的具体内容于2014年被正式提出，其政策实践也相继在部分县市开展试点。[23]就目前的试点情况而言，土地经营权可

以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通过流转经营权以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并赋予其抵押融资内容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者或新型农民的资金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化。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是其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方式而生发的主要价值，也是其作为流转方式变革的重要意义。因此，从权利产生背景、权利内容和权利功能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不是母权与否的关系[24]，而是相互独立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内容

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应当具备用益物权占有、使用、收益的基本权能，同时，也应当具备一定的处分权能。其原则性的权利内容及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应由物权法（或民法典物权编）规定，具体行使规则由土地承包法规定，即“物权法（民法典物权编）—土地承包法”的体系构建。[25]

土地经营权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具有一定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占有权能的直接性[13]、使用权能的农用性、收益权能的法定性。占有权能的直接性是指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人必须直接占有支配土地，以构成现实管领和经营的前提。当权利人为新型农业经营者时，具体管领和经营土地的事务可交由职业经理人，但这并不妨碍占有权能直接性的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人和占有权能的抽象享有者依然是新型农业经营者。换言之，权利主体和经济上的经营主体可以分离，但权利主体仍直接占有土地。使用权能的农用性是为了约束土地投机和禁止非农用途的转化，资本的逐利性难以克服，在土地的使用上法律必须明确禁止事项，不给资本可乘之机。收益权能的法定性主要在于保障土地经营权人的经营成果，当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进行征收时，权利主体的青苗补偿费、土地增值补偿费、土地经营成果的现实损失和经营土地的转换补偿等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和可靠执行。

土地经营权的处分权能主要指流转方式，包括抵押、入股等商事性质的方式。在法理上，土地经营权人不能对土地进行事实处分，但可对权利本身进行法律处分，包括设定权利负担和再次流转权利。[13]权利人为土地经营权设定权利负担，既为其筹集经营资金、摆脱资金流转困境，也能实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土地经营权的再次流转，应当在土地管理部门处进行报备登记，以公示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权利负担、权利行使期限等内容。

四、结论

“三权分置”政策在经济学界的主导下正式提出，尚缺乏法学界形成对“三权分置”的一致认识。“三权分置”应否配置，关键不在于传统理论能否解释，而在于农业、农村现实和立法实践的已然证明是否存在悖谬。物权理论可以合理解释“三权分置”的立论基础，现实依据可以支撑“三权分置”的实践贯彻。农地“三权分置”是农地权利平衡的必然产物，而问题节点的土地经营权性质可以从物权理论中形成逻辑自洽。同时，在土地经营权的权利配置中应注意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的特殊性，并在体系构建时遵循“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的模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新时代”特点，而农地“三权分置”其实就是农地产权制度的“新时代”特点，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在法律实然和应然层面的考量。

注释：

①除2011年针对水利事业调控之外（从侧面看，水利改革仍有助于农业灌溉，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自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均把“三农”问题作为重点改革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为此，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也应运而生。

②“三农”问题中的“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无不以“土地”为基石——农业生产经营需要土地，农村建设需要土地，农民生活、耕种更需要土地。费孝通先生曾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表达我国农民的“土气”，这既反映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也体现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③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发放经营权证书的意见》（苏发【1998】9号）规定：“三权分离就是要在明确土地所有权和稳定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积极搞活土地使用权，促进土地流转机制的形成。”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郊区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意见》（沪农委【1999】78号）规定：“坚持三权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的原则。”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有序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川办发【2009】39号）规定：“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经营使用权。”

④申惠文：《法律语言学视角中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第七届两岸民商法前沿论坛论文集（下）。

⑤实质上，政策和农业部门负责人的话语表达就不同，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使用“三权分置”的表述,而相关农业部门负责人则使用“三权分离”,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部长叶兴庆、农业部原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等人都在不同场合使用“三权分离”的表达。

⑥“离”仍暗含创设之意,分离出来也即意味有了创设。

⑦此观点持有者认为,“三权分离”中的“三权”应重新解读,即“所有权”“成员权”“农地使用权”三权。其中,农地使用权则对应土地经营权,以便于流转。参见高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⑧此观点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并直言否定说对“权能分离”理论理解有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理解有误。

⑨制度演化存在一种称之为路径依赖的规律性现象,其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制度演化受以往制度的影响(参见高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同样地,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认为,在制度的选择中存在某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在路径变迁的自我锁定与自我强化效应中,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下去。(参见刘和旺:《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经济评论》2006年第6期。转引自许中缘:《商法的独特品格与我国民法典编纂(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⑩党的十九大报告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本轮集体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续期30年。这也意味着承包土地的转让也有期限。

⑪该说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概念是经济学上为实现农业发展政策而强调的土地之使用,而且从《土地管理法》的章节名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包含“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论空间来看,土地经营权只是政策用语、经济学用语,并不能也不必成为法律概念。参见朱广新:《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意蕴和法制完善》,《法学》2015年第11期。

⑫该说直接否定土地经营权的概念,但承认经营权能。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包含经营权的内容,再分离出土地经营权既无实际作用,而且限制了流转方式的多元性。经济学上的权利用语,不能妥善表达法律权利内涵。参见申惠文:《农地三权分离改革的法学反思与批判》,《河北法学》2015年第4期。

⑬确权确股不确地之土地经营权,是指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之确权方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方式,将农用地交给规模经营主体使用而形成的经营权。原始的确权确股不确地是指只为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确定分享集体土地收益的股份权,却不划分地块。参见高海:《论农用地“三权分置”中经营权的法律性质》,《法学家》2016年第4期。

⑭依据确权方式的形成路径,可以分成两类:其一,集体土地直接股份化而形成的原始的确权确股不确地;其二,集体土地间接股份化为确权确地之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转化的确权确股不确地。参见高海:《论农用地“三权分置”中经营权的法律性质》,《法学家》2016年第4期。

⑮房绍坤教授从所有权的历史渊源、含义、属性和用益物权的自身属性的角度,结合反向推论,论述了用益物权并非所有权权能的简单分离,其权能应是自身独立性和性质的体现。参见房绍坤:《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8页。

⑯当然,地役权可以不经直接占有而通过供役地对需役地的作用来实现。因本文讨论土地经营权,本处所指也在于此。

⑰囿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集体成员获得土地承包资格需要基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申言之,即便土地流转后,因经营不善导致土地经营权陷于偿还债务的困境,债权人所追索的也只是土地经营权,而非土地本身。不能将权利客体当作权利本身,作为客体的土地所有权不会因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发生变化。

⑱自2006年以来,我国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渐成趋势。2016年的土地流转规模为4.71亿亩,2016年的流转面积占比已经达到35.1%。从土地流转的去向来看,流入农户的面积最大,增速较快的是合作社,其中企业流转的土地增长较慢,长期以来保持10%左右的比例。参见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11/582002.html,中国产业信息网,访问时间:2018-03-16。

⑲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全国共有新型职业农民13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到2000万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80万个,包括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参见http://jiuban.moa.gov.cn/zwllm/ghjh/201701/t20170122_5461506.htm,农业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的通知》,访问时间:2018-03-14;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03600.htm,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访问时间:2018-03-14。

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行经营土地,并通过取得其他集体成员的承包土地,形成一定土地规模,也可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益。

㉑土地信托在安徽宿州、浙江绍兴、湖南益阳等地已开展试点。

㉒2017年全国共有农民工28652万人,外出务工的占比约60%,其余40%为本地务工。相比于5年前,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2391万人,而且自2011年起,农民工总量增速放缓。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地耕作的老龄化、妇女化、兼业化现象严重。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访问时间:2018-03-12。参见http://finance.

people. com. cn/n/2013/0527/c1004 - 21624982. html,人民网,访问时间:2018 - 03 - 12。

㉓参见 ttp://www. scio. gov. cn/34473/34515/Document/1515220/1515220. htm,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访问时间:2018 - 04 - 15。

㉔前文已述,笔者否认权能分离理论对农地"三权分置"的解读,因此,由权能分离理论推论而出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也不具说服力。

㉕王洪平教授曾提出制定《土地法典》的观点,若如此,土地经营权的细致内容及其权利保障可由《土地法典》规定,而体系构建则形成"物权法(民法典物权编)—土地法典"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单平基."三权分置"理论反思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困境的解决路径[J]. 法学,2016(9).

[2]崔建远. 物权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4.

[3]蔡立东,姜楠.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J]. 法学研究,2015(3).

[4]朱继胜. 论"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J]. 河北法学,2016(3).

[5]高圣平.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规则之构建:兼评重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模式[J]. 法商研究,2016(1).

[6]王泽鉴. 民法物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

[7]吴兴国.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框架下债权性流转经营权人权益保护研究[J]. 江淮论坛,2014(5).

[8]高海. 论农用地"三权分置"中经营权的法律性质[J]. 法学家,2016(4).

[9]李国强. 论农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法律关系[J]. 法律科学,2015(6).

[10]张洪波. 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基于权能理论的分析[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11]房绍坤. 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叶兴庆.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过去和未来[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6).

[13]丁文. 论"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J]. 清华法学,2018(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Law Expression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SONG Tianqi

(School of Law,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

Abstract: The two voices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in agricultural land have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However, the argument in the opposition theory is based on the wrong direc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paths in supporting the theory lead to various contradictions in supporting the theory itself. To affirm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agricultural land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the origin of this argument lies in the basic theories of land ownership and usufructuary rights.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agricultural land should not be excessively demanded in the expression of discourse.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and the "division of three rights" have the same expression effect. The viewpoint that the land management right should be used as a right to use the property right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separation of policy objectives, property rights functions,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can only support the argument. It cannot be the basis of argumenta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basic rights and powers in the right alloc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Key words: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s; land management rights; rights allocation

习近平新闻思想对新时代高校新闻舆论价值研究

吕 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郑州 450044)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媒体时代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以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这些富有创见的新闻思想是指导新时代广大新闻工作者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科学指南,也为新时代高校开展好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奋斗方向,提出了思想遵循。要做好新时代高校的新闻舆论工作,广大新闻舆论及相关部门工作者必须加强学习,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新闻思想,掌握好精髓要义,推动我们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新时代;新闻思想;高校新闻舆论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2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67-05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我国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重要论断和高度概括,体现了政治性、权威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特征,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历代中国领导人新闻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基础上,对当前新闻舆论工作和现实问题的科学研判和政治回答,为我们深刻把握宣传思想形势,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建设好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坚定的政治保障和思想遵循。

一、习近平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因传播技术变革大潮而带来的新闻舆论工作新任务、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科学研判和战略布局,就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一)对党的新闻舆论的性质任务与工作使命作出新定位

明确的性质任务与工作使命是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石,可以为事业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着不同的性质任务与工作使命。面对新时期以来新闻舆论工作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论断。还提出要做好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首先要坚持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高度重视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我们衡量开展新闻舆论工作效果与质量的检验标准。工作上大力宣传主流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先进的案例感染人,优秀的典型激励人。在实施宣传过程中,各个环节都要层层把关,人人负责,勠力同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1]33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要求对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做出的新概括。习总书记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通过加强新闻舆论队伍建设,培

收稿日期:2018-08-2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趋势与对策研究"(2017BKS027)
作者简介:吕村(1971—),女,河南泌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艺术教育。

养造就一支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通过持续创新新闻舆论工作的方法手段，不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影响力。

（二）对党的媒体融合新闻舆论工作创新作出新部署

习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高度重视，提出“新闻宣传是否善于创新，是否能够做到常做常新，是其发展壮大、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2]。明确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3]。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创新为要”[4]，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5]。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新视野、新举措思维和创新融合观念。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舆论传播的环境和要素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高度普及化的互联网技术在便利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加大了党对新闻舆论领导工作的难度，一些不良的、非法的甚至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网络泛滥，互联网日益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只有加强媒体融合与创新，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才能有效保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习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6]。根据习总书记对融合新闻舆论工作作出的新部署，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在认识上要重视互联网新闻舆论的系统性，强化互联网思维一体化发展理念；工作中要加强协调性，动员各方面力量相互协调，积极推进新闻舆论的各种资源要素有效整合，协同发展。要增强阵地意识，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效度，提高正能量新闻舆论的影响力。

（三）对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作出新阐述

着眼于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发展变化，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习总书记进行了深刻思考。他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新闻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在国际交流中存在着信息交流“逆差”；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我塑”，造成我国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提出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让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得以在全世界全面覆盖、有效传播，让世界人民都能听到、听清、明了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四）对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提出新要求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就是人才优势。”[1]333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才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关键在人。要选好配强领导班子，把德才兼备、真正“有两把刷子”的干部选好、用好，对不适合、不适应的坚决做出调整。总书记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7]。在构建强有力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时，各级党委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自觉担负起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强分析研判和统筹领导，不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此外，在新闻舆论队伍建设中还应创新思维，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革新宣传工作由宣传部门自己负责的观念，相关部门密切协作，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领域工作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二、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正在实现伟大飞跃。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指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回应时代关切、引领时代风气。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我们必须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提出的坚定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党员干部在执行党和国家交与的职责时必须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不可动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中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多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要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彰显党的意志，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其次还要坚持党媒姓党，要明确新闻舆论工作的方向与目标，深入解读有关方针政策，使其入脑、入心，成为指导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持党媒姓党，还要将正确舆论导向放在新闻舆论工作的首位，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敢于善于进行舆论引导，积极开展舆论斗争，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错误言论，以唱响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打好舆论宣传的主动仗。坚持党媒姓党，新闻舆论工作者还要加强党性教育，听党指挥，严守党的纪律，做到守规矩、听招呼、能干

事、有底线。

（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体现的鲜明人民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新闻思想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这一论断为我们开展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要以人民群众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将人民群众作为新闻舆论的服务对象，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进行卓越追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讲好共产党人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带领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中国故事。此外，坚持新闻的人民立场还要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正确反映出人民群众呼声与期盼。

（三）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强调的遵循规律要求

新闻工作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充分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使新闻报道在社会舆论中抢占先机、发挥最大效用。首先要根据自身特色、定位，实施差异化舆论宣传，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关系，正面宣传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提高质量和水平；舆论监督要坚持改进工作、解决问题、重在建设。第三要整体把握时效要求，新闻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在开展正面宣传、热点引导与舆论监督工作时，要善于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工作策略，提高宣传效度。第四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在新闻工作中要如实描述发生的事实，处理好“树木和森林”的关系，在坚持微观真实基础上，保持宏观和本质真实。

（四）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彰显的勇于创新精神

新闻舆论是社会生活的最敏感神经，始终最先感知变革先声，新闻工作必须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既立足发展实际，又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巨大勇气。首先要创新宣传渠道，加快推动多形态新闻媒体的融合发展，打造新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主流媒体，构建并落实与人民群众信息交流新渠道，发挥好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引导作用。其次要充分发挥新技术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支撑引领作用，适应新时代媒体传播特点，多样化展示、多介质推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效率与质量。最后要坚持“内容为王”的新闻舆论工作基本规律，打破惯有思维模式，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适应新媒体时代要求原创性新闻作品，进一步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五）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展现的宽阔国际视野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中国全面崛起并逐步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之际，只有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能正确反映出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秩序地位与作用，传递出国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当前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做好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坚定不移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拓宽国际视野，提高传播能力，创新话语表述形式，使外国人愿意听、听得懂，产生共鸣。围绕重大事件主动设置议题，明确提出中国观点、立场，用我们自己的话语定位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最后要优化国际传播战略布局，一方面要加快打造自己的外宣旗舰媒体，树立有影响力的新闻舆论平台；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把中国声音传得更快更远。

（六）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中提出的队伍建设精神

人才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当今世界竞争关键也是人才竞争，只有拥有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事业也有持续发展的保障。素质过硬、工作有力的新闻工作队伍，才能肩负起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要求，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目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的重要要求。高素质的新闻工作队伍还要求新闻工作者树立高度的使命感，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把最好的新闻作品奉献给人民。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通过新闻报道展现百姓风采、人民本色。

三、将习近平新闻思想贯穿于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过程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中处于最前

沿、最直接、最有影响力位置，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高校，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过程中更要加强新闻舆论工作，用习近平新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高校新闻舆论实践、推动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开展。

（一）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导向，是指导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科学理论。人无魂不立，业无魂不远。新闻舆论工作是管导向的，引导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具体到高校就要牢牢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立德树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学为目标，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生为本，以师为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抵御外来纷繁芜杂思想观点的侵蚀和挑战，不被西方新闻观所迷惑，不迷失前进方向，管好自己的导向，激发工作的动力，才能做好党的高校新闻舆论工作。

（二）按党的精神举办好校报校刊

“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8]党媒姓党，是党的性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性质、党媒的客观属性、党与媒体的关系决定的。校报校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必须按照学校党委精神做好编辑工作，要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让新闻鲜活起来。要坚持“政治家办报”“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9]。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新闻工作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原则”，突出宣传党的主张，按照学校党委精神，围绕学校党委决策部署，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办好党报党刊，体现学校党委的意志，宣传好党委的主张。

（三）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1]332这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最直接体现。报道什么、怎样报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怎样发出声音，都会受到报道者、表达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报道有思想，舆论有倾向。舆论导向正确与否，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舆论导向正确，走向就正面积极；舆论导向错误，舆论走向就负面消极。党要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牢牢坚持新闻舆论工作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好正面宣传就是要把新闻舆论工作的重点始终放在大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正面宣传；就是要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必须进行活的宣传，不能因循守旧、沉闷无趣。当然，我们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也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问题就摆在面前，逃避问题更成问题，迎着问题而上，是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和担当。关键是要把握好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合理布局，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引领作用。

（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推进“四个伟大”需要意识形态工作引领方向，凝聚力量，保驾护航。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矛盾多发，斗争尖锐，处于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新闻舆论工作承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习总书记说：“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7]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管新闻、党管媒体，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管理意识，把所有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都在党的管理之中。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五）构建全党动手的大宣传格局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开放透明，各种声音百家争鸣，舆情热点随时形成，话题突然爆发。任何一件事情甚至一两句话都有可能引爆舆情，如果缺少预判，应对不当，或者把握失序，出言不慎，都会把正面的事情变成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再激发舆情，进而继续发酵。新形势下做好高校新闻舆情工作任务繁重、难度更大，仅靠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部门远远不够，需要学校多部门协作、多方力量合作，齐抓共管，勠力同心，形成大宣传、大新闻、大舆论格局。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应发挥主导、组织、协调作用，当好“大管家”，打好主动仗，当好参谋部，多给其他部门出主意，协调各个部门一道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统筹好内宣外宣、网上网下，管理好所有阵地。要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在新闻舆论宣传的内容、体裁、形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创新，增强针对性、时代性，提高接受度。同时还应当抓住时机、把握节奏，从时效着力，体现时效要求，突出新闻舆论的实效性。

（六）增强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对高校领导干部

能力提升的新要求。领导干部同新闻媒体打交道，要了解互联网、了解新媒体、把握好互联网时代传播新特点、新规律。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善待媒体、会用媒体，要创新管理方式方法。新闻宣传的创新既包括媒体自身工作的创新，也包括对媒体管理工作的创新。领导干部要熟悉掌握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特点、规律，探索新形势下媒体管理办法，既严格加强管理，又要鼓励媒体创新，要形成既有统一管理又有生动活泼的局面。领导干部更要关心媒体，关心新闻工作者，加强媒体的队伍建设，给新闻人才更好的成长空间。

四、结语

作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在掌握基本观点上下功夫。结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实际，结合高校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宣传队伍的党性意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自觉承担媒体责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进一步坚定新闻的党性原则，不受各种错误新闻观的诱惑，增强免疫力，炼就“火眼金睛”，增强新形势下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自觉性，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与党同心同德，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增强大局意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站在学校党委的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为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鼓与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311.

[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4.

[4]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强调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N]. 人民日报，2015－12－27.

[5]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5.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0.

[9]吴冷西. 回忆主席与战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2.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Xi Jinping's News Thoughts on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LV Cun

(Party Committee Propaganda Department,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ing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new media era to the work of public opin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new thesi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work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These creative news thoughts are the scientific guide for journalist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era. They als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struggling for the work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era, and put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follow－up.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journalists and the practitioner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must strengthen their studies,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 the Xi Jinping's news thoughts, master the essence of the main ideas, and promote our practical exploration.

Key words: new era; news thoughts; the value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非理性情绪对道德事件传播的影响及其引导

许 莹,程 贺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在含有道德缺失或争议的事件中,道德审判成为事件传播、发酵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使社会底线伦理得到彰显与维护,一方面也易使公众沉溺于情绪的宣泄,形成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非理性情绪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情绪化反应的累积,道德事件的情绪化传播则是这种累积的网络投射,当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非理性情绪演变为道德审判和网络暴力,最终也会从线上蔓延至线下,形成新的道德事件。非理性情绪与道德事件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相互促发的关系,对非理性因素的弱化与排解是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非理性;道德事件;情绪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72-05

2017年11月,“江歌案”被爆出后,网络舆论聚焦于当事人之一刘鑫的失德行为,除道德谴责之外,网络中还弥漫着大量谩骂和人身攻击的言语。这一事件中,当事一方都存在明显的、严重的道德缺失,是典型的道德事件,在事件传播中,道德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于道德正义感,网民展开对失德者的谴责,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边倒的网络舆论。这些网络舆论包含情绪化色彩,投射了愤怒、怨恨的感情,而它们又进一步激起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导致更多的道德审判和网络暴力,从而形成了新的道德事件。由事件到情绪再到事件,由线上到线下,非理性情绪与道德事件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促发。

一、非理性情绪:道德事件的催化剂

按照《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对舆论的定义: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可见网络舆论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所谓理性,是指人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并进行逻辑推理的认识能力,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指导实践的实际活动能力,而非理性则指人所具有的一种非逻辑、非条理化的精神能力,这种精神能力推动着人们去从事那些难以表述的认识和行动。[2]

在传播学研究中,情感被视为非理性表达的一种主要形式。有观点认为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几乎随处可见情绪化表达的情况,它没有或缺乏理性判断作为情绪宣泄的支持,也不会以一种理性认识和行为选择来结束,是比较明显的过激、偏执、狂热以及混淆是非等情绪和行为倾向。[3]网民在公共事务中的负面情绪化表达主要包含偏激性、愤怒性、攻击性的语言暴力,谩骂式的网络污言秽语、网络谣言、道德审判等。[4]

非理性情绪在道德事件传播中的表现尤其明显。道德事件中的当事一方往往具有行为上的道德缺失,这种道德缺失使得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有了正当的名义,借助维护社会正义或秩序的理由,人们将当事者作为情绪宣泄的对象,在事件传播中情绪不断升级,网络暴力由此产生。纵观历年来道德事件的传播,其中非理性情绪的作用与表现都引人关注。早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中,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就有显著的表现,在当事人表述含糊不清、

收稿日期:2018-08-2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媒全传播的社会情绪效应及其引导”(2017-ZZJH-056)
作者简介:许莹(1975—),女,河南开封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

法院依据调查作出判决的情况下,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当事者彭宇受到了“冤屈”,这一事件在网络上传播与发酵的结果之一,是制造了现实中新的“信任缺失”的道德事件。2015 年安徽一女大学生被称为“女版彭宇”。她在上学路上疑似剐蹭一位老人,当她扶起倒地老人后,曾在事件现场向目击者寻求帮助并承认撞人,随后将老人送到医院并垫付医药费。但事后她又改称受到“讹诈”,并连续发布微博“澄清”事实。这一事件迅速被与多年前的“彭宇案”联系起来,新一轮情绪化舆论再次出现,倒地老人遭受网络舆论的猛烈抨击,虽经法院判决赔偿,但女学生迟迟不履行判决,网络舆论则继续对当事老人进行道德审判。在这些案例的推助下,“扶老人”彻底成为纯粹的道德事件。

非理性情绪往往使人偏离惩恶扬善的初衷,从道德的审判者成为网络暴民,在网络传播中形成无视他人权益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行为。几乎在每一例包含道德判断的事件中,网民都出于一种道德正义感,将当事者的个人信息公布在网络上,致使其本人与家人遭到各种形式的影响甚至威胁。这凸显了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非理性一面,即偏激意见表达、逾越道德底线、无视法律制度,情绪化贯穿于事件始终。[5]在具有明显道德是非的事件中,非理性情绪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作为被指责一方的当事者往往遭受到猛烈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也会从线上到线下,并延伸到其家庭其他成员。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其重要来源之一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绪累积,因此非理性既是导致情绪化的原因,又是情绪累积的结果,道德事件给了累积的情绪一个出口,或者说,道德事件传播是负面情绪的集中爆发和放大,而负面情绪的累积则与社会环境中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随着收入、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关乎基本生存的条件出现问题,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加,公众的焦虑情绪不断加剧。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90 后乡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中学习或是谋生。在三十而立的人生节点,青年人承受着不可预计的物质财富积累压力,天价的房子、车子、结婚彩礼,以及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等每一项都是足以使他们备感焦虑。[6]一些年轻人面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和潜在的危机,因无力改变现状常常感到自卑和无奈,充满了无力感和消极悲观的情绪。近年来以“丧”文化为代表的各种流行网络话语都表达了年青一代对社会的无奈,这种无奈与焦虑的累积有可能带来的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和精神世界的崩塌,其言行在网络空间中易表现得情绪化。

其次,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各种不平衡,其中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有时会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部分人通过利用制度空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引起一些投机者的躁动和仿效,加之金钱观的推波助澜,容易形成浮躁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现象会使那些遵纪守法的人感到不公,从而引发不满情绪,造成社会心态失衡。2017 年一项研究发现,2013 年我国高收入阶层人数占比仅为 0.7%,中等收入阶层占比为 38.1%,低收入阶层占比高达 61.2%。高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收入,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同时来源于资本与劳动收入,而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较为悬殊,2013—2015 年间高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阶层的 10.7 倍左右,在此期间,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阶层的 3.7 倍左右;而 2014 年一项研究则发现,中国最富 1% 家庭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最穷的 25% 家庭财富仅占全国总财富的 1% 左右。[7]社会阶层差异的悬殊,使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阻滞,阶层固化形成,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因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生存现状易使人产生心理的极度敏感和脆弱,继而出现心理失衡。

最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加剧,利益受损群体的负面情绪在聚集化的网络参与中更容易得到蔓延,当网民聚集在同一个网络空间时,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而相互影响和感染,使原本独立的个体在情感上趋向一致,陷入情绪感染。人们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归因和认识并不一定与事件本身相关,而是对承受的社会压力进行释放,通过情绪感染让事件在网络中迅速发酵,非理性情绪则在这一过程中相伴而生。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当人们聚集成群,其感情和思想就会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代之以一种集体心理,由这种心理支配,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作为孤立的人独处时非常不同。近年来,“涉官”“涉警”“涉富”等弱者与公权、特权实力悬殊的对立,往往引发网民普遍的关注和情感投入,甚至出现无原则同情弱者的倾向,这其中有着共同的情感逻辑,即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对弱者的同情。[8]

二、道德事件:非理性情绪的扩散与放大

现实生活中累积的负面情绪推动道德事件的非理性传播,而道德事件一经传播,则又会使非理性情绪进一步扩散与放大,形成更大的情效化效应。道德事件中所裹挟的仇官、仇富等社会情感,使一些网民在不了解事件真相的前提下盲目跟风他人观点,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渲泄个人情感,发泄心中不满,这些情绪化话语汇聚成网络舆论,在网络传播中迅速得到扩散与放大,使道德事件的情绪化色彩进一步增强。

道德事件往往是网络热点事件。网络热点事件通常是指通过网络媒体发布、在互联网上形成相应舆论进而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事件。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定数量的网民为了特定目的围绕热点事件在网络公共领域大规模汇聚意见进而影响现实生活的群体性事件。[9]事件能否引起网民的关注与事件的热点因素相关,如争议性、敏感性、重要性等,事件当事人的知名度以及双方的矛盾都会引起公众的讨论。由于热点因素的存在,事件的传播会触发网民情绪,也会因此而引爆舆论。公众对事件的情绪反应越强,事件就越能够受到关注,舆情也会随之增强。

面对一些情绪触发点突出的热点事件,公众需要释放和沟通的平台,网络便成为愤怒、不满、情绪化的发泄场。在事件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公众会自发猜测事件的真相、成因以及批判潜藏在背后的社会道德和体制因素。在网络空间中,网民言论的匿名化和碎片化更具有非理性的话语特征,伴随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再次鼓起情绪化的狂澜。近年来,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往往遵循情感的逻辑,存在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10]在“于欢案”中,该事件一出,“辱母杀人”作为事件关键词被迅速传播开来,网络热点事件也随之迅速成为引人瞩目的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传播又放大了人们的非理性情绪,与“江歌案”相同的是,为数众多的网民抛开了法律裁决,聚焦于网络声讨。

不可否认的是,道德事件中体现出道德缺失的当事者有着接受舆论批判的必要,这是社会底线伦理得以保障的方式,但同时,事件传播过程中公众非理性情绪的过度扩散与放大,往往使事件偏离焦点,真相更难以显现。这与道德事件的网络化传播特征有密切关系。首先,网络传播的双向交互性特征,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模式 ,加之匿名化形成的传受双方身份的隐匿性 ,使信息内容更自由,更具有自主性,微信、博客、微博等平台日渐成为公众发表言论、释放情绪的重要场所。同时,网络发布的匿名性使信息发布者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相应减少,也使得一些网民出于各种目的传播虚假信息,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纷纷出现。言论越激烈,越容易煽动公众的情绪,传播的范围就越广泛。正是基于网络和现实社会强大的联动性、发散性和蔓延性,各种非理性、负面的社会情绪通过道德事件的网络传播迅速扩散和放大。

道德事件传播中并非没有理性的声音,但理性的声音往往被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内容所湮没。“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11]在道德事件中,随着部分网民和媒体的言论感染,一些原本只是围观的网民也加入对事件当事人的批判当中,使整个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趋势。由于道德事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受众容易将自己替换成事件主体,植入个人情感和态度,因而全民参与传播,使事件影响力扩大,非理性情绪也随之放大。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情绪相互感染和蔓延下,由网络空间引发的各种积极、消极情绪会大量地传递进现实中,很快融入进某种社会情绪;而社会情绪一旦形成,也会让更多的公众受到感染,形成更大的情绪洪流。

在道德事件的传播中,除了网民自发的转发评论,自媒体对事件的情绪化解读也会使非理性情绪被扩散和放大。在我国,自媒体并不具备发布新闻的资格,但为了取得更高的关注和点击,一些自媒体会紧跟社会热点事件,发表分析评价类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往往深谙“越情绪化,越易引起关注”“越争议,越突出”的“道理”,或片面地强调事件的某一方面,或对当事者进行偏激的道德评判,以毫无顾忌的情绪化表达迎合人们的非理性情绪,使事件传播的非理性特征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情绪消费型自媒体”日渐走红,它们“不提供工作、生活方面的有用信息,不具备实际可用性,契合特定人群特定情绪,能引起这部分人的强烈共鸣,主要适于不善于情绪管理、情绪起伏较大的那部分年轻人”[12],这类自媒体在日常信息传播中往往以捕捉生活趣闻、细节并加以创作发挥的方式,以短视频或短文段子的形式起到疏解生活压力、愉悦身心的作用,但在道

德事件传播中也会存在过度消费情绪的现象，以“咪蒙”为代表的这类自媒体的情绪消费型传播经常引起争议。

三、把握网民心态，加强舆论引导

非理性情绪来源于现实并与道德事件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相互促发的关系，因此，降低道德事件负面传播效果既需要对非理性情绪进行有效的弱化和疏导，又需要对道德事件的传播过程加以干预。非理性情绪来源于现实中负面情绪的累积，要对其进行疏导，需要了解社会矛盾，把握住网民的心态，从根本上进行弱化和排解；对道德事件传播过程的干预则需要抢占传播先机，发挥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加强舆论引导。此外，还要加强网络传播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

首先，把握道德事件网络传播的初始环节，快速反应，应对舆情。道德事件的网络传播具有“散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其中“散播”阶段是事实开始传播的阶段，这一阶段事件信息通过当事者或知情人公开，但往往还没有经过大范围的转发评论，舆情还没有形成，是干预和引导舆论的最佳阶段。当事件处于“散播”的初始阶段时，管理者应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迅速对事件的舆论走向进行观察、跟踪，依据微博转发量、评论数等要素对舆论反应的规模、影响程度等方面做出及时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及时阻断网络谣言等有害信息的传播过程避免网络暴力的集中爆发。这就要求管理者密切关注网络信息，对事件的性质和舆论走向有充分的预判力。

从传播模式上看，网络传播具有显著的群体传播特征，信息在群体成员之间传播，并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在社交媒体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网络人群也呈现出群组化、圈层化的特征，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拥有大量粉丝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个人微博都有影响舆论的能力。因此，引导网络舆论，充分发挥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将一些能够客观公正看待问题、思想成熟的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力调动起来，通过他们对网民的意见进行整合分析，让权威、主流的声音占领网络空间，以期对网络舆论环境发挥净化作用。

其次，正视社会问题，梳理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公众的非理性情绪是由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不满情绪累积，以及社会事件的刺激所产生，要想从根本上进行疏解和引导，必须理解网民的心态，把握住非理性情绪的来源。这就需要从事件具有的争议点出发，梳理各种矛盾与冲突，追踪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引爆网络舆论、传播影响从线上延伸至线下的典型事件大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公正公平的维护，是消除负面情绪的最好方式。同时，非理性情绪往往是心态失衡的极端表现，社会群体的生存困境加之社会各阶层之间相差悬殊，心态失衡的现象会随之出现，非理性情绪往往是心态失衡的极端表现，而心态失衡现象的弱化来自社会各阶层之间所存在的生存条件过大差距的弥合。缩小阶层差距，最终还要靠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此外，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使理性的声音成为主流，实现传播的“自净化”。在主体多元化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中，新闻事件的真相在众声喧嚣更加扑朔迷离，大量不实信息充斥网络，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性判断。在道德事件出现时，一些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获得更多受众，有意地对事件进行渲染和夸大，使公众在未了解事件真相时已经爆发激烈情绪。这时，只有真相才能让公众做出正确的判断，主流媒体应积极传播真相，以事件真相引导舆论，从源头扼制公众非理性情绪的集中爆发。主流媒体应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的优势，及时消除网民的不确定心理，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就需要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在极端言论充斥、非理性情绪过剩的网络空间中，公众还是倾向于从主流媒体上获得关于事件的权威信息和解读。因此，在新媒体已成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情况下，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仍具有自身的传播优势。但传统媒体的受众面日趋狭窄也是不争的现实，所以传统媒体实现媒介融合，借助网络及时发布信息，是扩大其影响力的必要手段。主流媒体一方面避免在报道中干预司法审判，同时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分析网络舆情，针对网络中非理性情绪宣泄的重点进行干预和疏导，是推动道德事件传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有效方式。

最后，加强网络伦理教育，提升网络传播道德素养。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赋权使新闻传播走向了“去专业化”，基于职业化的专业主义原则在这一条件下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减弱，新的传播伦理的构建有赖于广泛的网络传播道德的提升。网络传播道德需要法制的不断完善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加强普遍的传播伦理教育成为自觉，因此，把加强公民的网络道德教育作为网络建设一项基础性工程，提高公民的网络传播道德意识成为当务之急。在道德事件传播中，如果网民能够遵守传播道德，减少网络

谣言和网络暴力,那么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非理性情绪就会随之弱化。把网络道德教育纳入青少年与大学生的教育课程中,树立网络评论和行为的底线意识,树立文明网络评论的思想,逐步提高未来网民的媒介素养和公众舆论能力,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导致网络非理性情绪产生的因素。

四、结语

现实生活中生存压力、社会不公、浮躁心理的存在,都使公众累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形成的非理性推动道德事件的发酵,并在情绪的刺激下进一步放大,演化为新的道德事件。同时,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观点相互交融,情绪不断扩散,使原本不明真相的围观公众也很快融入到非理性情绪洪流中。情绪化使公众无视法律,失去理性,站在道德的高度发表道德评判,促使道德事件传播中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非理性情绪与道德事件之间互为因果,形成了相互促发。

公众普遍具有一种朴素直观的正义感,也能对人心世道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社会道德底线存在的基础,也是道德事件传播中可以借助的正向力量。同时,在道德事件传播中,仍需要防止简单粗暴的情绪,哪怕这种情绪是以正义之名的。道义声讨当然需要,但是对道德的审视,不能替代法律审判,这是启动所有道德话题的根本前提。在当前道德事件不断爆发的情境下,管理者要积极了解争议焦点,探析事件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占据先机,把握网民心态,加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弱化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同时,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更应坚守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及时传播真相,不以博得眼球和煽动舆论为目的进行报道,营造良好健康的信息环境。

参考文献:

[1]邱沛篁.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3.

[2]何颖. 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1.

[3]王来华. 如何应对网络舆情过度情绪化表达[N]. 光明日报,2015-07-16.

[4]严利华,高英波. 从个案激情、话语互动到公共理性——基于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分析[J]. 当代传播,2015(1).

[5]蒋万胜,张芝龙,刘晓荣,等. 网络舆论中的双重表达及其博弈[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6]董扣艳. "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透视[J]. 中国青年研究,2017(11).

[7]薛宝贵,何炼成. 我国阶层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及矫正[J]. 学习与实践,2018(2).

[8]李黎丹,王培志.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演化因素探析——以"校长开房"事件的微博传播为例[J]. 当代传播,2014(3).

[9]丁柏铨,郭舒然. 对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学解读[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0(1).

[10]郭小安. 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J]. 国际新闻界,2013(12).

[1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0.

[12]官建文. "情绪消费自媒体"有无未来[J]. 新闻与写作,2016(6).

(责任编辑　吕志远)

Influence of Irrational Emotion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Moral Events and Its Guidance

XU Ying, CHENG 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Moral trial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fermentation of events in which moral defects or disputes are involved. On one hand, this makes the bottom line of social ethics be highlighted and maintaine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asy for the public to indulge in emotional catharsis and form irrational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rrational emotions come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emotional reactions in real life. The emotional spread of moral events is a cumulative network projection. When the irrational emotion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moral events evolve into moral judgment and cyber violence, it will spread from the on-line to the off-line and form new moral events eventu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rational emotions and moral events is mutually causal and mutual promotion. The weakening and solving of irrational factors ar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moral events.

Key words: irrationality; moral events; emotional

电视新闻播音员与电视出镜记者：角色的差异与转型的技巧

韩雁锋
（安阳广播电视台，安阳 455000）

摘　要：在现代电视新闻节目中，电视新闻播音员时常出镜承担现场报道的任务。无论对新闻播音员本人还是电视新闻节目而言，出镜现场报道都是新闻播音员角色的转型，需要新闻播音员完成角色的转型，即从电视新闻节目甚至电视台的人格化身转型为新闻现场的专业见证人。结合17年新闻播音和出镜报道经验，提出了播音员出镜做现场报道需要注意的几项要求：一是衣着上要以简洁大方为主，与现场氛围相适应，同时保持准确的姿态；二是在表达时最好开门见山，抓住重点，吸引观众注意力；三是要善于通过体验式报道和情感式表达将观众带入现场。而这些与新闻播音员在演播室的要求不太一样。

关键词：新闻播音员；出镜记者；角色差异；转型技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4
中图分类号：G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77-04

在现代电视新闻节目当中，电视新闻播音员时常出镜承担现场报道的任务。这对于电视台和播音员而言都是有利的事情。对于电视台而言，电视播音员是电视新闻观众最熟悉的面孔，代表着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形象感，对于播音员而言，则是离开正襟危坐的演播室，展示自己专业的新闻判断力和现场发挥水平的良好机会。但是，播音员向出镜记者的转型，并非是自然而然、必定成功的事件，如果转型不当，既不能给电视台的形象管理加分，也不能使自己摆脱在观众心中念稿者和端坐者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电视新闻播音员在担任现场新闻出镜记者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作出调整，加强新闻采编素养，对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进行全新的设计。

一、电视新闻播音员与新闻出镜记者角色的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1]"找准坐标定位""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按照美国学者戈夫曼的看法，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地位系统和地位模式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并通过交互的纽带以及任职者必须履行的权利和责任，同系统中的其他人保持关系。[2]角色承担者需要应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无论是职位、职业或者社会其他方面的规范。如果角色承担者能够按照规范进行活动，就被社会视为正常状态，如果不能按照规范进行活动或者表现，就会被社会界定为异端、越轨者。这种情况在社会学中被描绘为角色失调和社会表演失败，即人们平常在社会中所感觉到的行为不合适或者说话不适合。

新闻传播作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职业，本身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主要承诺是为社会提供真实、平衡而令人相信进而可以此做出决策的新闻资讯，如李普曼所描述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都认为，新闻报道应当"每两三天就为我们描绘一幅我们所感兴趣的整个外部世界的完整画面"[3]。

收稿日期：2018-08-25
作者简介：韩雁锋(1977—)，男，河南安阳人，安阳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持人、一级播音员，主要从事新闻节目主持和出镜报道工作。

而这种社会角色的履行是通过分工来实现的,对于电视新闻节目而言,即把新闻节目分成若干个类型,不同类型的节目由不同的专业工作者承担赋予该节目真实、权威形象的职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都是兑现新闻报道承诺的关键节目,节目完成主要角色任务的是播音员和出镜记者。他们在合作中存在着自己的角色差异,节目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

按照约翰·菲斯克的观点,体现新闻报道可靠性的关键是演播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包括国内的新闻播音员),新闻节目主持人不是他或她自己的话语的作者,而是客观的关于事实的口头话语的发言人。[4]这位新闻播音员的价值在于,它是整个电视新闻节目的人格化身,他代表整个新闻制作团队向观众报道新闻,说明整个团队见证了新闻的发生,他是唯一知道当天所有新闻事件的告知者,同时类似于电脑的操作系统,是观众知晓新闻必须经过的窗口。正因为如此,除了表达清晰等基本要求之外,新闻播音员是电视节目定位的直接体现者,如果是高级新闻节目,播音员需要端庄大方,语音雄厚,着装严肃,语调平缓,如央视新闻联播中的新闻播音员;如果是轻松且个性化的电视新闻节目,需要播音员语调轻快,着装轻便,不是坐着读新闻而是能够在演播室内随着演播屏边活动边说新闻,同时能够提供代表节目个性的评论、问候等话语,以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电视新闻播音员需要与电视新闻节目定位协调配合,其个性不单单是播音员自己的个性,而是代表着整个电视新闻节目的个性,这种个性的目标是展示新闻节目的传播欲求,即取得真实、权威或者轻快、愉悦的效果。

现场报道是呈现新闻真实可信且生动形象效果的关键环节,出镜记者则是赢取这种效果的中介。作为中介,出镜记者既作为个人也作为电视新闻制作团队的形象出现。作为个人,他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在现场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并且代表观众去见证事件发生的细节、去问观众需要知道的问题。作为电视新闻制作团队的成员,他又是代表电视机构将电视镜头从演播室延伸至事件发生的现场,具有专业人员的性质,表明是通过职业手段获取了真正的事实。出镜记者与新闻播音员有许多不同之处,与新闻播音员是知道所有新闻报道的全知者相比,出镜记者只知道他采访的这件事;与新闻播音员可能为事件定性下结论不同,出镜记者需要以普通人的感觉提供具体的事实材料;与新闻播音员需要正襟危坐最多能够沿着演播屏活动不同,出镜记者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做出远离或者贴近事实的动作;与新闻播音员多数不用自己创作不同,出镜记者需要在现场发挥自己的观察能力与表达能力,随机出镜描述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与新闻播音员需要穿着职业装进入演播厅不同,出镜记者需要穿得更符合场景的要求,特别是在报道普通事件,穿着需要体现观众出现在该场景中着装的平均水平。所有这些要求的最终目标是让出镜记者看着像个专业的普通人。

新闻播音员与出镜记者之间的差异,使得新闻播音员在担任出镜记者时,既不能完全放弃新闻播音员的身份,以免影响将来播报新闻时给观众留下不良印象而影响传播效果;也不能端着播音员的架子放不下来,直接影响出镜时需要现场感、生动感。新闻播音员出镜是播音员与出镜记者身份的融合。

二、新闻播音员担任出镜记者时的衣着规范

播音员从演播室的镜头前过渡到新闻现场的镜头前,往往在衣着、举止方面颇费脑筋。一方面是因为习惯问题,演播室严格的着装要求使其养成了严肃的着装习惯,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播音员在出镜时着装过于随便,会使电视观众在以后观看新闻时回忆起这些场景而使得新闻播报的效果受到影响。播音员着装时要注意细节,融入环境,以简洁大方为主。

(一)新闻播音员出镜时衣着不能太随意,应当简洁、大方,衣服上不宜有明显的标牌,引发观众不必要的关注。有一段时间,意大利品牌背靠背十分流行,不少同事都爱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但是这个牌子的衣服标志和特征格外显眼,出镜时穿这种衣服引来了很多观众的猜疑,以为是专门的服装赞助品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误会。这种误会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因为“人类的身体是衣着的身体,社会世界是衣着的世界”,[5]衣着过于个性化,会给观众明确地描绘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新闻真实客观的目标往往要求新闻播音员能够代表各个阶层各种职业,避免使观众赋予其衣着过于明确的意义。

(二)新闻播音员出镜时的形象应与出镜时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比如在生产车间、施工现场必须佩带安全帽,甚至工作服,在田间地头不宜穿着西装、套装,穿高跟鞋等不适宜劳作的服饰。另外,重大活动开幕、庆典活动等现场,一定要正装出镜,以免破坏现场原有的气氛。

(三)出镜记者还要特别注意手持话筒的位置和握法,这也是个人形象的一部分。新闻播音员在演播室播报新闻时,镜头的远近、头部和身体的大小往往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已经由演播室工作人员调

适得当。在出镜时，虽然摄像记者很有经验并且经常会明确的提示。但是播音的习惯往往会带来一些不适当的动作。很多播音员出镜时常会话筒位置过高且以正面面对镜头，结果往往在屏幕上呈现出下巴颏儿“长胡子”的尊容，让人啼笑皆非。正确的手持话筒姿势应该是，手部放松，上臂与小臂成 90 度直角，让话筒顶端的高度介于上衣第一颗和第二颗扣子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话筒位置过高是很多出镜者的通病，有些人通常是随着报道的进行，话筒不断上移，对画面和个人形象造成影响。良好的习惯要从平常抓起，适当花一些时间和功夫，把握好话筒正确的位置会使出镜者的形象和气度更上层楼。

三、新闻播音员担任出镜记者时的表达技巧

与出镜记者不同，新闻播音员播报的新闻稿件常常是新闻记者和编辑已经拟就的成熟的稿件，同时往往经过了部门主任和值班领导的审核，新闻播音员多数情况下不用自己“创作”播报文稿，即使是主持新闻节目评论新闻事件，其分寸和尺度已经由新闻制作团队讨论确定。但是担任出镜记者时，多数情况下需要播音员自己在现场对发生的情况作出准确而简洁的描述，这是对其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考验。新闻播音员需要在平时即关注出镜记者的表达规范，同时结合自身播音时的规范要求，确定描述模式，追求好的传播效果。

（一）交代环境，抓住重点。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新闻播音员出镜时要明白，观众首要关注的是地点不是时间，镜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新闻发生的地理位置，因此一般而言，记者在出镜的开头要告诉观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注意重音要在“位置”二字，而不在“我”这个人上。在交代了位置之后，播音员需要开门见山，直接描述自己所处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在交通事故现场就需要用一句话说明是什么样的事故、事故损害到底有多大、事故处理情况如何。由于播音员往往播报的新闻具有书面语性质，在出镜时需要注意书面表达和口语词汇的有机结合，这样使自己既显得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在现场探寻情况，又表明自己具有专业资质。

（二）善用道具，吸引关注。尽量从观众能看见的、具体的内容说起，逐渐过渡到观众看不见的内容。在不久前的一条主题性报道中，为了反映产业转移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变化，笔者作为出镜者走进一家出口型企业的生产车间，发现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小型玩具和礼品，虽然产品色彩鲜艳、造型可爱，但是体积太小，既使成百上千排列起来也显得非常不起眼，而整个生产场景也显得有些凌乱，无法让人产生好的联想，于是放弃了把厂房生产场景和成品库作为背景的想法，而是顺手抄起一个产品完成了这次出镜：“（中景）这里是位于河南滑县开发区的一家由闽商投资的加工企业，（顺手从生产线上）我手里拿的这个可爱的圣诞老人就是这家企业面对西方节庆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品，在这个车间里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类似的小工艺品生产出来，（镜头拉开至全景）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欧美市场，换回大批外汇……”

（三）巧设环节，延展视听。电视的特点是视听兼备，出镜记者如果一味强调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内容无疑是画蛇添足，要增强现场感还要注重叙说观众无法透过屏幕之感知，比如嗅觉、味觉、触觉、温度。2016 年 8 月，笔者所在的栏目《安阳新闻》报道了河南省内黄县部分苦水区村庄用上了洁净自来水的消息，出镜者当时手持两个透明矿泉水瓶，分别灌上了原来褐色的苦水和新近接通的洁净自来水现场比对，让观众对水质的变化一目了然，更妙的是出镜记者将两瓶水分别尝上一口，现场描述两种水在口感上的差异，让新闻摆脱了生硬的套路，给了观众更加直观和丰富的感受。

四、新闻播音员出镜时的语态调整

（一）多作体验式描述。播音员工作的特点是有稿创作，习惯书面语言的表达，但进入新闻现场后必须改变语态，因为让既定稿件过目成诵并非易事，而且表达效果也很糟糕。高明的出镜者会主动融入新闻现场，让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一个元素。出镜内容也是依托现场的背景、人群、细节等，采用体验式的描述，使报道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安阳曹操高陵进行发掘后，在报道发掘现场时，一般的出镜报道思路会用数字来展现墓葬规格，比如说“曹操墓前墓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 3. 85 米、南北宽 3. 87 米。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 6. 4 米。”这样的表述和现场环境毫无关联，生硬拗口，说者不易记忆，听者也难留印象，所以笔者当时采取的报道方式是：“现在我就站在曹操墓室的前室，这里刚刚清理完大量的於土，所以泥土的味道非常浓烈。这个墓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先拿我的臂展来做比例，我的臂展大概是一米七五（把双臂伸平比划一下），大概有我两个那么宽，可以看出来这个墓室长宽都接近 4 米，像一个正方形，从平面上感觉像现在我们普通人家居住的客厅大小。（抬起头往上看）但是高度更高（把一只手向上伸直），我双脚站定原地摸高是 2 米 3 左右，差不多三个我叠起来才能触到墓顶，可以想见这座古墓的形制和规格还是很高的……”这种把自己的身体当尺子的出镜报道，不

失为一种很好的体验式出镜报道。中央电视台在对南方冰冻灾害作现场报道时,出镜者站在一片山坡下,身后是电力检修人员在除冰作业,在形容挂在电线上的冰溜子时,主持人并没有用数据来形容,而是说冰溜子和自己手中话筒的粗细差不多,以直观的比喻来告诉观众结冰的厚度。

(二)要善于营造现场感。一般来说,动态性新闻或事件新闻更适合出镜,如灾害救援、案件抓捕、极端天气以及车祸等突发新闻,其内容相对单一,时空相对集中,事态在不断发展,现场需要突出展现。但正因为这些新闻是突发性的,所以等记者赶到时,现场往往已成过去,而变得相对静态。如何让这类新闻现场感更强一些呢?这就要靠记者出镜来调动。如果背景是静的,出镜者就要是动的,如果背景是动的,出镜者就要是静的。2016 年年初,笔者所在的城市安阳京珠高速安阳段因冰雪天气发生了严重的车辆滞留现象。记者赶到现场时大雪封路,能见度只有几十米,摄像机机位不动的话要展现出车龙绵延几公里的场景几乎不可能,这时候笔者迅速组织了一段语言,结合现场环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边走边说,适时和车上的司机们进行互动,用一段长达 40 秒的出镜将糟糕的天气、冰冻的路面、绵延的车龙、亟待救助的司乘人员展现在观众面前。

另外,情绪也是现场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奋或紧张,高兴或悲伤,都是现场感的一部分。在千变万化的新闻现场,出镜者本人的情绪最能打动观众,这时候出镜者的情绪要尽量自然,不要故意控制,不然会遗漏宝贵的现场感。在笔者所在的安阳电视台《一帮到底》栏目,有一位从 DV 拍客成长为外景主持的女记者,2012 年 3 月她只身带一名滑县病残儿童赴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做心脏修复手术,在衣不解带精心照顾孩子的日子里,她坚持每天在镜头前出镜,记录在美国的点点滴滴,有一次她因语言不通受到房东夫妇的误解遭到指责后,在镜头前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这样一段真实的新闻播出后,许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出镜者也与这个瞬间一起被观众记住。

17 年的播童主持工作经历让笔者体会到,播音主持的岗位不仅仅局限在镁光灯下演播室内,出镜报道同样也是播音员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一次次用心的播报不仅为人生增添精彩的注脚,也必将被最珍视的观众所铭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新闻传播力引导力[N]. 光明日报,2016-02-20(1).

[2]欧文·戈夫曼. 日常接触[M]. 徐江敏,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71.

[3]沃尔特·李普曼. 公共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1.

[4]约翰·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M]. 杨全强,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3.

[5]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 郜元宝,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News Broadcaster and Appearance Reporter: Difference in Roles and Skills for Transformation

HAN Yanfeng

(Any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yang, 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V news programs, TV newscasters often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live reports. No matter to the news announcer himself or to the TV news program, the live report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news announcer. It needs the news announcer to complete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V news programs and even TV stations to the professional witnesses of the news scenes. Combining 17 years of experience in news broadcasting and on-camera reporting,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everal requirement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an announcer is on the scene. First, the clothes should be simple, generous and adapt to the scene atmosphere, and maintain the accurate posture at the same time. Second, it is best to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seize the key points 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when an announcer is expressing. Third, an announcer should be good at bringing audiences to the scene through experiential reporting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hese requirem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for the news announcers in the studio.

Key words: news broadcaster; appearance reporter; role differences; transformation skills

健康中国背景下养老机构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

马宏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郑州 450044)

摘 要:健康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体育锻炼具有增进老年人健康、延缓衰老的作用。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可以增进机构内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延缓衰老,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乐,安享晚年生活。在养老机构内构建体育养老服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背景下,通过对郑州市10家养老机构体育养老服务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机构内老年人对通过体育锻炼这一途径增进身体健康有较高的认识,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体育养老服务,而各养老机构内健身设施数量及种类差异较大,且没有体育指导员为老年人健身进行指导服务。在此现状下,提出建立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及健身指导服务站,加大投入现代化的健身康复器械及多样化的运动健身场所,探索养老机构内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为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健康;养老机构;体育养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5
中图分类号:G8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81-04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养老模式主要由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及居家养老三种模式组成。养老机构是综合型养老服务社区,集老年人居住、护理、保健等于一体。[1]在养老机构内,老年人可以与更多的同龄人相处交流,得到专业的护理,安度晚年生活。健康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曾说过,把健康比作1,事业、家庭、名誉、财富等就是1后面的0,人生圆满全系于1的稳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具有增强人体的心肺功能,延缓骨质疏松的功能,老年人可以通过健身活动达到增进健康、延缓衰老的目的。[2]本研究旨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探索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的措施。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养老机构中体育养老服务的开展情况为研究对象,调查样本为郑州市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以"健康中国""养老机构""体育养老"等为关键词,通过互联网等工具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涉及社会学、老年学、体育学等多个领域,获得大量参考资料,为本研究的设计、分析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2. 问卷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科学设计调查问卷,目的在于了解郑州市养老机构体育养老服务的开展情况。该问卷遵循体育科研方法和社会学原理要求,初步制定、设计问卷的基本内容,拟成初稿。通过向专家咨询,对问卷进行审核,反复修改,最后定稿。问卷经由专家进行效度检验表明,问卷的题目设计符合调查的要求,有效性较高。

根据研究任务对郑州市10家养老机构进行走访,其中公办养老机构1家,公办民营养老机构3家,民建公助养老机构4家,民营养老机构2家。随

收稿日期:2018-08-2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9-ZZJH-474)
作者简介:马宏霞(1970—),女,河南新乡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机对机构内的165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访谈，了解老年人对体育养老服务的需求。因老年人身体状况的特殊性，问卷采用访谈形式进行，由专人进行记录。问卷发放165份，回收165份，其中有效问卷165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3. 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法，对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运用有关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并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表格绘制和图表制作。

二、调查结果

（一）郑州市养老机构开展体育养老服务现状

走访的10家养老机构中，全部都有健身设施，有的养老机构中的健身器材不仅先进，而且种类较多，而有的机构中只是象征性地摆放了几件健身设施。10家机构内都没有专业的体育指导员为老年人进行健身指导服务。

（二）机构老年人对如何增进健康的理解

表1　增进健康的途径（n=165）

因素	人次	百分比(%)	排序
体育锻炼	149	90.3	1
合理饮食习惯	140	84.8	2
心情愉快	119	72.1	3
无不良嗜好	96	58.2	4

调查结果显示，机构内老年人认为体育锻炼是增进健康的有效途径，有90.3%的老年人认为体育锻炼是增进身体健康的最佳途径，其次为合理的饮食习惯、良好的心情。

（三）机构老年人对体育养老服务的需求

表2　机构老年人对体育养老服务的需求（n=165）

是否需要机构提供体育养老服务	人次	百分比(%)
是	165	100
否	0	0

表3　老年人对机构内体育设施的需求（n=165）

体育设施	人次	百分比(%)	排序
健身设施	165	100	1
拥有先进设备的健身康复馆	97	58.8	2
专业运动场地	8	4.8	3

表4　机构老年人对体育指导的需求（n=165）

	人次	百分比(%)
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154	93.3
有无都可以	11	6.7
不需要	0	0

调查显示，机构内的老年人都需要机构提供体育养老服务。老年人对机构内的体育设施有一定的要求，除了需要有关健身设施外，有58.8%的老年人希望机构内能够建设拥有先进设备的健身康复馆，4.8%的老年人希望能够在养老机构内偶尔进行游泳以及打乒乓球、羽毛球等活动。在调查中发现，93.3%的老年人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体育指导员的指导，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健身活动，从而增进身体健康。

三、分析讨论

（一）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的必要性

从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老年人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尤其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开始步入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愈发严峻，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了不给子女增添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主动走进养老机构，在机构内养老。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生活护理等服务的综合性机构。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养老机构为政府建立，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以帮扶、救助为主，其公益性特征尤为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办养老机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许多民营养老机构纷纷建立，公办的养老机构也已开始转型为公建民营机构，现在的养老机构已经成为集老年人居住、护理、医疗、娱乐等活动于一体的综合型养老服务社区。

为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发展，全国老龄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于2017年3月发布《“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指出要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通过健全体育组织、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建设体育设施、加强体育指导等措施，鼓励老年人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安度晚年，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3]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方位的向人民群众提供健康服务。[4]健康不仅是人全面发展的根本，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只有全民健康，国家才能够走向富强，民族才能够得到振兴。

进入老年，人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等疾病，不但为自己带来痛苦，也给家人带来一定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他们关注各种各样的健康资讯，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促进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服用一些保健药品、使用一些保健按摩仪器等等。[5]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希望通过锻炼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多数老年人还是非常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但由于许多老年人不懂得科学的锻炼方法，导致锻炼效果不佳，因此，有必要在养老机构内

开展体育养老服务。体育养老是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它建立在对老年人进行生活照顾的基础之上。研究表明,人体生理机能的衰退是由于老年人缺乏体育运动引起的,体育运动可以有效地延缓人体生理机能水平的衰退。同时,参加体育活动具有消除不良情绪的作用。步入老年,尤其是进入养老机构后,老年人或多或少会出现失落、伤心、孤独等不良情绪,通过参加体育活动,加强人际交往,可以帮助老年人尽快摆脱不良情绪,感受到轻松愉悦。[6]因此,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可以增进机构内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延缓衰老,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乐,在机构内安享晚年生活。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众多,养老问题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年轻人忙于工作,老年人独自在家不但缺乏照料,还会感到孤独寂寞。[7]因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走出家门,进入养老机构。养老方式由居家养老变成机构养老,导致养老机构的床位供不应求。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养老机构成立,仅郑州市就有近两百家大大小小的养老机构。在调查中发现,机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中的生活照料是比较满意的,但对于体育养老服务方面不甚满意。因此,需要加大养老机构中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指导老年人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8]在养老机构内构建体育养老服务,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二)养老机构内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推广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运动项目,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到 2030 年,使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平均达到 79 岁,寿命显著延长。要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完善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加强科学指导,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指出要营造有利于老年健康的生活环境,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发文要求充分发挥体育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9]体育活动是老年人维护健康,结交新朋旧友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增加交往,还可以增强体质。作为养老机构,体育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养老服务使老年人身心健康,心情愉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首先,在养老机构内建立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养老机构是老年人相对集中的场所,定期为机构老年人进行健康测评,建立老年人健康数据库,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通过健康数据,分析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有利于体育指导员有针对性的为老年人设计健身方案。同时,监测中心的数据还有利于政府部门掌握老年人体质状况,对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其次,在养老机构内建立健身指导服务站,招聘专业人员专职为老年人的健身进行指导,根据体质测评的数据开发适合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健身项目。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强健体魄,延缓人体生理机能的衰退,延长人的寿命。如对一些心肺功能较强,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可以适量进行一些强度较高的力量器械活动指导;对一些身体健康,但较少从事剧烈运动的老年人进行广场舞、太极拳或轻器械运动的指导;对一些年龄较大,不适宜剧烈运动的老年人进行八段锦、五禽戏等健身气功的指导;对一些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提供康复健身的指导等。[10]另外,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还可以对老年人提供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指导及陪练。[11]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所以孤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属性。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来到养老机构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会有失落孤独感,而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对于孤独老人来说,正是排除他们心中苦闷的一剂良方。很多老年人缺乏健身的意识及科学的健身方法,体育知识储备不足,在此情况下,盲目的健身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健身指导服务站可以定期为老年人开展包含健身、保健、疾病防治与康复等内容教育活动,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12]老年人通过参加各种不同形式和类型的体育项目,在锻炼中寻找快乐和健康。最后,加大养老机构体育健身投资力度,投入现代化的健身康复器械及多样化的运动健身场所,如游泳池、乒乓球、羽毛球场馆等。老年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挑选自己喜欢的锻炼方式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

四、结语

在养老机构内构建体育养老服务,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建立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形成老年人健康数据库,促进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相融合;通过建立健身指导服务站,安排专业人员为老年人的健身进行指导,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健康设施,使广大老年人在宽心舒适的氛围中,积极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丰富生活内容,提升身体素质。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通过体育养老,在健身中展示着自信,也展示着晚年生活的风采。体育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贯彻全民健身、

终身体育的理念,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王冲.潍坊地区养老机构老龄体育服务的现状调查[D].济南:山东体育学院,2015.

[2]刘霞.智慧社区养老视角下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7):1743-1745.

[3]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关于印发“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报,2017(3):15-20.

[4]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2018-7-27]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5]黄元汛,沈有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健康养老与老年体育的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15,34(2):95-97.

[6]王艺婷.新媒体下社区体育养老新模式探析[J].中国市场,2016(3):207-208.

[7]马宏斌.公办养老机构体育活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5(10):6-10.

[8]王季.郑州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现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35(16):4656-4657.

[9]国家体育总局,等.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EB/OL].(2015-10-29)[2018-07-28]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242/7188534.html.

[10]王会儒,姚忆.“传统养生体育+医疗+养老”的老年健康干预模式构建[J].中国体育科技,2017,53(3):8-13.

[11]张岚.辽宁养老机构中养老人员体育生活方式的研究[J].体育科技,2015,36(3):89-92.

[12]黎文普,龚正伟.“文化养老”视域下社区体育文化养老路径探析[J].体育学刊,2014,21(4):46-49.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ension Service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MA Hongxia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Health is a key factor i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their later years. Physical exercise can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delay their aging. Carrying out sports pension services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can improve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institutions, delay aging, enrich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enable the elderly to enjoy their old age.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ension services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is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pension services in 10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Zhengzhou. It finds that the elderly in institutions have a higher awareness of improving their health through physical exercise, hoping to get professional sports pension services. However,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fitness facilities in various pension institutions vary a lot. Besides, there are no instructors providing guidanc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physical health monitoring center and a fitness guidance service station, increase investment in modern fitness and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and diversified sports fitness sites,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ension services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aging in China.

Key words: health; pension institutions; physical elderly care

郑州黄河湿地植物组成调查及保护对策研究

孙浩冉[1],孙 森[2]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郑州 450044;
2. 南阳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河南 南阳 473000)

摘 要:通过对郑州黄河湿地植物物种的调查,统计出区域内植物组成的特点,分析归纳了湿地植物在医药、食用、饲料、工业原料、观赏、净化环境等领域的潜在价值。湿地植物面临着围垦造田、滥采滥挖、违规开发、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据此提出应采取加强湿地保护区建设、加快湿地植物的调查和研究、完善保护法规、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加强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等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郑州黄河湿地;植物;保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6
中图分类号:Q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85-04

湿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不仅为栖息的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水和庇护场所,而且发挥着诸如净化水质、调节洪水、改善物质循环等生态功能。其中,湿地的生态净化功能尤为突出。郑州黄河湿地是郑州现存面积最大的湿地,栖息着多种珍贵的动植物,但近年来,郑州黄河湿地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加之地表径流减少和旅游开发等影响,湿地内的天然植被退化明显。通过对郑州黄河湿地区域内湿地植被进行调查和统计分类,以期为郑州黄河湿地植被的保护、恢复和湿地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一、材料与方法

1. 研究区域概况

郑州黄河湿地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处郑州巩义、荥阳、惠济区、金水区和中牟辖区内,湿地全长150km。此次选取荥阳桃花峪大桥和中牟东狼城岗之间区域为调查范围,该区域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14~14.3℃之间,年平均降雨量640.9mm。调查区域内河床平坦,河道宽阔,由于含沙量大,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严重,形成著名的地上河奇观。

2. 野外调查

该调查区域属典型的河流型湿地,主要由永久淹水区、江心洲、河漫滩、边滩、岸坡、河口等组成,本文对郑州黄河湿地野生植物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选择典型的调查线路和调查样点,在典型代表性的地段每间隔1000~2000m设置调查样带,用GPS记录其坐标。采用调查样带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每块样带根据生境条件、群落类型等差异,设置不同数量的调查样方。其中,草本样方尺寸为1m×1m,灌木样方尺寸为10m×10m,乔木样方尺寸为20m×20m,共设置样方210个。调查时采集植物的标本,同时记录其个体形态、高度、盖度、组成种类和数量等特征。以此为基础,对采集到的植物进行鉴别,确定其科属。

二、结果与分析

经前期调查和数据统计,郑州黄河湿地被子植物由308种植物组成,这些植物隶属于74科228属,分别占全国湿地植物种数的13.5%、科数的32.8%和属数的27.9%。[1]

在所有科中,超过10属的科有十字花科、豆科、菊科、禾本科等4科,占总科数的5.4%;介于2~9属的科有藜科、莎草科、伞形科、唇形科、锦葵科、毛茛科、蔷薇科、桑科、旋花科、百合科、大戟科、浮萍

收稿日期:2018-08-19
作者简介:孙浩冉(197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

科、葫芦科、忍冬科、石竹科、苋科、玄参科、龙胆科、荨麻科、蓼科、柳叶菜科、萝藦科、牻牛儿苗科、葡萄科、千屈菜科、茜草科、茄科、卫矛科、杨柳科、紫草科、泽泻科、罂粟科、雨久花科等 33 科，占总科数的 44.6%；只有 1 属的科有瑞香科、榆科、木犀科、夹竹桃科、紫茉莉科、桔梗科、白花丹科、鸭跖草科、苦木科、茨藻科、酢浆草科、灯芯草科、蒺藜科、堇菜科、败酱科、景天科、柽柳科、远志科、楝科、水鳖科、天南星科、无患子科、小二仙草科、眼子菜科、商陆科、鼠李科、柿树科、睡莲科、薯蓣科、山茱萸科、木贼科、漆树科、马鞭草科、马齿苋科、川续断科、车前科、鸢尾科等 37 科，占总科数的 50%。

在所有属中，含有 2 种及以上的属有牵牛属、鸢尾属、慈姑属、卫矛属、南蛇藤属、苋属、莲子草属、牛膝属、香蒲属、婆婆纳属、忍冬属、木贼属、委陵菜属、蓼属、酸模属、鹅绒藤属、老鹳草属、毛茛属、唐松草属、藜属、大戟属、莎草属、蔗草属、车前属、白酒草属、香青属、紫菀属、蒿属、苦苣菜属、黄鹌菜属、向日葵属、小苦荬属、菊属、鬼针草属、稗属、狗尾草属、孔颖草属、苜蓿属、槐属、胡枝子属、大豆属、野豌豆属、苦马豆属、黄耆属、田菁属、合欢属、木蓝属等 47 属，占总属数的 20.6%；只有 1 种的属有菟丝子属、打碗花属、杨属、旋花属、秃疮花属、白屈菜属、紫堇属、雨久花属、梭鱼草属、凤眼莲属、鸭跖草属、紫茉莉属、远志属等 181 属，占总属数的 79.4%。

在所有植物中，以草本植物为主，藤本、灌木和乔木为辅。草本植物占植物总种数的 81.8%，常见植物有白茅、狗牙根、狗尾草、小花山桃花等；藤本、灌木和乔木植物合计占植物总种数的 18.2%，常见植物有女贞、杨、榆、柽柳、扁杆藨草等。根据植物对土壤中水份的适应能力和需求度划分，该区域内植物以水生、湿生和半湿生为主，中生植物为辅，水生、湿生和半湿生植物合计占植物总数的 80.2%，常见有芦苇、香蒲、菹草等，中生植物占植物总数的 19.8%，常见有旱柳、柽柳等。

三、湿地植物的利用价值

1. 医药

湿地植物中不乏常见的中药材，例如菟丝子在保肝补肾、调节免疫、改善亚健康、增强体质方面有很好的功效；[2] 泽泻味甘、性寒，是一味天然的利尿良药，同时它还兼有预防脂肪肝、防动脉硬化、降“三高”、泻肾火等功效；[3] 牛膝与地黄同属“四大怀药”，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前者具有强筋健骨、补肝固肾、消肿止疼、利尿通淋、引血下行之功效，[4] 后者在增强免疫力、保护胃粘膜、抗肿瘤、养颜美容等方面有奇效，临床还可用于止血，辅助治疗糖尿病、心脑血管及高血压等疾病；[5] 枸杞也是一种常见的保健品，其不仅用于抗氧化、抗衰老、增强免疫力、调节血脂，而且在治疗化学性肝损伤、预防酒精肝、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等疾病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功效。[6] 桑叶因有清肺、润燥、明目、清肝、疏散风热的作用，常用于治疗风热性感冒、头痛发热、胸闷咳嗽等疾病，兼具抗菌消炎、降血糖和降血压等功效。[7] 益母草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临床上用于妇科病的治疗，还可辅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艾全身皆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其有消炎、平喘、止咳、散寒、止血、温经、祛湿、抗过敏等功效，中医据此发明了艾灸疗法，可以消肿止痛、通经活络、祛除阴寒。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艾中富含挥发油类、黄酮类、苯丙素类、三萜类等成分，其中挥发油具有镇咳、祛痰和抗过敏性休克的作用，还能对抗肾上腺素和组胺引起的心肌收缩，达到降低心脏收缩力、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黄酮类物质具有抗菌、抗氧化、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和免疫抑制等作用。[8] 蒲公英中含有的萜醇具有杀菌消炎、抗肿瘤、抗氧化、治疗糖尿病等药理作用，其水提取物对 α－糖苷酶活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功效。[9]

2. 食用

湿地植物也给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材，例如莲、胡萝卜、茭白。慈姑的球形根茎蒸熟似芋头、山药般绵软，富含蛋白、淀粉、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茭白的果实又称菰米，乃“六谷”之一，其肥大的纺锤形肉质茎口感爽滑又有嚼劲，一直以来都作为一种优质蔬菜受到人们的喜爱；荠菜、马齿苋、车前草均是餐桌上的“野菜”。

3. 工业原料

酸模富含单宁，是制备鞣料的重要原料，泽泻富含萜类化合物，芦苇富含优良的纤维，可用来造纸，可也生产粘胶纤维，荆三棱的根茎中含有丰富的多缩糖、纤维素和木质素，是水解糠醛和人造树脂工业的优良原料。桑树皮可入药、造纸，桑木用来制造车辕、桑杈等农业工具，苎麻纤维质地强韧、拉力强、富弹力、耐潮湿，是制作夏布、飞机翼布、橡胶衬布、渔网、人造棉（丝）的首选，也是纺织、纤维、火药等行业的原材料。艾草是制作印泥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料。杨树是工业生产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造纸、火柴和家具等的重要原材料。

4. 观赏

每种湿地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形态，给人以美感，

植物与植物间、植物与自然景观间科学合理的搭配设计往往更能达到景观美学的要求。例如一望无际的芦苇搭配曲折通幽的小径,与一望无际的天际线形成独特的景观效果;睡莲和水烛互相搭配后形成错落有致的比较;烟波浩渺的湖面、形态各异的挺水植物,与岸边高大的乔木相映成趣,其映射出的远山给人若隐若现的朦胧之美。

5. 饲料

湿地植物往往也是动物的食物来源。例如菹草、苔草、浮萍既可作鱼饵,又是家畜、家禽的优良饲草,苔草同时也有牧草的功能。荨麻可做牛、羊、猪等家畜越冬度春的补饲用草或粗饲料,作为饲料使用的荨麻,既解决了冬春过渡季饲草的青黄不接,还充分利用了其药理和药效,起到防病治病,增强弱乏畜、病畜和产后母畜健康的目的。苜蓿粗蛋白含量高,易消化,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含量丰富,是各种畜禽喜爱的优质牧草。

6. 净化环境

湿地中的大部分植物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同时兼有一定的抗旱、抗水淹能力,在防风固沙、调节土壤水分、改善土壤酸碱性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同时湿地中许多水生和湿生植物能够净化环境中的污染物。例如,凤眼莲可有效去除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水体中的氮、磷物质,实验证明生长初期的凤眼莲通过新陈代谢可主动吸收快速、高效的净化水体中高浓度氮(TDN),同时还能够快速去除水体和底泥中的磷。[10]浮萍则是另一种净化含汞、镉、砷的水生植物,种植在被污染水体中的浮萍,与荆三棱、美人蕉、香根草组成的植物带可有效降解水体中的 NH_3-N,COD 和 TP,去除效果分别为 78.7%,44.1% 和 71.4%。[11]杨、臭椿、榆则是工矿业和城市绿化的良好树种,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氯气、二氧化氮、粉尘等污染物有较好的净化能力,同时作为行道树防风降尘、消音减噪、美化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湿地植被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保护对策

为更好地保护好黄河湿地及生物资源,2004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西起巩义市康店镇东至中牟县狼城岗镇,跨越 15 个乡镇,是郑州市目前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目前存在大规模围垦造田和滥采滥挖、违规开发、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严重破坏了湿地植物群落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导致原有的生态系统逐渐失衡,出现了湿地退化现象。

1. 加快湿地保护区的建设

加快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保护湿地和湿地生态系统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依据《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和《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加快湿地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合理规划,实时调整和优化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等重点区域保护,提高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区划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开发特色产业、开展生态旅游、实施生态保护补偿等,吸引和吸纳当地居民参与到湿地的保护和管理中,建立反哺机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妥善处理好湿地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走出一条融合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可持续改善的新路。

2. 加强湿地的研究

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湿地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范围交叉了地理学、测绘学、生态学、环境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诸学科,学科体系还在不断地探索、构建和发展中,由于研究时空界限的模糊性和湿地类型的复杂多样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湿地的确切定义还处在探讨中,但这毫不妨碍对湿地的探索,特别是对湿地的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前人已做出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也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果。未来对湿地生态系统系统科学的研究为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和保护湿地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研究和保护其他类似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因此,更多的科研项目应该向湿地研究倾斜,包括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的关键技术、湿地生态监测、湿地的生态演化规律等,这些研究工作将为未来的湿地管理和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 完善湿地保护法规

湿地与海洋、森林并称世界三大生态系统。然而在我国,海洋和森林作为独立的环境要素立法保护早已有之,唯独湿地保护立法的系统性、完整性不足,就是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湿地保护的法律条文中也仅是突出对水土、动植物、矿产、河道等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湿地的整体保护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一部全面且系统保护湿地的法律的制定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在湿地保护法下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确定各类湿地的生态功能,建立湿地分级管理体系,明确湿地保护主体的责、权、利,划定湿地保护红线,建立健全湿地生态修复机制和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随着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湿地管理和保护必将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

4. 建立专门的湿地保护机构

湿地是水生生态系统到陆地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过渡带,这个独特的特征决定了湿地的管理往往受到来自农业、林业、渔业、环保、河道和地方政府等

诸多部门的多重领导,多部门交叉管理的后果往往是部门职责不清、权限不明、管理效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因此,需要进一步理顺湿地保护工作的管理机制,明确湿地的主要管理部门和责任主体。同时,该管理部门的职能包含湿地内涉及的农、林、牧、渔、旅游、国土、环保等,其监管职责和权利应该涵盖湿地保护区域内的所有要素,包括水域、土地、动物、森林和污染物排放。为加强不同区域湿地的保护,多种保护和管理措施应协同实施,在维护好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持续性这一首要目标基础上,开展生态旅游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合理开发利用湿地资源,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调动湿地保护的积极性。

5. 加强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湿地保护和高效管理与公众参与是分不开的。而调查显示 60% 的在校大学生对湿地的概念还较为抽象,对湿地的保护知识更是空白,因此,今后政府、高校和社会应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加强公众尤其是在校学生在湿地知识和保护技能方面的培训。同时为吸引公众都能积极投身于保护湿地的行动中来,还要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渠道,应建立专门的网络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将有关湿地的信息更快、更准确的传达,使大众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湿地保护的动态和知识,并不断通过网络自媒体扩大公众之间的宣传效果,引导公众树立积极的社会意识,激发他们参加保护湿地的热情。鼓励发展湿地保护相关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维护其在湿地保护中的权益,提高公众参与湿地保护的层次。同时不断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通过微博、微信、QQ 群等互联网新兴媒介,以讲座、授课、演讲等方式宣传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增强公众在湿地保护方面的思想认识,使被动参与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从而实现更好的参与形式。

参考文献:

[1]孙浩冉,孙森. 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类型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2018(2):117 - 120.

[2]王焕江,赵金娟,刘金贤,等. 菟丝子的药理作用及其开发前景[J]. 中医药学报,2012(6):123 - 125.

[3]田婷,陈华,冯亚龙,等. 泽泻药理与毒理作用的研究进展[J]. 中药材,2014(11):2103 - 2108.

[4]胡婷婷,张振凌. 中药牛膝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储藏保管[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13):3321 - 3322.

[5]卢端萍,王勇. 地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海峡药学,2004(3):23 - 26.

[6]杨永利,明磊国,林浩,等,枸杞养肝明目功效研究进展[J]. 中国食物与营养,2015(7):75 - 78.

[7]张雪,宋玉琴,杨雨婷,等. 益母草活血化瘀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药物评价研究,2015(2):214 - 217.

[8]李春娜,占颖,刘洋洋,等. 艾蒿药理作用和开发利用研究进展[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12):3889 - 3891.

[9]李雪石,张彦文. 蒲公英水提取物对链脲佐菌素致糖尿病大鼠的降血糖作用及其机制[J]. 中草药,2013(7):863 - 868.

[10]高岩,马涛,张振华,等. 不同生长阶段凤眼莲净化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水体的效果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4(12):2427 - 2435.

[11]李睿华,管运涛,何苗,等. 用美人蕉、香根草、荆三棱植物带处理受污染河水[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366 - 370.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Plant Investigation and Conservation Advice in Zhengzhou Yellow River Wetland

SUN Haoran[1], SUN Miao[2]

(1. Chemical and food colleg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2. Library, Nan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anyang, Henan 473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lant species in Zhengzhou Yellow River wetl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composition in this region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potential value of wetland plants in medicine, food, feed and other fields were analyzed. Wetland plants are confronted with such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reclamation, overexploitation. A series of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should be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reserves, including speeding up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wetland plants, perfecting the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etc.

Key words: Zhenghou Yellow River wetland; plant; protection

论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道德养成

谢锦江
(岭南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道德”一词至关重要,很多圣人自身就是社会道德楷模,在“何为道德”这一命题上,孔子认为道德的核心是仁,老子以为德即道之显现,《左传》中则明确写道:德是国家之基也。对于道德养成之路径,大致有重视“不言之教”,把抽象的道德理论实践化,从经典文献中汲取营养以及从汉字中寻求能量。

关键词:传统文化;道德;道德养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89-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教社科〔2014〕3号)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1]。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道德圣人灿若群星,既有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楷模,也有周公、海瑞、包拯等清官形象,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足以让我们学习和借鉴;古代先哲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书籍和言论,是当下进行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另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音形藏义、字形藏理(象形表意)的功能,蕴涵着巨大的道德能量,足以警示着我们依道前行。

一、何为“道德”

《管子》:“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故德者,得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2]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3]《左传》:“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3]

关于道德,《老子》在第三十八章中写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有失德,是以无德。”上德的表现是利他、为人,不索取,是有德的表现;下德之人追求的是不失去,甚至不该得到的也想方设法得到,这是无德。高亨先生认为:“老子所谓德,即道之本性,亦可云德者道之用。”[4]当代道家著名研究学者陈鼓应先生认为:“无形无迹的‘道’显现于物或作用于物是为‘德’(‘道’为体,‘德’为用,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5]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获得一些东西,这就是‘德’。‘德’意指 power(力)或 virtue(德)……一物自然地是什么,就是它的德……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6]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老子所述之“德”与“道”是相伴而行,德是道之用,道是德之体。德是道的显现,道是德的本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与德是一体两面,实为一物。所以王弼才说“德由乎道也”,只有做到了道之“自然”“无为”,就是有德。河上公在注释《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时,用了“道性自然”一词,也充分说明了自然与道、德之关系。

收稿日期:2018-09-15
作者简介:谢锦江(1976—),男,河南确山人,哲学硕士,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传统文化。

儒家则用“君子”“大丈夫”等词来形容道德高尚之人。如“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作为君子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一刻也不能离开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的“君子”之德最重要的体现是“仁”“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爱亲人开始,逐步推及到对大众的爱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爱,儒家的这种爱是一种差等之爱,但确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

管理学中有一个规则:首先做“正确的事”,然后才谈得上“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是指要确立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正确地做事是指不管目标和方向正确与否都尽心尽力严格按照程序把这个事情做完。

怎样才能确立正确的目标、选择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呢?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道德修养的问题。

怎样才能有德?几节品德教育课就有德了吗?德可以从书本学到吗?通过考试可以检验出一个人是有德、无德还是缺德吗?检验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不是看这个人懂了多少关于道德的知识,而是要把这些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小事做起,把这种行为和习惯积累固定下来,才能形成道德,才会有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集小善为大善。

二、道德养成的基本路径

(一)身教重于言教,感化重于教化,即老子所讲的“不言之教”

何谓“不言之教”?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写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7]老子的“不言之教”不是绝对地“不言”,而是“希言”。老子在很多章节中都有关于“言”的论述,如第二十三章中的“希言自然”,第七十章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第二十七章的“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第十七章的“悠兮其贵言”,第八十一章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虽然都是表达老子反对“多言”,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因为多言是多欲的表现,会带来“多为”“妄为”,必然无缘于“无为之益”,但老子没有把“不言”绝对化,只是告诫人们不能多说,正如现代社会所说“言多必失”,多言必多“为”。“不(无)言之教”即无言之教化,即身教。

子曰:“己身正,不令则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指身教的正面影响;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指身教的负面影响。如果长辈、老师、上级都行道德之事,那么相对应的孩子、学生、下级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就会效法或模仿;如果长辈为老不尊,老师行为不端,上级说一套做一套,孩子、学生和下级还会讲道德吗?美国作家珍妮·艾里姆曾经说过:孩子的身上存在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的父母,缺乏正确的家教观念。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

《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

(二)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只有在行为中不断地重复和强化,再经不断反省或反思,最后内化为一种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能表现为外在的道德习惯。

如果真正成为了一种习惯,诸如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爱党爱国等等就不是一个思考以后或权衡以后才决定的事情,而是一个出于本能非做不可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过程艰难、复杂、漫长甚至还有反复,所以古人才提出要“修”(修行、修道、修身、修德等,并在实践中坚持下来)。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当上了美国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新教师来校报到,他都会交给新教师一封信,信上写着:“……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绝不应当被用于制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能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其价值。”

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教育不仅是要教会一个人知性,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性、德性,否则就是为社会培养了一个危险物。正如罗斯福所说,培育一个人的知性却没有培育他的德性,等于是给社会创造了一个威胁性的存在。

司马光曾对德与才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夫聪察强毅(聪明、察觉、刚强、坚毅)之谓才,正直中和(刚正不阿、忠恕谦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8]

明代洪应明《菜根谭》的论述最为形象:“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

培养学生的德行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一些制度使学生在一言一行中贯彻道德原则。要让学生牢固树立“学校兴亡,我的责任”的观念,在生活和学习中,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出去。老师就是要让学生养成擦黑板、扫教室、捡纸屑的习惯;养成尊敬老师、尊敬家长、关爱同学的习惯;养成讲究卫生、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习惯。

《老子》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美国太空 3 号快到月球时,它却不能登上去而无奈地返回来,为什么? 只是因为一节 30 块钱的小电池坏了,他们这个酝酿很久的航天计划被破坏了,几亿元报废了!

《老子》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事不仅可以立身,还体现为爱国。在日本广岛举办亚运会,6 万人的会场,在运动会开完后场内居然没有一片纸屑,全世界为之震惊。爱国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情感,是道德修养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有没有德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在哪里,找不到国来爱,好像国很抽象,离自己很远。孝敬父母、关爱家人、友爱同事,就是爱国;遵纪守法、克己奉公、热心公益,就是爱国。爱国就体现在一件一件的具体的小事当中。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与爱国联系起来。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人人都从小善做起,不断地加强道德修养,国家才有希望。

(三)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

对传统的宗教经典、道德经典的解读,可以增强你的德行。尤其是历史上一些道德圣人的言论对今天加强道德修养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就是要听圣人言,对于不听圣人言的人,孔子警告道,只有小人才不知天命,“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他在给卫灵公讲课的时候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学会爱。儒家仁爱思想也贯穿于他的政治、伦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做人的问题上,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仁爱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要求,“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但这种行为方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克己复礼”的结果。“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爱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法则之一,就是要做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共生共赢。“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认为仁爱就要学会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如《礼运·大同篇》中所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只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君子”“仁爱”之要求,国家才能和谐、大同。

同样,《道德经》中有很多关于道德修养的言论。

《老子》第七章写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无私与有私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没有无私,也就没有有私;反之亦然。一定条件下,无私也就是有私,有私也就是无私,圣人以“不争”达到“争”,以“无私”达到 “私”的目的即是此意。[9]因此,就要求圣人修身养性,做到“无为”而治,不可与民争利,只有“无私”最终才能“有私”。正如孟子在《梁惠王》中所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已经拥有了整个国家,就不要再谈利益了,要讲仁义道德。

《老子》第九章写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老子》第四十四章写道: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把满足的标准定为是否知足,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为只有知足才能满足。对于欲壑难填、贪婪无度的人,“拥有”的再多也不叫满足或者不能使其满足,心理上不满足必然带来行为上的“不知止”,“辱”必近也,“祸”必至也。“知足”乃清静无为之表现,亦是“不欲”“寡欲”之结果,“未有能寡欲而不知足者,亦未有不寡欲而能知足者。只有常知足,才能自律,只有自律,才会充满自信和幸福,才能保持“浴不必江海,要之去诟;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10]的正常需求,才不会做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蠢

事。“夫君子之行,俭以养德,静以修身,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11]“欲不可去,求可节”,“防欲(欲望膨胀)如挽逆水之舟,才竭力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是以君子之心无时而不敬畏也。”[12]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3](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不摆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任何时候——哪怕是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可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

作为一名炎黄子孙,特别是作为一些具有特殊行业的人,如教师、公务员等,在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地反求诸己,正如曾子所说:“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四)从汉字中寻找道德能量

汉字,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古代的高科技,包涵有巨大的精神能量,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汉字能造就一种独特的意境,这种意境用其他文字是很难翻译的。另外,在文字的构造上也有道德的意涵。

道:上面的两点可以写成阴爻(断开的横线),下面的一横是个阳爻,底下是身体身的上半部,加在一起是个首字,也就是人的头部,金文直接把首字画成一个人头,走字旁。“一阴一阳谓之道”。为什么首的上面是一阴一阳?是因为当人的大脑处于阴阳平衡状态时,才是人最有智慧的时刻,人的思考才是积极地、正面的,也就是说才有正念。把这种正念表达出来就叫正语,按照正念去行动就叫走正道。所以我们看这个道,有思考、有行动、有表达(道也是说的意思)。立正念、言正语、走正道,这难道不是职业道德建设中的最基本的要求吗?

德: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就把这个德的内涵全部地包容在其中。“德”,右边上面是个“十”,下面是个“四”,再下面是个“一”,下面是个“心”,左边是个双人旁“彳”,这个整体效果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众人面前,自己的“言、听、视、动”,要一心一意地体现十种善心(忠孝心、廉洁心、诚信心、敦化心、决恒心、好善心、慈悲心、平等心、博爱心、勇猛心)。(还有一种解释:很多双眼睛盯着你,看你是不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一心一意。如果不是,你就是虚伪、狡诈和不诚实,因而也就是无德或缺德)。

教:在古代,最大的缺德和无德莫过于不孝。这个孝字就是德的代称,有德才能教你知识、教你本领,无德或者德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没有资格学习文化。因为有才无德——危险品。所以古代有不孝不教的说法。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厂(厥):按照繁体字,尚,就是高尚,有道德;文,是指有文化、懂技术。那么工厂企业就是聚集和培养有道德懂技术人才的地方。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他曾说:松下是为社会培养圣贤之人的地方,电器生产只是我们附带的业务。试想,如果企业都是一帮圣贤之人,还会有假劣伪冒、坑蒙拐骗吗?还会有“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吗?

三、结束语

温家宝同志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企业家的身体里面应当流淌道德的血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不仅要实现全面小康的生活目标,同时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下去,正如古印第安语所说: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

注释:

①注:文中《老子》原文除特别注明引用出处外,其余皆引自王弼本。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管仲.管子[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下转第98页)

论《中原音韵》韵谱的性质

金有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中原音韵》是元代的一部关于元曲创作的著作，由韵谱和“正语作词起例”组成。《中原音韵》对此后的戏曲创作有重要影响，对研究元代的汉语语音也有重要价值。关于《中原音韵》韵谱的性质，学者们多认为是同音字表。经研究发现，《中原音韵》的韵谱只是广义上的押韵字典，不是同音字表。如果我们把《中原音韵》的韵谱看成同音字表，那么就会给《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带来困扰。

关键词：周德清；《中原音韵》；韵谱；同音字表；押韵字典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8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93－06

《中原音韵》是元代的一部关于元曲创作的著作，由韵谱和“正语作词起例”组成。《中原音韵》对此后的戏曲创作有重要影响，对研究元代的汉语语音也有重要价值。

关于《中原音韵》韵谱的性质，学者们多认为属于同音字表性质。本文拟对此做一些讨论。

一、《中原音韵》的韵谱不是同音字表

为了给诗文押韵提供一个规范，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押韵字典，例如《切韵》《广韵》《集韵》等等。人们习惯上称这种押韵字典为韵书。

押韵字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押韵字典，比如《切韵》《广韵》《集韵》等，这一类押韵字典在声调、韵母、声母的区分上非常严格，必须是同声调、同韵母、同声母的字才放在一个同音字组里，每个同音字组都注明反切和字数。这种同音字组习惯上称作小韵。正因为上述诸韵书区分每个字的声韵调如此严格，所以这种韵书实际上都是一种严格的“同音字表”。

广义的押韵字典，比如周德清编辑的《中原音韵》，它是为元曲押韵服务的，按说也是一种押韵字典。不过，它与《切韵》《广韵》《集韵》一类押韵字典有点区别。

《中原音韵》全书分为19个韵部，每个韵部里再分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以及“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等声调。在每个声调里，再把所收录的单字按读音差异分成若干组，在字组与字组之间用符号“○”隔开。比如东钟韵平声阴：

“东冬○锺鐘中忠衷终○通蓪○松嵩○冲充衝舂忡摏艟穜翀种○邕嗈雍○空崆○宗椶騣○……”

由于“○”有“空”的意思，所以习惯上就把由○隔开的一组（字）称为一“空”，比如周德清在《中原音韵》的“正语作词起例”第11条指出：

“《音韵》内每空是一音，以易识字为头，止依头一字呼吸，更不别立切脚。”[1]45

由于周德清自己说“每空是一音”，所以研究《中原音韵》的专家学者就把《中原音韵》的“空”理解为“小韵”，即理解为“同音字组”。既然“空”等于“小韵”，那么，《中原音韵》的韵谱，自然就跟《切韵》《广韵》《集韵》一样，是一部“同音字表”了。例如：

1. 杨耐思先生《中原音韵音系》

“中古音系的‘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初崇生俟）’三组字在《中原音韵》里已经合并。合并的情形大部分是同一个小韵①里‘知’组字和

收稿日期：2018－09－19
作者简介：金有景（1931—1999），男，浙江义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中医学研究。（本文由金有景先生的儿子商务印书馆的金欣欣编审授权发表）

‘章’组字混,或‘知’组字和‘庄’组字混。例如:

江阳［平阴］章漳獐樟璋彰麞章张知

江阳［平阴］庄妆装庄椿知……”[2]20-21

此外,这部书第七章[2]76-186为单字音表。该章的标题是“中原音韵同音字表”。

2. 李新魁先生《〈中原音韵〉音系研究》

这部书第六章的标题是“《中原音韵》的音节结构”。

第六章首段说:“前面几章我们已经把《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它所代表的音系以至声、韵、调的情况讨论过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具体探明它所反映出来的音节结构。要把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较好的方法是将它的语音系统平面化起来,也就是把《中原音韵》一书所列出的‘小韵’(代表各个声韵调相同、即读音完全相同的具体的音节),按照我国宋元时代出现的表示韵书反切系统的韵图的格式,列为单字音表,或者叫做音节表。”[3]126

3. 宁继福先生《中原音韵表稿》

这部书未用“小韵”之名,但称《中原音韵》的“空”为“有调音节”:

“周氏的音②,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有调音节。《中原音韵》有1450个有调音节。”[4]163

4. 薛凤生先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这部书称《中原音韵》“每空是一音”的“空”为“同音字组”。例如《前言》说:

“本书的基本假定是:《中原音韵》把大量的汉字分成相互独立的同音字组,从而记录了当时汉语音节间一切可能存在的语音对立……”[5]1

笔者认为,把《中原音韵》每个“空”当作“小韵”,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是不妥当、不正确的。

事实上,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第11条提到的“《音韵》内每空是一音”,其含义与《切韵》《广韵》《集韵》一类韵书的“小韵”内诸字间都同音的含义并不相同。《切韵》《广韵》《集韵》一类韵书,每个“小韵”都标了反切,它所含诸字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字。《中原音韵》里的“空”其所含诸字间大部分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关系,但也有一部分的“空”,其所含诸字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关系(这一部分“空”占多大比例,有待进一步研究)。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还需要从周德清编辑《中原音韵》一书的时代背景谈起。

二、周德清编辑《中原音韵》的时代背景

在周德清所生活的时代,中古音系已全面瓦解,音韵系统大为简化。声调方面出现了“平分二义、入派三声”的新局面,韵母方面由57个平上去(入)系列(共含206韵)简化为19个平上去系列。声母方面,全浊声母作为音位已不复存在,但作为音位变体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元曲作家、演员再按《广韵》《集韵》的押韵系统来创作、演唱元曲,就产生了极大的困难。深谙元曲韵律的周德清,适时编辑了一部反映在中古音系瓦解后新形成的近古音系的新韵书《中原音韵》。周德清心里十分明白,编辑《中原音韵》的重点应放在正确体现元代汉语新音系的框架(声调方面是“平分二义、入派三声”,韵母方面是出现了19韵的新系统,声母方面全浊声母诸音位已不复存在)上头,至于新音系的细节问题(同音字组)则不可能反映得那么全面、细致、准确。事实上,即使周德清想要全面准确地反映细节问题,客观上也有困难。

首先,周德清正处在汉语语音史上第三次大变动的末期,许多语音还没有完全定型;旧音如全浊声母还没有消失干净,入声虽然韵尾已发生大变化,但入声作为一个调类还勉强保持着,如此等等。要在“同音字组”(“空”)里全面、细致、准确地反映上述变动中的过渡型语音,在技术上是有相当难度的。

其次,我们从今天有限的关于周德清生平的资料来看,周德清编辑《中原音韵》,其条件是比较差的。一是长期颠簸,生活不安定,不见得有资助经费。他从事这么一部划时代的大作品的编纂,难度的确是比较大的。古今许多专家都认为周德清编辑《中原音韵》是归纳当时诸位元曲大家的作品韵脚而成。笔者认为他不一定能全部读到当时元曲关、郑、白、马等等大家的作品,更不用说全部摘录、归纳关、郑、白、马等等大家作品中的韵脚。周德清首先是根据自己对元代汉语语音体系的认识制订出《中原音韵》音系大框架,当然这个大框架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关、郑、白、马等等大家的押韵情况相符合的。但肯定也有一些元曲作家,主要是北方话以外地区的作家以及各地的新作家,创作的元曲在押韵方面不够规范,存在一些问题。再说有了这个大框架,周德清还不可避免地要参考、抄录《广韵》《集韵》这类韵书上的例字。从现在可以见到周德清连韵书的字音都抄错③这一点来看,他那时并不具备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编纂环境。假如我们要求周德清进一步把《中原音韵》的每个“空”内的字都搞成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字,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周德清想那么做,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何况周德清会认为,从当时客观上对《中原音韵》一书的要求来说,

《中原音韵》已经基本上都做到了。唯一的一点欠缺,有些“空”(同音字组)里诸字之间容许声韵母方面有点小异,看来也无伤大雅。

以上所说某些“空”里声韵母存在小异也无伤大雅,是从押韵功能的角度来说的。假如我们要通过对《中原音韵》韵谱中每个“空”的分析来构拟元代汉语的音系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了。现在就笔者见到的研究《中原音韵》的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把《中原音韵》韵谱里的“空”当作“小韵”,从而进一步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这当然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这种偏差或错误已经对《中原音韵》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所带来的问题

笔者认为,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至少会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并不是真正同音的字当作了同音字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例如:

1. 东钟韵,平声阳第 8 空

重钟合三澄蟲东合三澄慵鱅钟合三禅/崇东合三崇

在《中原音韵》时代,前四字与“崇”不同韵母:前四字读 - iuŋ 韵母,后一字读 - uŋ 韵母,这可以从与《中原音韵》同时代但略早的《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得到证明。可周德清硬是把“崇”字与前边四字同放在一个空里。因为从元曲押韵角度出发,这么处理是完全可以的。可是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这或许是传刻有误,应该在“崇”字前头加个圈号“○”,以表明“崇”字是单独一空。

2. 庚青韵,平声阴第一空

“京麖庚鹒赓更粳羹畊驚荆经兢矜泾”

以上一共 15 个字。这些字其实也不都是同音。先来看看它们的历史来源。从等韵学角度看,这 15 个字分别来自梗摄、曾梗的二等、三等、四等:

A. 来自梗摄二等庚韵的:庚鹒赓更粳羹,

来自梗摄二等耕韵的:畊(耕);

B. 来自梗摄三等庚韵的:京麖驚荆,

来自曾摄三等蒸韵的:兢矜;

C. 来自梗摄四等青韵的:经泾。

按一般规律推断,在《中原音韵》时代,以上来自二等庚、耕两韵的“庚鹒赓更粳羹,畊(耕)”等 7 个字与来自三等庚韵和蒸韵、四等青韵的“京麖驚荆,兢矜,经泾”等 8 个字尚未合流,也就是说,这 15 个字还没有变成同音。即使在 600 多年后的今天,一般的北方话里这两组共 15 个字也还读不同的音。比如,前 7 个字中,北京话读音为:

“庚鹒赓羹”都读 gēng。

“更”有 gēng、jīng 两读:“自力更 gēng 生”,“打更 jīng”。“五更”则有 wǔgēng(文读)、wǔjīng(白读)两读。

只有“粳 ~ 米”一般读 jīng,没有读 gēng 的。

我们不妨设想,600 多年后的今天的北方话尚且如此,600 多年前的《中原音韵》里,“庚鹒赓更粳羹畊(耕)”等 7 个字反而会读 jīng 吗?

这个问题,对比一下与周德清《中原音韵》同时代的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就更清楚了。上述这 15 个字,卓书收了 13 个,即少收了“麖”“泾”两字。在卓书里,这 13 个字不是合成一“空”,而是分成两“空”,即“庚鹒更杭(粳)赓羹畊(耕)”为一“空”,“驚京荆经兢矜”为一“空”。[1]116 估计《中原音韵》时代,“庚鹒更杭(粳)赓羹畊(耕)”(二等)与“驚京荆经兢矜”(三四等)的读音有些差别。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的广大北方话区域,也还大致保持着,并没有大的变化。④根据当今北方话的实际读法和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的真实记录,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中原音韵》里“庚鹒赓更粳羹畊”与“京麖驚荆兢矜经泾”的读音存在着差别,很可能前者读[kjiəŋ],后者读[tɕiŋ]。这种差别,笔者认为周德清肯定是能分辨的,但是周德清并没有把这两组字分开来,分列两“空”。这也是好解释的,因为周德清认为他仅仅是在编供元曲押韵的押韵字典(广义),不是在编“同音字表”。

(二)把其实是同音的字当作了非同音的字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例如:

1. 支思韵,去声(共 8 空)

“是氏市柿侍士仕使示谥莳恃事施嗜豉试弒筮视噬○似兕赐姒巳汜祀嗣饲笥耜涘俟寺食思四肆泗驷○次刺莿○字渍牸自恣骴眥○志至誌○二贰饵○翅○厕”

这里第 7、第 8 两空存在问题。按说,支思韵是拼 zh、ch、sh、r、z、c、s 这 7 个声母,这里却出来 8 个音节。原来,“翅”字读音古今不同。现代北方话“翅”一般都读 chì,可在《广韵》里都读“施智切”即 shì。《中原音韵》处在《广韵》时代和现代的近乎半中间,所以在《中原音韵》的时代估计“翅”字很可能是 shì、chì 两读。由于支思韵第 1 空里“是氏市柿……视噬”等 21 个字读音比较单纯,都只有 shì 一读,而“翅”则有 shì、chì 两读(而且很可能新生读音 chì 已变成主要读音),让“翅”与“是氏市……”等

21 个字放在一起,就有点不合适了。显然周德清为此左右为难。但他最后还是把“翅”字单成一“空”了事。从广义的“押韵字典”角度看,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合适。还有一个“厕”字(《广韵》“初吏切”),也许周德清开始没有收它(先不必考虑是什么原因——当然也可能是漏收);但最后还是决定要收,但这时书版都已经刻出来了。那时木版雕刻⑤,不像今天铅字排印,更不像电脑排字,改个字、加个字那么方便。那时加个字,只要是无害大局,都加在最末尾(校勘学上一般称这种字为“后加字”或“增加字”)。这样,“厕”字就只能放在最后,即“翅”字的后边。按说《中原音韵》时代的“翅”“厕”都可以读 chi,从这点看,它们也可以放在同一“空”里。可是由于“翅”字还有传统的 shì 一读,两字还不是完全同音,周德清最终还是让“翅”“厕”各占一空。这么一来,却令现代学者感到困惑。比如:

杨耐思先生《中原音韵音系》在其《中原音韵同音字表》支思韵去声“翅/ 厕”下加了一个脚注:

“‘翅’‘厕’两小韵连出。‘翅’,《韵会》归‘审’母,《蒙古字韵》对音ʃ,但《中原音韵》这地位已有‘是’。现代北方话区域内‘翅’与‘厕’同音的常见。《中原音韵》两小韵连出,或中间衍一○。”[2]91

在这个问题上,宁继福先生的《中原音韵表稿》只是把“厕”字放在了第 3 空“次刺莿”里,未加任何说明,使这个原来 3 个字的“空”成了 4 个字。[4]29

在语音学里,“发音”与“读音”是不同的概念。比如方言区人学普通话,甲乙二人都对普通话的卷舌声母 zh、ch、sh 学不好。甲呢,对普通话哪些字读 zh、ch、sh,哪些字读 z、c、s,记得清清楚楚,从不会说错。可是由于唇型不标准,卷舌动作有欠准确,他说的 zh、ch、sh 总带有方言的色彩。乙呢,普通话的 zh、ch、sh 学得很像,可哪些字读 zh、ch、sh,哪些字读 z、c、s,总是记不住。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评判甲、乙两人的问题所在:甲学习 zh、ch、sh,读音上没有问题,发音上有问题;乙学习 zh、ch、sh,发音上没有问题,读音上有问题。普通话的《学话手册》(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各地编辑出版的《某某(地名)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不仅要帮助方言区人克服“读音”上的难点,还要帮助方言区人克服“发音”上的难点。《普通话正音字典》只管“读音”上的问题,比如告诉读者,“塑料”念 sùliào 是对的,不应念 shuòliào 或 suòliào;却不管“发音上的问题”,比如它不必告诉读者,普通话卷舌声母应该怎么学才能学得标准。

从“发音”“读音”的差别来看,“同音字表”重视“发音”差别胜过“读音”差别,像《中原音韵》这种押韵字典,则重视“读音”差别胜过“发音”差别。在这一方面,《中原音韵》与“正音字典”的性质很相近。其实,《中原音韵》的韵谱,就是专门为元曲押韵编辑的一部“正音字典”,因为它实质上是指导元曲作家如何正确地押韵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正音字典”。

2. 莆豪韵,“入声作上声”第 8 空“郭廓”与第 19 空即最后一空“戳棚”

(前 7 空略)“○郭廓○朔稍○剥驳○爵○削○柞作鑿○错遣○阁各○壑熇○绰婥○谑○戳棚”

以上第 8 空“郭廓”和第 19 空“戳棚”如果从“同音字表”的标准来要求,都有问题。

(1)先说“郭廓”

今音“郭”音 guō,“廓”音 kuò;《广韵》“郭”古博切,“廓”苦郭切。今音与《广韵》“郭廓”两字都不同音。那么,处在《广韵》时代与今音近乎半中间的《中原音韵》怎么可能两字同音呢?其实,周德清肯定知道这两个字不同音,那么他为什么把它们同列一“空”呢?原来,在《中原音韵》时代,在入派三声过程中产生出来一个怪韵母[uau]([uau]是一种过渡音,没有多久就消失了)。这个韵母在《蒙古字韵》里共收 40 余字,而在周德清《中原音韵》里一共才 3 个字:

入声作平声:[ɣuau]镬

入声作上声:[kuau]郭

[k‘uau]廓

由于《中原音韵》的韵谱不是“同音字表”,而只是一种广义的押韵字典;加上“郭”“廓”声母又很相近,两字也就凑合地同列于一“空”之内了。600 多年前的周德清到底不是职业的语音学家,而是一位杰出的曲韵家和元曲作家。所以他在编《中原音韵》韵谱时,更多地是从押韵正音的角度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由于曲韵家与音韵学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目的不同,所以会引起后人的一些困惑。

(2)再说第 19 空“戳棚”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就“戳”的字形做一些辨析工作。

《中原音韵》萧豪韵入声作上声的“戳”字,各本均同。参张玉来先生等《中原音韵校本》[1]33。但是此字似当为“戳”。理由如下:

第一,“戳”见于《广韵》觉韵:“刺也”,敕角切。“戳”字《广韵》《集韵》未收;《篇海类编》戈部:“枪戳也”,侧角切。从周德清在编辑《中原音韵》过程

中必然会参考前代韵书的角度说,“戳”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在《广韵》中,“侧角切”有“捉樵糙斲”等5个字,《中原音韵》收入了“捉”字。《广韵》“敕角切”有“逴趠啅踔戳”等5个字,就现在可以见到的《中原音韵》各种版本看,《中原音韵》一个字都没有收。如果此字确为“戳”字,那么按照《篇海类编》的反切“侧角切”,把“戳”放在萧豪韵入声作上声第2空“捉卓琢”内,使之与“捉”同音,似更妥当。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增加字的原因,那么“戳”字不应另为一“空”。

第三,“戳”与“戳”字形相近,如果是把“戳”讹为“戳”,也是有可能的。

下文即以“戳”字代替“戳”字,讨论以下问题⑥。

“戳”与“槊”今音、《广韵》都不同音。“戳”今音chuō(《中原音韵》归上声),《广韵》敕角切;“槊(槊)”今音shuò,《广韵》所角切。那么周德清为什么硬要把这两个不同音的字放在一起呢?先看《广韵》觉韵[6]464-465上的记录:

“朔:月一日。……所角切。十二。

敕:口噏也。

欶:上同。

矟:矛属。《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谓之矟。

槊:上同。

蒴:蒴 。药也。

数:频数。

箭:《说文》曰:以竿击人。又舞者所执。又苏彫切。

槊:绒也。

:木名。

槊:纤也。又臂长⑦貌。又相邀切。

罰:罰。罘罳。”

以上“所角切”的这12个字当中,周德清收了第1字“朔”和第4字“矟”。大概后来又想起要增加一个“槊”字,因版已刻成,不好动了,就加在最末,即加在“戳”字后面(这种校勘学上的“增加字”,《广韵》里就不少见)。由于《中原音韵》的韵谱只是广义性质的押韵字典,“戳”“槊”声母差一点也就差一点了。⑧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中原音韵》的韵谱只是广义上的押韵字典,不是同音字表。如果我们把《中原音韵》的韵谱看成同音字表,那么就会给《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带来困扰。

此外,就《中原音韵》的分“空”问题来说,《中原音韵》的确有不少像“戳槊”“庚……京”这样一“空”非一“音”的例子。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现在有的《中原音韵》研究者主张给它添加“○”符号,以维持一“空”一“音”的原则。笔者认为不必这么做,也不应该这么做。作为汉语史和古音学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中原音韵》这部广义的押韵字典所提供的元代语音信息,构拟出《中原音韵》时代汉语通语的语音面貌。具体地说,是要编出《中原音韵》时代汉语通语的同音字表。我想,要编出这份同音字表,必须先看清《中原音韵》的性质只是广义的押韵字典,不是同音字表这一点。然后,再去把《中原音韵》韵谱里全部一千四五百个“空”剖析清楚。如果发现问题,就把问题的性质、原委讲清楚,但是却不必对相关内容加以改动。

注释:

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② 引者按:即“《音韵》内每空是一音”的“音”。

③ 限于篇幅,本文作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

④ 这里所举的这种“庚更”(二等)与“鹲经”(三四等)读音不同的问题,不只存在于庚青韵平声阴第1空(已如上述)。另外,平声阴第15空“轻卿甖倾,坑誙硜铿”,平声阳第12空“形刑邢铏硎,行桁衡珩”,上声第1空“景儆璟?警境颈,骾鲠绠梗耿哽”,去声第1空“敬径侹经镜獍竟兢劲,更”,第18空“胫兴,杏幸倖行”等空里边也都是存在的。限于篇幅,不再细说。

⑤ 宋代虽然已发明活字印刷术,但雕版印刷术并未被取代。后者在元代仍然盛行。

⑥ 由于下文主要是讨论“槊”字,即使《中原音韵》的“戳”字无误,也不影响这一讨论的结论。

⑦ “臂长”,泽存堂本作“长臂”,此从《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⑧ “戳槊”中的“槊”字到底是哪个字,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上述《广韵》“所角切”的12个字当中,第4字“矟”与第5字“槊”所指为一,都是指“古代兵器,杆儿比较长的矛”(《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1227页)。至于第10字“槊”,周德清收入的目的,一个可能就是针对“木名”,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槊”字的不同写法(就像把“岑”字写成“岭”字一样)。以下两部辞书可以参考:

(1)《集韵》入声觉韵:“槊:木名。一曰栅也。色角切。”“槊”与“槊”同音。

(2)《汉语大字典》(第2版):“槊:①木名。《玉篇·木部》:‘槊,木名。’②栅栏。《广雅·释宫》:‘栅谓之槊。’③同‘矟’。长矛。《篇海类编·花木类·木部》:‘槊,亦同矟。矛。’”(第3卷,第1360页)

当然,也可能是周德清一时疏忽,错把当时手写体中流行的"稍"之异体字""(即"槊"字)给重复地收入字表了。

参考文献:

[1]张玉来,耿军,校. 中原音韵校本(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校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M].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4]宁继福. 中原音韵表稿[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5]薛凤生.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M]. 鲁国尧,等译.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6]余廼永,校注.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宋]丁度,等. 宋刻集韵[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Z]. 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Zhongyuanyinyun's* Rhyme Spectrum

JIN Youj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Zhongyuanyinyun* is a Yuan Dynasty work on the creation of Yuan Qu, composed of rhyme and composition examples. *Zhongyuanyinyun*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drama and Chinese drama composition, and it is valuabl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phonetic of modern times.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essence of *Zhongyuanyinyun* is a homophone lis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hyme spectrum of *Zhongyuanyinyun* is only a rhyming dictionary in broad sense, not a homophone list. If we regard the rhyme spectrum of *Zhongyuanyinyun* as a homophone list, it will bring trouble to the phonological study of *Zhongyuanyinyun*.

Key words: Zhou Deqing; *Zhongyuanyinyun*; rhyme spectrum; homophone table; rhyme dictionary

---

(上接第92页)

[4]高亨. 老子注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5]陈鼓应. 老子注释及评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十二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7]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司马光. 资治通鉴[M]. 沈志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张剑伟. 无私与有私的辩证法:关于《老子》第七章的解读[N]. 文化艺术报,2014-03-26.

[10]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诸葛亮. 中华国学文库:诸葛亮集[M]. 段熙仲,闻旭初,编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吕坤. 呻吟语[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许　峻)

Moral Cul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XIE Jinji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5000-year civilization, the word "morality" is very important. Many sages themselves are social moral models. On the proposition of "what is morality?" Confucius thought that the core of morality is benevolence. And Laozi thought that morality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ao. In *Zuo Zhuan*, it is clear that mor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which shows that morality is important for a country or a nation. As for the path of moral cultivation, one or two can be seen from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go, including attaching the importance of "unspoken teaching", practicing abstract moral theory, drawing nutrition from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finding energy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vide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and a steady stream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mentum.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ity; moral cultivation

国家形象之话语建构手段

党兰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46)

摘 要:话语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不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静态片面关系,更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动态辨证在线关系。对此,在考察分析大量国家外宣语篇的基础上,总结出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的主要手段,即词汇手段、句法手段、语篇手段以及积极修辞手段。

关键词:国家形象;话语建构;话语手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19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099-05

一、引言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对广大普通受体而言,主要通过话语来获取作为认知客体的国家行为体的相关信息,并建立起关于认知客体国家行为体的表象,进而表象形成国家形象。同时,通过话语建构的国家形象经过广大受体的认知而又不断得到建构与再造,并反过来对认知客体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形象构筑发生反馈作用,促使其不断进行话语调整与建构。可见,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话语过程。正如胡范铸、薛笙(2010)所指出的,"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加以叙述的,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的"。[1]36窦卫霖、杜海紫、苏 丹(2012)也指出,"国家身份和形象是语篇的产物,通过语篇被构建和传达"。[2]83对此,在考察分析大量国家外宣语篇的基础上,本文试对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的具体话语手段做一分析与归纳。

二、词汇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一)表国家形象范畴词语

所谓"表国家形象范畴词语",指的是能直接展现和彰显国家形象的词语。比如:

(1)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0118)

(2)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人民崇尚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巴黎协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坚持不懈努力。(张高丽《推进落实〈巴黎协定〉共建人类美好家园——在〈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0422)

例(1)、例(2)中,通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这些"表国家形象范畴词语",鲜明而得体地凸显和展现了当前国际社会中交际主体中国的形象定位。

(二)评价性词语

评价性词语作为使用主体对人或事物、事件进行主观比较性反映,包含着使用主体对人或事物、事件的立场、观点、态度、情感和评价等。根据语义的褒贬和显隐,可分为正面评价性词语、负面评价性词语和显性评价性词语、隐性评价性词语。

国际交往中,或显性或隐性正面评价性词语的恰当使用,大大有助于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积极正面的良好形象。根据我们对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08年中国的国防》的统计分

收稿日期:2018-09-15
作者简介:党兰玲(1966—),女,河南唐河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语言经济学。

析发现,交际主体中国在显著凸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国防白皮书中,通过显性正面评价性词语,如“认真”“切实”“积极”和隐性正面评价性词语,如“履行”“采取”“参与”“发展”“合作”“坚持”“开放”“建设”“实现”“加强”“完善”“新”“反对”“防御性”“致力于”等有机搭配使用,有力展现、塑造和建构了一个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形象。

当然,在发生国际冲突、矛盾时,交际主体国家一方也可通过负面评价性词语的使用,来对“他者”国家的身份、地位、形象等进行否定性塑造与建构,进而有助于自身合法、合理良好形象的打造与构筑。在与菲律宾有关南海的争议中,作为交际主体的中国,在显著凸显和展现使用主体国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的声明中,通过负面显性评价性词语“违背”“侵权”“挑衅”“急剧恶化”“破坏”“滥用”和负面隐性评价性词语“单方面”“关闭”“导致”等有机搭配使用,既对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上的立场、身份和行为进行了否定与解构,又有助于其为南海诸岛主权的合法、合理“拥有者”、南海有关争议的和平“协商者”这一良好形象的展现、打造与构筑。比如:

(3)菲律宾提起仲裁以来,单方面关闭了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大门,并违背双方达成的关于管控分歧的共识,采取一系列侵权和挑衅行动,导致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的急剧恶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明》,20160608)

(三)表情态词语

国际交往中,表情态词语不仅传达了交际主体国家对相关命题或提议的肯定(否定)程度,而且有助于其良好国家形象的打造与构筑。比如:

(4)a. 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坚定力量。(2006 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06 年中国的国防》)

b. 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0328)

(5)我们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务实合作这条主线,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点。(习近平《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20170904)

例(4)中,通过“永远是”这种情态里最具肯定意味的表达法和“绝不”这种情态里最具否定意味的表达法,有力传达和展现了交际主体中国对相关陈述内容的坚定信念与立场。因此,也大大有助于一个坚定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国家形象的展现、打造与构筑。例(5)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公开场合,通过中低量值道义型表情态词语“应该”等的使用,来传达交际受体国家需承担的相关责任或义务的同时,也给交际受体国家留下了一定的选择余地与空间,增强了话语的可协商性。因而,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出一个深具民主、平等品性以及客观中立的国家形象。

(四)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不仅仅是表指代的词,还具有表称谓和定位、评价和同盟关系三位一体的立场建构功能。因此,国际交往中,人称代词的恰当使用,也有助于交际主体国家良好形象的展现、塑造与建构。比如:

(6)我们要继续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在“1+3+6”务实合作新框架内,发挥优势,协同行动,提升中拉务实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习近平《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161121)

(7)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161121)

例(6)、例(7)中,通过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的使用,在有效塑造和建构起了中国与交际受体国家之间的同一立场和“群内成员关系”的同时,也有助于打造和构筑交际主体中国为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参与者”和“打造者”这一良好形象。

(五)数词

数词作为人类计量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作为语言特殊而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仅用来表明事物的数量,也具有本体建构功能,能够生产和建构社会实在。艾喜荣指出,“中国的 GDP 总量在 2010 年约为 5.9 万亿美元,大多数人对这个数字可能并没有深入的理解。但是通过数字的序数功能,可以看出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3]46可见,国际交往中,数词的本体建构功能也有助于交际主体国家良好国家形象的展现、塑造与建构。比如:

(8)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6.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4.1%,新增城镇就业 735 万人。(习近平《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

色十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170903)

例(9)中,通过基数词“6.9%”“54.1%”“735万”等,对相关数字信息的凸显和描述,清晰而有力地展示了交际主体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速。因而,大大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经济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句法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不同语气的句子,发挥的言语功能不同,传递的信念、态度、观点、地位等也不同。因而,也成为凸显、展现、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良好国家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陈述句

用来提供信息、陈述事实或使用主体看法、表达声明的陈述句,可使话语内容显得庄重、肯定,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国际交往中,陈述句的大量使用,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坚定、自信、客观而权威的良好形象。比如:

(9)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0328)

例(9)中,交际主体中国,通过陈述句的形式,有力展现、塑造和建构了其崇尚和平、不尚暴力、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形象。

(二)祈使句

祈使句作为一种控制性的言语行为,表示要求/不要求、允许(命令)/不允许、告知/请求听话人做/不做某事,体现了使用主体的权威与主控地位。因此,国际交往中,祈使句的使用,有助于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的权威性、号召力与坚定自信等良好形象及其所处的权势身份地位。比如:

(10)第一,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第二,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20160904)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公共场合,通过“让我们……”“我们要……”“我们应该……”等祈使句的使用,在向交际受体国家发出相应号召和要求的同时,也有助于凸显和展现交际主体中国在对话中所处的主导和支配性地位,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了交际主体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信而又权威的良好形象及其所处的相对权势身份地位。

(三)感叹句

表意丰富的感叹句,在国家形象的得体塑造和建构过程中,主要是用来传达和展现交际主体国家对实现美好未来的强烈肯定、憧憬与向往这一积极形象。比如:

(11)我相信,只要我们矢志笃行,中哈关系必将插上梦想的翅膀,飞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20170607)

例(11)这样的感叹句,充分传达和展现了交际主体中国对实现美好未来的强烈憧憬、向往与肯定这一积极形象。

四、语篇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一)语体

每一种语体都在建构着使用该语体主体的地位、角色、立场、态度等。因此,在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中,选用什么样的语体也至关重要。中国在与菲律宾之间的南海有关争议中之所以频繁采用“声明”的语体形式,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201510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明》(2016060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0712),就是因为这种语体形式能强烈凸显使用主体国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等,彰显着使用主体国家对有关事项或问题的不可辩驳的坚定立场和不可否定的强硬态度,从而大大有助于塑造和建构使用主体中国为南海诸岛主权的“合法”“拥有者”、南海有关争议的和平“协商者”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维护者”这一良好形象。

当然,除了声明这种语体形式,白皮书尤其是国防白皮书、宣言、公报、外交演讲、条约等,也都是有力展现、塑造和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语体形式。

(二)话语内容

国际交往中,在话语内容上注重对交际主体国家积极信息的凸显与展示,也大大有助于打造与构筑其良好形象。试比较:

(12)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

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150928)

(13)然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将几乎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所有增长部分的来源,这些国家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中一些国家已经为发展和使用清洁能源迈出重要步伐。然而,这些国家仍需承诺在国内采取严厉的措施,同意坚持履行有关义务,如同发达国家也必须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样。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别无选择。(奥巴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90922)

从话语内容上看,例(12)中,强调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处处传达和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面向国际社会的主张与立场。因此,展现、塑造和建构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呼吁者"和"维护者"这样的国家形象。而例(13)中,强调突出的则是敦促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承诺给予其相应帮助,号召广大交际受体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必须抓住时机","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因而,展现、塑造和建构出了一个发达国家利益的"呼吁者"和"维护者"这样的国家形象。

(三)话语礼貌

国际交往中,交际主体国家采用较为礼貌的话语形式,无疑有助于其为"礼仪之邦"良好形象的打造与构筑。比如:

(14)尊敬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尊敬的校长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这次,我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邀请,来到伟大邻邦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有机会来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同大家见面,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向友好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向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向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0907)

例(14)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公共场合,通过划下划线部分所示的礼貌话语,不仅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中国与交际受体国家间友好、合作的身份关系,也有助于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中国讲究礼仪、不愧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

五、积极修辞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一)隐喻

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选择和搭配,不仅能折射出使用主体的主观认知、信念、态度和情感,也引领着受体的思维,重塑着受体的态度,帮助人们建构社会实在。开启隐喻认知研究的莱考夫和约翰逊曾指出,通过隐喻的形式,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的某个方面时,会不可避免地使后者的其他方面被掩藏起来。也即通过隐喻,可以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导向使用主体所建构隐喻强调和凸显的那个方面。正如张巨岩、巩昕峤、宋婧(2010)所指出的,"通过对文本和话语中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修辞者运用这些隐喻所营造的'现实'"。[4]42翁青青(2013)通过语料库方法,统计分析得出,英国通过旅途隐喻塑造和建构了气候谈判路上起表率作用的"先行者"形象,而中国则通过植物隐喻和建筑隐喻等,把自身塑造和建构成一个气候谈判的积极缔造者和播种者形象。[5]可见,国际交往中,隐喻也可以用来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良好的国家形象。比如:

(15)a. 在世界经济充满挑战的大背景下,亚太经济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和潜在的困难和风险。亚太经济如何保持正确发展方向,如何找到新经济增长点、巩固增长引擎地位,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

b. 面对世界经济中的激流险滩,亚太这艘巨轮必须校准航向、把好舵盘,亚太各经济体必须勇于担当、同舟共济,努力推动全球增长。

c. 亚太在这方面要走在世界前面,努力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

d. 任何蓝图都不会自动变为现实,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亚太各成员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例(15)中,交际主体中国,通过"困难""风险""方向""激流险滩""这艘巨轮""校准航向""把好舵盘""走""前面""路径"等词语构建了"亚太经济发展是一次漫长艰难的海上旅行"这一隐喻,并着重指出了这一"旅行"的"方向"和"道路"。在此隐喻基础上,通过"同舟共济""携手并肩"等词语,又形象构建了"亚太各经济体是这趟海上旅行的同舟共济者"这一隐喻。通过这两个隐喻,一方面,传达和展现了交际主体中国对亚太经济发展之路的艰苦性、长期性的看法和立场,唤起广大交际受体国家的忧患意识、紧迫感和"选准道路、携手并进"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有力展现、打造和构筑了亚太各经济体实为"同舟共济者",只有相互协作、共同应对,

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这两个隐喻有助于间接凸显和建构交际主体中国为亚太经济发展之旅途上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会肩负起自身应承担的行囊重量,做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二)引用

国际交往中,通过引用较为权威文件、国家代表性人物或官方报刊、官方教科书等中的话语,指出或附录上相关具体文件等,也有助于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在相关事件上的积极正面形象。比如:

(16)1956 年 6 月 15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进一步具体介绍了越南方面的材料,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属于中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之《“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20140608)

例(16)中,交际主体中国,通过直接引用对方国家代表性人物、教科书中的相关陈说以及附录上相关文件等,如划下划线部分所示,有力彰显、塑造和建构了其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合法性、合理性“拥有者”形象。

六、结语

以福柯、福勒、费尔克劳夫、梵·迪克等为代表的“语言建构论”认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辨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话语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话语又在建构社会实在、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参与社会变革。话语不仅表现世界,而且说明世界、组织世界和建构世界。”[6]79-80话语所具有的这种实践性和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与其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静态片面关系,不如确切地说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动态辨证关系。国际交往中,良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交际主体国家在与交际受体国家互动的基础上,通过词汇(主要包括表国家形象范畴词语、评价性词语、表情态词语、人称代词、数词等)、句法(主要包括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等)、语篇(主要包括语体、话语内容、话语礼貌等)及积极修辞手法(主要包括隐喻、引用等)等各层面话语手段的战略性选用,动态凸显、展现、塑造与建构的产物。

参考文献:

[1]胡范铸,薛笙. 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5-40.

[2]窦卫霖,杜海紫,苏 丹. 中美政府国防白皮书与国家身份的构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83-94.

[3]艾喜荣. 试论数字在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作用[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5): 44-47.

[4]张巨岩,巩昕颂,宋婧. 公共外交与修辞中的隐喻:美国“911”后公共外交修辞中的系列隐喻[J]. 国际新闻界,2010(8):42-49.

[5]翁青青. 气候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和身份构建——以英国、加拿大、中国在历次气候大会上的发言为例[J]. 当代亚太,2013(5):139-156.

[6]闫亚平. 国家身份之话语建构策略[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79-8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National Image

DANG Lan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of practicality and constructiveness of discourse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national image not only a static relationship of “reflecting and being reflected”, but also a dynamic dialectical online relationship of “constructing and being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publicity texts, we point out the discourse methods to follow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that is the lexical methods, the syntactic methods, the textual methods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rhetorical methods.

Key words: national imag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method

听力理解中的元认知策略培训

傅 由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对留学生汉语听力元认知策略的培训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设计元认知策略指导表、听力理解障碍清单及组织学生对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的讨论,对研究样本中的实验组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元认知策略培训。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习效果和学习体验显著优于对照组。研究表明,对学生进行汉语听力元认知策略培训有利于学习成绩提高,所设计的元认知策略培训方法实用、有效。

关键词:元认知;听力理解;策略培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2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104-05

一、引言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听力课是一门压力很大的课,学习者常常不能很快理解听到的内容。听不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第二语言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尽快找出听不懂的原因,从而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提高听力理解水平。然而,"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认知操作过程,发生在人的大脑中,并不产出可以观察的成果[1]。因此,老师通常只能凭经验推测学生听不懂的原因,并指导学生理解。

元认知(metacongnition)理论的提出,改变了这种以老师为主体、从外部推动学生践行认知过程的学习模式。通过元认知策略培训,让学生结合自身元认知知识,自主实践计划、监控、评价等一系列元认知策略,可以更好地实现认知目的。

笔者通过要求学生填写元认知策略指导表、听力理解障碍清单,并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性讨论等方法,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留学生进行了听力元认知策略训练。实践证明,随着经验的积累,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有所提高,对自己的听力理解障碍和原因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学习由被动变主动,听力成绩有明显提高。

二、理论框架及相关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 Flavell(1976)首次提出元认知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人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及结果或其他相关事情的认知"。[2]它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可以用来监控认知过程,确保认知目标的实现。人们利用元认知策略管理自己的学习过程,计划、监督、评价认知活动,再根据评价结果进行调整,继续新的计划、监控及评价过程,从而实现认知目标。

国外关于第二语言听力元认知策略的许多研究表明,元认知策略可以促进语言学习,提高听力水平。Wenden (1998) 和 Goh (2006)建议,第二语言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听力理解的过程,帮助他们建立自我反思和自我指导型的学习,自己评估并调节学习[3]。Vandergrift (1999) 提倡利用听力理解表(checklist)帮助学生有意识地关注听力的过程以及使用的关键策略,调整并运用正确的策略,能够提升听力成绩[4]。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Vandergrift 和 Goh 等(2006)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听力元认知

收稿日期:2018-06-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08XNB053)
作者简介:傅由(1968—),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曾受国家汉办委派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等国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

意识问卷(MALQ),既可以帮助学生自我评价当前的元认知水平,记录自己的策略使用和听力意识的变化发展状况,逐渐培养成功的听力意识,又可以作为教师诊断和增强学生元认知意识的工具,评价学习者使用听力策略意识的变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听力认知策略的研究不少,而专门针对元认知策略的研究有限。张本楠(2008)认为:"一个人听力水平的高低与他使用听力策略的能力相关。听力策略教学即通过各种不同的训练,使学习者有意识地使用各种有效的听力策略,提高听的能力。"[5]130他同时提出,策略教学的基本方法是:提供有效使用策略的良好环境;向学生提供应当使用何种策略的建议;鼓励学生思考和使用有效的策略[5]152。

在元认知策略研究方面,狄蓉考察了初中级留学生汉语听力理解中的元认知策略的使用状况,指出计划、监控和评估策略与汉语听力成绩呈正相关,监控策略是与听力成绩最相关的策略[6]。白琼烨(2007)发现中高水平组学生比初级水平组学生更多地运用元认知策略[7]。陈东芳、孔雪晴(2012)发现中亚留学生在汉语听力中监控策略使用率最高,计划策略使用率最低,在使用元认知策略上没有性别差异[8]。

上述研究多基于问卷调查,本文试图通过策略培训、填写策略清单、反思和座谈等多种方法,考察元认知策略是否可教、是否有效。以期通过培训,学生掌握元认知策略,了解自己听力的过程和使用的对策,有的放矢地改进策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元认知策略培训

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科班留学生进行了为期 8 周的听力元认知策略培训。学生随机分为一班和二班,开设课程和教材一致。两班 HSK 平均成绩为 4 级,实验前两班平时测验成绩和期中考试成绩基本相当(平均分别为 79 和 78.2 分)。将一班 20 人设为实验组,在课堂上进行元认知策略培训;二班 18 人设为对照组,继续延用普通方法教学。每周 4 课时,共计 32 课时。使用教材为《发展汉语中级听力 I》,学习 14 篇课文。

元认知训练需要每次 5—10 分钟时间,对照组比实验组多出来的时间用于多听一遍录音,或者边听边讲解,然后展示文本。最终学生也能理解所听的内容,并准确完成课堂练习。

学期结束后比较两班教学效果,比较方法包括比较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访谈等,同时对比较结果进行 t 检验。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三种方法,分别从三个角度培训学生的元认知策略。第一是从普遍性入手,为每个学生提供一份启发元认知意识的自查表,目的是希望学生对自己的听力活动积极地进行计划、监控和评价。第二是从针对性入手,要求学生填写各自的听力理解障碍清单,追溯自己听力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最终选择恰当的听力策略。第三是引导和交流,通过老师在听力课中对元认知策略的有意使用及组织讨论,引导学生自觉使用元认知策略,提高元认知能力。

(一)元认知策略指导

在第二语言听力过程中,学习者不会像听母语那样,不使用任何策略也能自动化地完成理解。由于有各种影响理解的障碍,他们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各种帮助理解的策略,其中有预测、推理等认知策略,也可能有监控、评估等元认知策略。这些策略的使用,可能是基于他们的学习经验自己摸索出来的,也可能是听力老师引导使用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明确、有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元认知策略,引导他们使用,而不是等他们自己摸索。

我们首先要求学生填写下面的元认知策略指导表。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了解计划、监控、评价这三个元认知策略,当学生熟悉并掌握了这些元认知策略,就会在不断强化之下变成自发的行为。

本研究中的元认知策略指导表是根据 Vandergrift[9]和 Goh 等(2006)提出的在听力中启发元认知意识的问卷,结合汉语听力教学的特点而设计的。该表分听前、听时和听后三部分,分别应对了元认知策略的计划、监控和评价三元素。该表可以引导学生建立元认知意识,帮助学生在听前、听中和听后了解、掌握和运用元认知策略,促使学生不断思考自己的听力过程。这个表格需要反复使用,每次上课都要求学生认真填写。为了避免流于形式,还增加了提问环节,让学生填写完以后,回答表上的问题,以强化学生的策略使用意识,使之习惯成自然,在每次听力活动中常常提醒自己运用计划、监控和评价的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指导表在使用时,分两次填写。听前做第一部分,听后做第二、三部分。在实验之初,对学生解释问卷每一项内容的要求和目的,学生理解并熟练以后,可以缩短填写的时间。

我们要求学生每次上课都填写上表,之后与学生讨论,对他们的选项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使学生反思这样选择的深层原因。我们在注意力和使用听力

策略方面得出了以下结果:经过多次的提示和训练,学生在听前的注意程度由无意识变得有意识,会逐渐关注自己的注意程度,提示自己在听时使用适当的策略。在听的过程中,知道什么情况下容易分神,什么时候注意力最集中。

表 1　元认知策略指导表

听前

序号	内容	结果(是/不是)
1	已集中注意力来完成任务	
2	已经尽力去验证了自己的预测	
3	已及时修正了自己预测中的差错	
4	已经做到了只注意听该听的内容	
5	听时运用了背景、声音、语调等线索猜测不懂的词、句	
6	听时做到了通过听关键词、句来抓听力材料的主旨	
7	听时做到了运用自己对该话题有关的知识来理解听力材料的主旨	

听时

序号	内容	结果(是/不是)
1	已明白了听音的目的	
2	已懂得了在听音时该注意听什么	
3	已了解了有关听音材料的知识和信息	
4	已对即将听到的材料根据有关的知识和线索进行了预测(如听前已根据题目和选项,预测将听到什么并准备有针对性的听音等)	
5	已准备好集中精力听该听的内容	

听后

序号	内容	结果
1	听第一遍时,我听懂了%,不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2	听第二遍时,我听懂了%,不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3	听懂的内容比第一次多,因为	
4	我的收获是(内容、词汇、语法、听力策略等)	
5	遗憾的是	
6	对听力材料的评价(是否有趣、难度如何、词汇量是否合适等)	
7	对自己的评价(课前是否预习生词、上课是否专注、情绪如何等)	
8	我对下次课的希望	

注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递减的顺序是:1. 刚开始上课时;2. 刚开始听录音,很想听懂内容;3. 老师讲的内容自己不太懂的时候;4. 带着问题听录音的时候;5. 老师讲解听力策略的时候;6. 讲解答案的时候。

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原因由大到小分别是:内容太难,所以注意不集中(43%);文章太长,到后来不能集中(37%);听录音后,觉得疲倦,不能集中(24%);听完之后,如果自己对内容都理解了,注意力就不再集中(20%)。

我们把表 1 的分析结果反馈给学生,以便他们了解自己听力的过程,正视自己的问题,想办法提醒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注意力。同时,在讲课的过程中,预测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及时切换学习内容,重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除了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注意程度,我们还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听力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包括听懂了多少、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收获、对下次听力课的预期等。经过几次填写表格之后,学生反应因为要写出自己的收获,他们比以前更加关注使用了哪些听力策略,学到了哪些语言形式,提升了成就感。但对听不懂的具体原因缺乏清楚的认识,只能大概估计,于是我们根据 Goh(2000)提出的学习者听力难点[10],设计了一份针对留学生汉语听力理解的障碍清单。

表 2　听力理解障碍清单

序号	障碍内容	结论
1	记不住,很快忘掉听到的内容	( )
2	生词多,不理解词义	( )
3	不能认出已知词汇	( )
4	理解词汇,但不明白句子的意思	( )
5	考虑意义时丢失下文	( )
6	不理解句子结构	( )
7	分辨不出相近的语音	( )
8	语速太快	( )
9	边听边看,时间不够	( )
10	内容听懂了,可问题太快,没听懂	( )
11	不熟悉材料所谈的内容	( )
12	对所听的内容不感兴趣	( )
13	无法集中注意力	( )
14	其他	( )

这个清单可以看作是表一中“听后自我评估”的细节表。具体做法是,在完成听力任务之后,给学生展示听力文本,让他们比较自己听到的和实际内容是否相符,如果发现有理解错误,则进一步分析阻碍理解的具体原因。要求学生先填表,再口头报告。听力理解障碍清单条目基本涵盖了能引起听力障碍的各种因素,目的在于指导学生了解自己的听力过程和理解障碍,并反思他们使用的听力策略。

由于学生是在刚完成听力任务时进行这个反思训练的,对思维过程还记忆犹新,可以基本客观地描述自己的问题和使用策略。这个清单填写起来比较费时间,在开始时,我们只要求学生针对一个听不懂或者误解的问题进行分析,待使用熟练之后,可以分析更多的问题。

在表 2 列举的听力障碍中,学生选择的影响理解的主要障碍有 5 个,我们跟学生一起分析以上障碍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对策,以便他们能够接纳自己

汉语水平有待提高的事实,不要因此而沮丧和焦虑。另一方面,运用恰当的策略跨越障碍。我们把与学生分析讨论的结果总结为表3。

表3　听力理解障碍及原因分析

主要理解障碍	原因分析	教学建议	学习策略建议
1. 记不住,很快忘掉听到的内容(22%)	来不及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没有时间对短期记忆进行分析和去粗取精,保留有价值的信息。	在听前提出针对课文内容的问题,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听,这样有助于记住听到的内容。	认识到这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普遍的问题,在达到自动化地处理听到的内容以前,建议用记住关键词和联想的方法尽量记住已经理解的内容。
2. 理解词汇,但不明白句子的意思(17%)	对句法不熟悉,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者过于关注词汇的意思,而忽视或没有时间考虑整个句子的意思。	对语言结构进行一定的讲解和举例。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提示学生不必过于关注词汇,理解句子、语段、语篇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尽量熟悉汉语的句法结构,利用标题、问题等展开联想、预测,并在听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预测。
3. 不能认出已知词汇(16%)	没有把词语的音和形联系起来,对词语的"认识"仅限于书面层次,没有达到自动化的程度。自己的发音可能不准,听音时不能对号入座。	留意学生的发音,在一时难以彻底纠正发音的情况下,增加听音、辨音的练习。	大声朗读新学的词汇,自己听到自己的发音,也可以起到在大脑中强化音义结合的作用。
4. 考虑意义时丢失下文(13%)	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听到的内容,在努力理解的同时,下面的信息接踵而至,以致没有精力理解,造成充耳不闻,恶性循环。	提醒学生遭遇障碍时不要纠结于某个词语或句子的理解,听不懂时,把注意力转到下面的内容。	留意实词和重复的词语,尝试抓住关键词,提醒自己放弃不理解的内容。
5. 语速太快(10%)	初学者在收听第二语言时,常常会感到语速过快。	不宜因此放慢速度,可以用同样的速度多放几遍录音,教师也可以示范朗读课文的内容,让学生观察教师的口型。	认识到这是初学者普遍的听力问题,接纳自己汉语水平有待提高的现实,给自己一段时间,适应一般中国人的讲话语速。

(二)示范引导和讨论交流

灌输的知识不易被真正掌握,身体力行的示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自觉运用元认知策略,并让学生体会到这样做的意义,从而促使学生自己去实践。

首先,老师要有预评估的能力,能预见学生的理解障碍,一步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听力理解的过程。比如课文中有一个句子"很快,等待修表的士兵们便在钟表店门前排起了长龙"。"长龙"是学生没有学过的词语,练习中要求学生填空。老师可以用一连串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括号里的词的发音是什么?你认为是哪两个字?为什么这么想?这个词有什么意思?

其次,给学生示范如何监控自己的听力过程。建议运用有助于学生关注自己听力过程的练习形式,比如完型填空。在听录音以前,以完型填空的形式给学生提供部分信息,空白处是关键词或者重要数字,甚至一个句子。空白部分让学生先行思考,或者小组讨论。这样在收听时,可以集中注意力,预测他们将要听到的词句。另一种方法是在听以前告诉学生,他们将要听到一组数字,比如8万件、300多种、20%等,要求他们听一遍后说出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这样训练有助于学生掌握预测、计划的元认知策略,同时可以降低理解的难度。

再次,完成听力任务之后的评价,同样是元认知策略的重要内容。在任务完成后,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他们所使用策略的适切性和影响理解的因素。同时,要求他们分享自己用的听力策略和他们的看法。比如,是什么帮助了你理解?听关键词是否有帮助?哪些暗示帮助了你,是怎么帮的?如果你不是每个词都听懂,是怎么理解这段内容的?第二遍听录音是如何帮助你的?对于这个任务,你最喜欢什么部分?你认为下次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四、结论与建议

结束实验研究之后,我们对两个班进行了基于内容的测试。包括40%课上学过的内容和60%课外内容(听力相对其他课型而言,在考试上具有特殊性,不能完全考察已经学过的内容,也不能全部考察新的听力材料。故分为课内和课外两部分。)考试形式包括听句子选择正确答案、听对话和短文判断正误、选择正确答案、简单回答问题、填表等。主要考察学生对对话和短文的主旨及细节的理解能力、猜词能力、推测能力等。结果,实验组平均成绩为80.65,对照组平均成绩为77.19,实验组比对照组平均高3.46分。经SSPS13.0版统计分析件对上

述两组数据进行 t 检验,结果支持两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

为进一步验证教学效果,我们与实验组学生进行了座谈,大部分同学认可这种元认知策略的培训方式,并认为自己会不断实践这一策略。由于老师对他们每次听力课所填写的表二进行了分析整理,虽然数据还很有限,但也能够指出学生听力理解的部分障碍,学生对此感到惊喜;同时认为,如果没有这样"掘地三尺"的反思和评估自己的听力理解障碍,也就是使用元认知策略,他们不会这么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听力困难,也难以判断使用的策略正确与否,也就不会有高效率的学习。

根据此次研究结论,我们建议开设专门的学习策略讲座。在现行的课程设置中,只有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课,并没有语言学习策略的课程。实际上,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在课堂上也会传授一些策略,但基本上是随意的、点拨式的,缺乏系统性。我们认为,开设学习策略的讲座,对学生进行策略培训,并在课堂活动的设计和实践中践行和示范,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宝成 ,刘华. 听力测试研究综述[J]. 中国英语教育,2004(4).

[2]Flavell J H. Metacognitive aspects of problem solving. In l. B. Resnick (Ed.)[M].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Erlbaum, Hillsdale, NJ, 1976.

[3]Goh C, Taib Y. Metacognitive instruction in listening for young learners[J]. ELT Journal, 2006. Wenden, A.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and language learn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515 - 537.

[4]Vandergrift L. Facilitating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 acquiring successful strategies[J]. ELT Journal, 1999(10).

[5]张本楠. 中文听力教学导论[M].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6]狄蓉. 初中级留学生汉语听力理解中的元认知策略[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7]白琼烨 . 元认知及其策略与留学生汉语听力之间的相关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2007.

[8]陈东芳,孔雪晴. 中亚留学生汉语听力元认知策略论析:以新疆师范大学中亚留学生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5).

[9]Vandergrift L, Goh C, Mareschal C, etal. The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Listening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Language Learning 2006:431 - 462.

[10]Goh C.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er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roblems[J]. System, 2000(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ing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U Yo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in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listening metacognitive strategy in Chinese. By using metacognitive questionnaire, listening obstacles check list and organizing students to discuss th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for one semes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outcomes and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y shows that listening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ing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metacognitive;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strategy training

论特殊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

谭笑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郑州 450044)

摘 要: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特殊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其他教育体系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特殊教育的实施,对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事业、合理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社会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21
中图分类号:G7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109-05

2011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特殊教育作为八大教育任务之一提出,指出要"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并要求"完善特殊教育体系",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用一个专节,强调加强特殊教育的重要意义。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特殊教育政策的延续性,更彰显了党与国家对特殊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可以说,特殊教育事业已经纳入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党和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特殊教育事业,是因为特殊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说明我国特殊教育既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积极、有效的支持作用。

一、特殊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加强特殊教育事业,促进残疾人健康发展,充分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是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的核心价值,也是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特殊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是指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人群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因特殊人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特殊教育也随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对狭义特殊人群进行的教育就是狭义的特殊教育,亦称"残障教育""缺陷教育""治疗教育",指对有生理或心理发展有缺陷人群的教育。这里所提到的特殊教育主要是指针对大众理解意义上的狭义特殊教育,即对生理或心理发展有缺陷儿童进行的教育,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1]。特殊教育的发展对我国8500万残疾人达到心理健康、适应社会、方便就业、政治坚定基本人文要求,进而促进他们发展、参与、创造、奉献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强大政治后盾的。

(二)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就是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

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DJH-341)
作者简介:谭笑风(1972—),男,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会力量,在社会各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功能在于它着重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建设强调的是全社会的共同性,实现的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的是全社会的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2]马克思在"三形态理论"的阐释中提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是第三阶段,形成了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即'自由人的联合体'。"[3]我们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实现首先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首先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保障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抓好残疾人的教育事业即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对残疾人更是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党和国家近五年来的发展理念就是: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教育、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建设包括六大内容,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居民保障体系、医疗公共卫生体制、社会管理等。

二、"以人为本"的特殊教育新价值认识

(一)特殊教育对教育事业建设的价值认识

1. 价值认识。当前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最终还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而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要立足于教育,教育是实现与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专业技能与素质的主要方式。如果一个人接受过高水平的教育,并形成一定的技能与素养,个人和国家都会因此获益。开展特殊教育是使残疾人真正实现受教育权的最有效途径,也是特殊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当前,我国实施的特殊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以残疾人为教育对象,主要包括盲、聋、哑、肢残等群体。他们在社会上都属于弱势群体,在受教育机会以及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远远落后于正常人群,在教育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对于国家或社会来说,只有人人都能平等享有受教育权,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4]因此,可以通过残疾人在受教育方面能否享有平等的权利,来检验该国家社会文明程度。正因为此,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特殊教育的发展,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残疾人事业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安排。而实现残疾人的公民权、解放其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坚持发展特殊教育,通过特殊教育教学活动释放特殊人群的能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2. 做好特殊教育事业的方法和途径。《残疾人教育条例》(2017 年 5 月 1 日修订)指出:残疾人教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做好特殊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是本,开展融合教育是方。但是,特殊教育是一项综合性事业,需要众多的要素参与其中。一是提高认识,补齐特殊教育这个短板。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特殊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体系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其发展状况决定着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将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好、将特殊人群教育好,才能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和谐教育",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五位一体"社会,贡献特殊教育事业应有的力量。二是加强学科融合,共创特教教材教法。因其对象的特殊性,教学中除了需要有必要的教学安排,提供合适的教材教法,对其进行教育时还要涉及到心理学与教育学等众多学科。为了促使特殊群体能更好地进行学习,这些学科也需要同步发展,对这些学科的教育也要及时更新。因此,要有学科融合、部门合作的思想观念,建立专业服务平台和跨部门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学科联动,相得益彰,也推动了教育的各个领域的共同发展。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素质。近年来,国家在符合条件的县(区)建设了一批特殊教育学校,然而特殊教育师资专门人才尤其是研究生以上人才却远远供应不足,而且多供职于一、二线城市特殊教育机构。因此,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各大师范院校要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专门人才培养;各综合性、专业性院校要加强特殊教育专业课普及,作为选修课记入学分;要加强在岗特殊教育师资的培训学习,提高他们的特殊教育综合素质。四是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普教融合。开展融合教育是促进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理、自强,实现公平、公正的有效途径。有关部门要出台相应政策,促进普通学校、有关专业面向残疾人

开放;加大力度扶持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等6所高校开展融合教育实质性开展,并做好融合教育的相应性研究,为全国推广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特殊教育对于构建“合理就业体系”的价值认识

1.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的健康发展,社会矛盾的减少,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使人人都有合适的工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应该在就业体系建设时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残疾人8500多万,很明显,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大军。发展特殊教育,通过适当的教育和职业技术训练,促使他们能够顺利就业,这也是提高残疾人士自信心和参与社会的重要条件。但在实际生活中,特殊人群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据有关特殊群体就业调查的统计信息表明,有56.8%的特殊群体认为没有工作使他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26.7%的人认为没有工作使他们压力较大,这些压力如果不得到合适的释放,随时可变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些特殊群体中,绝大多数是有能力从事社会相应工作的,经过特殊的教育和培养,将这些珍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开发,使之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5]残疾程度较轻者同普通人一样可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可以从事相关社会劳动;中度残疾人群通过教育也能够照顾和养活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通过自身努力与特殊教育来减轻自身的痛苦,并减轻家庭、社会的负担,可以解决当前社会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现象,也可以增加特殊儿童父母和照顾者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增加人力资源总量,提高就业人数和就业比例。

2.从特殊教育角度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方法和途径。一是加强法律法规保障。进一步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的法律法规并确保落实之,是残疾人有效就业的基础。同时,残疾人再就业需求、用工矛盾、基本保障等方面也用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二是要做好职业规划。国家在保证残疾人人尽其学的基础上,要做好对残疾人进行分层施教、分层管理、分层服务。在分层的基础上,特殊教育就要及时介入残疾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充分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有针对性设计职业定位和方向。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残疾人就业的生命力。三是要保障接受良好教育和职业培训。国家和各教育机构要充分保障残疾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各教育机构要充分保障提升残疾人的就业技能,为就业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激励非特殊人士努力向上,不断提高自我能力,带来就业人群质量和数量的双重增长。

(三)特殊教育对于促进“收入分配”公正化的价值认识

1.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收入分配是体现个人价值的一个标准,是社会对个人的肯定的表现形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要做到分配机制的合理与公正,使社会各阶层都能通过劳动获得相应的报酬。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强调社会财富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时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并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分配,而特殊教育可以对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调整与平衡作用。

收入分配差距在各个社会都存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小差距,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英国杰出经济学家米德说:“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有利于公平的。”[6]在我国,特殊教育基本属于公立办学性质,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作用。其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通过对国家的适龄残疾儿童实行免费教育,使他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教育来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从而缩小他们与正常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义务教育既可以实现全体学龄期儿童的入学问题,又可以增加其获得收入的能力。特殊教育需要较多的投入,包括师资、教学设施、康复设备等,因此上学成本较高。同时,大多数残疾儿童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经济困难的问题,如果国家不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大多数残疾儿童家庭对孩子接受教育将会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更无法保障他们学得一技之长,进而拖累家庭。而免费义务特殊教育既可以让这些孩子有学可上,又间接缩小了家庭间收入分配差距。而高等特殊教育的开办则为这些特殊群体提供更高的职业技术培训,可以使其获得更为专业的技能。进入社会后,这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较高的收入,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2.特殊教育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方法和途径。一是给予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以更大的资金支持。目前,普通高等院校举办特殊教育的院校据不完全统计有23所,其中有四分之三的高校系进

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而诞生的,每年有1000多名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但是,学费对残疾人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目前仅有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省、市对本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由政府基于补贴,大多数地区学生仍需缴费入学。国家应该出台政策,"统一要求,不同标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承担一半费用负责学生的学费。二是给予各层次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以特岗津贴。目前,全国各地区出现特岗津贴发放层次不统一,发放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影响了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基本生活需求,应该统一标准,严格实施。三是对于残疾人创新创业,国家、各级地方政府除在税务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以外,也要引导创新创业,提供平台帮助创新创业,切实发挥自强模范的作用,引领创新创业。在这一点上特殊教育机构也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特殊教育对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认识

1.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柱,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党中央历来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权益"。

特殊儿童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特殊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城乡居民保障体系主体的不足,是城乡居民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城乡居民保障体系的主体和对象是全体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正是特殊教育的存在和不断发展,让人们意识到社会中这一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并督促党和国家不断努力建设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特殊教育能为儿童实现生活自理和家庭成员得到特殊指导提供帮助,间接为保障体系提供补充。另外,特殊儿童在学校接受特殊教育,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障体系",在学校生活,可以避免社会上的危险和他人的排斥,并培养特殊儿童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为儿童生活提供一层保护。特殊教育的发展为城乡居民保障体系的建设具有评价和反馈意义,从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部分地可以看出保障体系建设的水平、实施的效果以及有待改进的方面。但是,总的来看,融合教育明显不够普及,普校接纳残疾人入学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残疾人接受义务教育入学率远低于普通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更不容乐观。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底,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为90%。实际上,多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义务教育普通适龄儿童入学率就保持在99%以上。

2.特殊教育对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法和途径。一是加强立法和执法,大力推进残疾人受教育权,确保教育入学公平;二是加强教材教法改革,优化教育设施、教育环境,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保证教育过程公平;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确保残疾人教育管理公平。

(五)特殊教育对优化医疗卫生体制的价值认识

1.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公共医疗卫生涉及到所有人的生命健康与各个家庭的幸福,社会对此非常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提出要为群众提供便利、安全、有效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仅仅靠医疗卫生体系提供服务是不足的,关键还是要通过个人及社会的共同努力,减轻对社会医疗卫生的压力。特殊教育的对象是残疾人群,对于生理或心理存在缺陷的特殊人群,由于其特殊性,对公共卫生体制的依赖性更强。就目前来说,虽然对特殊儿童的评估依赖于医院的诊断,影响较大开展比较好的康复形式主要是医疗康复,康复地点主要是医院和康复机构,康复人员也主要是物理治疗师等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员。但特殊教育同样可以为医疗卫生的发展提供支出。首先是特殊教育培养的人才可以为医疗的发展提供学科、人才等的补充和支持,有效地弥补了医疗康复的不足,促使医疗卫生体制更完善。其次是特殊教育承担了一部分特殊儿童的康复工作,能为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减少压力。所以说,特殊教育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医疗公共卫生体制的建设。

2.特殊教育对优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方法和途径。一是特殊教育机构作为特殊群体的教学、研究机构应该担负残疾人心理、伦理、生理等方面的研究、帮扶等责任;二是随着国家"医教结合"试点工作的推进,特殊教育机构要争取做到教书育人与治疗育人相结合,两手抓,教学、医疗相长,学习、康复并进;政府部门、社会医疗相关机构在促进"医教结合"方面也要发挥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宣传引导、专业辅助等作用,健全特殊教育背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

(六)特殊教育对促进社会治理的价值认识

1.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

的基础和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可能还被掩盖着,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绝对不能忽视。因此,应通过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建设来解决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社会治理涉及面广,需要考虑多方面情况,尤其是要考虑(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我国的残疾人群规模较大,根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占人口总量的6.21%,达到8500万人,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他们生存和发展状况,应当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并给予积极应对。但是,该群体中文盲率高达43.29%,而普通群体的文盲率只有6.72%,差距十分巨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特殊政策,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其掌握相应的技能,学习社会规则和法律,顺利融入到主流社会,减少社会治理成本,方便社会治理实施。

2. 特殊教育对有效社会治理的方法途径。一是要在特殊教育机构(融合教育机构)对残疾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曲直,健全健康人格,建立人生导向。二是要积极开展法制教育。要让残疾学生知法、守法,既要懂得、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知道那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做到不触犯法律,做合法公民。三是特殊教育机构以及从业人员也要积极主动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其最核心的内容,是保障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平等·参与·共享"的最直接体现。通过特殊教育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共存,形成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平等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团结,有利于社会的治理,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建设。因此,要重视特殊教育,充分发挥特殊教育在社会建设中的减震与润滑作用,最大限度地将特殊群体融入社会建设中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共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参考文献:

[1]朴永馨,顾定倩.特殊教育辞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42.

[2]杨毅,高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J].陇东学院学报,2009(11):78-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李欢,肖非.论特殊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2009(7):16.

[5]张继发.关于特殊教育经济价值的思考[J].现代特殊教育,2006(4):11-13.

[6]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2:78.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o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N Xiaofeng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provides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talent guarante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pecial educ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has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ystem, rational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securit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ocial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pecial education;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onstruction

基于大数据的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探析

吴宏锣,郭学军
(南阳理工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

摘 要:从大数据时代对统计人才的需求变化及统计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出发,以我校应用统计学的教学与改革为例,分析了目前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用统计学专业应遵循"OBE"的人才培养理念,以社会对大数据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数据分析能力人才培养为核心,优化课程设置,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大数据;应用统计学;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2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114-05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大数据革命正在席卷全世界。伴随着大数据越来越渗入人们的生活,利用先进技术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实现了数据信息的增值,颠覆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应用统计学由于自身专业的属性,不可避免被大数据时代冲击和影响。传统的应用统计学面对大数据有些力不从心,我们必须要抓住大数据时代的良好机遇,迎接挑战,认真研究,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积极改进应用统计学专业建设方案,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

一、大数据与应用统计学

(一)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他通过收集、整理、分析等手段,采用专业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技术挖掘数据信息,来推断研究对象的本质,预测其未来可能情况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统计学使用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应用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他将统计学的理论和知识与实际学科相结合,收集所获取的系统性数据研究和分析。主要利用概率论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归纳、总结,进而推断和预测,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由于应用统计学在各个专业领域具有巨大应用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得以应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理工类、管理类等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大都设置了应用统计学课程。

(二)大数据时代

什么叫数据?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记载的物理符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表示客观事物的未经加工的的原始素材。什么叫大数据? 大数据指拥有5V特点(IBM提出):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低价值密度)、Veracity(真实性)的数据,无法靠人工和常规软件处理的数据集合。我们现在进入了依靠数据说话的时代,数据的处理不再仅仅是决策,而且还有预测,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大数据时代可以处理所有数据,将改变我们的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在教学上要求我们将数据融入课堂,使教学内容标准化、教学手段多样化、教学反馈及时化,形成既注重教学体验又以教学结果为导向的教学体系。

(三)大数据时代的应用统计学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应用统计学的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应用统计学从所研究的领域或专门问题出

收稿日期:2018-06-25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项目(152300410180);南阳理工学院教改项目(NIT2017JY-018;NIT2017JY-126;HXKC2016092;HXKC2016089)
作者简介:吴宏锣(1972—),女,河南淅川人,南阳理工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数学。

发,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采用适当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方法,以解决所研究的问题。大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它的理论体系还不算太完善。大数据依托于云计算技术真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整体把握数据信息表象特征,进行准确预测。

大数据与应用统计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大数据分析更适合对海量的数据对象,应用统计学需要数据的数量不一定很多,需要的是对关键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得出比较精确的答案。大数据的研究一定离不开传统统计学的知识,大数据分析时经常运用统计学分类整合、数据整理手段,使用统计学的数学模型,但两者在使用模式、数据形式和运用方式上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处理模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应用统计学,使得我们必须要发展和创新应用统计学。

二、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南阳理工学院原来只有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为适应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的增长,2012 年设置应用统计学专业。应用统计学专业建设初期主要沿袭了传统的应用统计学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也采纳了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一些好的成熟的内容和做法,也曾对人才培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和高校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就显得有些落伍,有些滞后,有些力不从心。

(一)专业定位宽,针对性不强

原有的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扎实的数学与统计学基本理论,熟练掌握统计学方法和数据采集、建模与分析处理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专业定位覆盖笼统、模糊,实用性和针对性不强,培养的人才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精,远远跟不上大数据时代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知识大爆炸,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观念已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转变为“一招鲜吃遍天”,作为地方性本科院校对自己的专业定位针对性不够,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就业的要求。对我校最近几年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表明,市场对大数据人才需求迫切,而应用统计学专业毕业生对大数据技术只是略知一二,对其应用还存在有不小的差距。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一是数学基本理论知识模块的比重较大,如拓扑学等理论性较强的数学基础课程偏多,挤压了统计模块。二是统计知识模块基本理论知识比重较大,实践比重较小。三是计算机语言及编程课程偏少。四是课程体系中涉及到大数据的人才培养内容较少,仅在专业方向模块上开设了 2 学时“数据挖掘”课程。总体上来说,原有的培养方案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对实践和应用的重视程度不够,技能培养体现不足。再加上大数据这一新的挑战,使得学生利用软件处理实际问题时显得束手无措,手忙脚乱。由此可见,原有的培养方案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培养学生的大数据理念,提高学生的大数据分析能力是极为不利的。

(三)大数据对应用统计学专业冲击

随着高新科技的应用,海量数据不断产生,大数据时代来临。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量的增多,更呈现了数据结构的多样性和数据关系的复杂性。大数据的处理往往仅告知信息,不解释信息,要想解释信息,挖掘价值,必须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这就像我们开汽车,需要使用的是“汽油”,而大数据仅是“原油”,不能被直接使用,这就需要提炼。提炼的过程,就是数据分析的过程,使用工具主要是统计学,使用的技术被称为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时代,尽管统计学依然是数据分析的灵魂工具,但大数据元素的融入,使得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更富有挑战意义。

(四)学校整体改革现状

南阳理工学院是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全国起步较早进行应用型教学改革与探讨的高校之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校走产学研用一体化和开放办学之路,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先后获批国家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工程项目学校 100 所之一,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试点学校,河南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院校 10 所之一,河南省整体转型发展试点学校,成功入选 2018 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近年来,学校加大了教学改革力度,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几次大的调整,极大地助推了学校的发展。应用统计学专业借助这些创建活动,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丰富了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然而,转型发展是地方院校应用统计学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积极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创新融合大数据背景下的应用统计学专业。

(五)教学理念落后,教学创新不足

地方高校大多用数学专业教师担任统计学教师,这一类教师学的基础理论东西较多,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维模式,在教学上也容易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一些教师惯于从“教”的角度看待“学”,一切教师做主,“我怎么教,他怎么学”,忘记了学生可以

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实像情感、创造这些东西是无法教的,但可以学来。在缺乏有力的措施和制度约束下,在没有积极的政策鼓励下,缺少“推”和“拉”的两个因素促进,很难有教学改革的动力。素质教育和非素质教育的不同,表现在教学方法的不同,实际上在深处是教学理念的不同,而教学方法的不同源于教师起初的想法,也就是出发点的不同,由于理论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些教育工作者不能洞见司徒见惯的教学行为中存在教学理念的差异,因此在自己的日常教学中缺少教学创新改革的源动力。

三、大数据时代应用统计学人才培养改革

互联网行业处于一个新的飞速发展时期,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同步急剧增长,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确定统计分析为主线的培养目标

1. OBE 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亦称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新的培养方案遵循 OBE 的人才培养理念,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基本要求,以职业标准为参照,着力培养学生面向职业岗位的能力和素养,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即遵循如图 1 所示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原则,构建一个“由上向下设计,由下向上支撑”的人才培养过程,重构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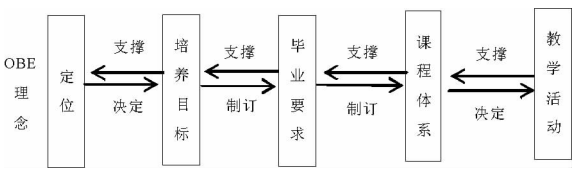

图 1　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原则

2. 准确目标定位

应用统计学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数学与统计学基础,具备一些大数据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具备应用计算机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并能在统计、金融、电信、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从事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并依此做出研究、评估和预测的高素质的统计应用人才。目标强调了大数据基本素养的培育,强调了计算机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的培养。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熟练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了解或掌握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的软件、工具和方法,初步具备数据分析师的基本素养。

(二)紧扣就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

1. 调查就业情况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传统统计学的一次革命。依据调查大数据时代有关专业的就业情况,并进行广泛的调研和论证,然后融入大数据内容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培养过程。大数据主要的三大就业方向:大数据系统研发类人才、大数据应用开发类人才和大数据分析类人才。对于应用统计学专业来说,大数据分析类是统计专业的首选,培养数据分析人才是应用统计学专业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统计,而市场对大数据人才需求巨大,未来中国基础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到 1400 万。

2. 构建课程体系

根据确立的以统计分析能力培养为主线,按照知识、能力、素质、改革和创新协调发展的思路设计课程体系。特别是参考不同级别数据分析师的知识、能力要求,搭建由通识平台、专业平台、专业方向模块、素质拓展模块四部分组成如图 2 所示的课程体系,并对平台与模块课程的重新构建及优化,以此来支持毕业生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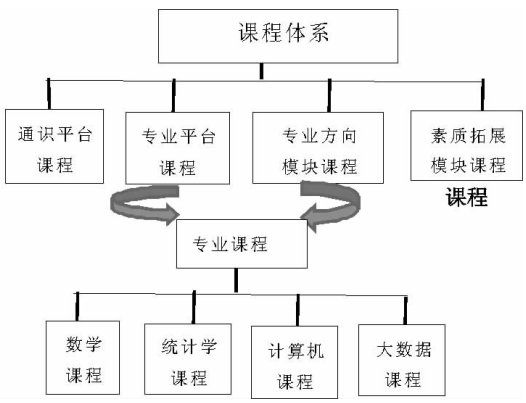

图 2　课程专业体系构建

(三)优化课程结构,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培养

1. 整体课程结构优化

培养应用型统计学专业人才,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由表 1 知,实践环节的比例由原来的 29.7.%,提高到了 35.3%。淡化了部分课程的理论深度,强化了一些课程的实验、实践部分,如“描述统计学”“抽样调查”有 50% 学时是实验和实践;加大了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比重,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比重占实验课程的 60%;“统计预测与决策”“数学建模”等课程均加强了学生应用能力、操作能力的培养;增加了统计软件实训、统计建模实训;加强了大学生学科竞赛等素质拓展部分的内容。强化了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践环节设计,构建了分阶

段、多层次,校内外、课内外相结合的实践培养体系,以实现实践教学全程化和学生能力训练的全程化。

表1 调整后课程结构和学分比例

课程分类	通识平台课程	专业平台课程	专业方向模块课程	素质拓展模块课程	合计	实践环节
	必修	必修	选修	选修		
占总学分比例	27.1%	37.6%	29.7%	5.6%	100%	35.3%

注:实践环节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专业综合训练、毕业设计(论文)等。

2. 改革统计学课程的内容

目前应用统计学专业课程在数据探索与处理方面,主要是讲授数据的分布。但是,大数据特点一般不满足正态分布规律,有时也不需要对数据分布进行分布检验。传统的统计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科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大数据能力培养的需求,对一部分专业课程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在非参数统计课程中引入多元非参数统计方科法、非参数回的归模型和半参数回归模型及其代码实现;在回归分析析课程中引入回归树、boosting 回译;在多元统计分析课程中引入高维统计分析方法及其实现等。针对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管理、分析与挖掘的技能与方法类课程需要增加,尤其需要增加一些有关大数据的统计实践类课程。

3. 重视学生素质拓展

就业对毕业生素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课程设置要从整体结构上更优化,更重视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把学生的拓展模块课程作为单独的模块列出,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为基本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培养过程,着力培养学生面向职业岗位实际的实践能力和工程素养,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课程设置比重见表1所示。同时,为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如考研学生的需求,学校可以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在专业选修模块中增加数学分析专题研究、高等代数专题研究等,适应学生对课程的素质培养要求。

(四)对专业课程进行必要的优化

1. 增设大数据的基础理论课

专业课程设置主要由数学、统计学、计算机软件、大数据四大支柱搭建而成,调整后各模块比例见表2所示,与原培养方案相比,专业课程设置上更加优化。在专业选模块中增加“大数据技术应用”,目的让学生掌握大数据相关的基础知识,掌握大数据技术基础工具的应用。增加“数据分析与挖掘”学时的比重,以使学生熟练掌握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算法,并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算法的特点和应用;增加“数据可视化技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数据可视化处理能力。

表2 专业模块比例

类别	数学	统计学	计算机	大数据
占总学分比例(原)	41.7%	43.9%	11.3%	3.1%
占总学分比例(改进后)	31.7%	35.2%	19.2%	13.9%

2. 适当减少基础数学理论课

为了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要适当减少基础数学理论课程学时。将专业平台模块中的“数学分析”课程学时由原来的272学时降低到240学时,并加大了数学分析实验学时,弱化理论难度,强化计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合并为一门课程,由原来的148学时降为120学时,把两课中交融、重叠的部分重新优化组合,精简一些内容,在保证两课主体内容不被削弱的前提下,增加了实验学时的比例,保证学生学习和掌握更先进、更现代、更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减少“实变函数”的学时,选修模块中的“微分几何”“拓扑学”等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修。

3. 增加配套的计算机软件课程

在通识平台课程模块中设有“大学计算机基础”,除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学外,以加强计算机基础软件统计软件 EXCEL 方面的训练,为数据分析课程打下技术基础。在专业平台模块中,设有“数据库原理与应用”,以使学生掌握数据库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掌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应用,为后续的数据挖掘等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增设“C 语言程序设计”,以巩固学生程序编程基础;增加“C ++ 程序设计”,以强化学生的设计能力;增设“JAVA 程序设计”,为大数据的数据挖据奠定语言基础。总之,通这些课程的设置,强化计算机技能的培养,并为各门课程的学习提供计算机分析与计算工具,尤其是为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打下基础。

(五)深化教学创新改革

1. 重视教学方法改革

大数据对统计学的挑战,要求统计学教师改变填鸭式、陈旧式、厌教式的教学模式。教师不仅要加强专业学习,还要及时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提供贴近实际生活的问题的教学案例要给学生;要改单向灌输的课堂模式为启发式、引导探究式、互动式等课堂模式,鼓励并带领学生参与方案设计、学科竞赛、教师的科研等,配合学生采用创新形式参与调查、调研、统计分析;要充分使用教学新媒体,发挥各媒体在统计教学中的作用,形象生动地开展多样的教学

形式,为教师提高授课技巧创造有利条件,为学生提升表达、协作、创新的综合能力提供有力保障。要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在未来工作中的逻辑思维和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为实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数据处理方法创新的有效融合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系统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做好基本知识技能实验,也就是理论教学的课内实验,这是专业基础的实践教学;做好综合性实践教学,对于采集的综合性数据,使用数据挖掘、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这是工具应用的实践;做好探索性实践教学工作,创造设计社会调查形式,建立第三方毕业实习基地,多类人员多种形式指导毕业论文完成。要加强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完善合作制度建设,保障三方合作的正常运行,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技能,提前接触社会和生活,快速适应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促进“知行合一”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3. 改革考试评价方式

应用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统计学科考试应将基本理论、统计实践、统计思想纳入考试体系中,课程学习一般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个内容,要求学生具备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课程考试改革应按照“综合考试”的思路设计,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列入考试评分标准中,并遵循多元化、动态性、过程性原则,使考试模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考试内容采用基础知识与综合实验能力创新能力测试相结合的形式,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运用能力考查;考试形式用卷面形式和其他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是讨论、上机形式、课程论文等,也可以是方案设计、数据挖掘、统计软件应用等。

四、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生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倒逼着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应用统计学专业如何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与探索。文章以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例,谈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和认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深感这方面的探讨还任重而道远。如何把大数据与统计学课程有机的结合优化课程设置,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来强化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统计学专业培养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客观要求,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改进应用统计学人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面对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参考文献:

[1]张维群.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专家研讨会纪要[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2):112.

[2]潘保国. 大数据时代地方高校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 高教学刊,2016(19):46-47.

[3]薛艳.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J]. 教育教学论坛,2015(4):110-111.

[4]黄小艳. 大数据环境下统计学实践教学改革探讨[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2): 247-249.

[5]张蕊. 大数据背景下应用统计学类专业课程体系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8(2): 406-409.

[6]朝乐门,邢春晓,王雨晴.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特色课程研究[J]. 计算机科学,2018(3):3-8.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of Applied Statistics based on Big Data

WU Honge, GUO Xueju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Henan 473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statistical talent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statistical education. Taking the teaching and reform of applied statistics in our schoo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statistics professionals. The applied statistics major should follow the “OBE” talent training concept, take the society a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mand for big data talents, focus on the training of data analysis talents,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improve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and innovate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Key words: big data; applied statistics;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revolution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国家示范校创建经验

梁 才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郑州 450000)

摘 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专业、课程和教材建设;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职业人才培养模式。结合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创建国家中职改革和发展示范校所进行的教学改革的做法,为中职发展总结经验,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探索可行之路。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国家示范校创建;教学改革;现代职业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2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119-06

一、教学改革的背景

(一)当前的课程改革趋势

以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三位一体为主要内容的新课程改革方兴未艾,在全国中小学中开展得如火如荼。职业教育有它的特殊性,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要彻底打破基础教育模式的束缚,在专业课领域和学生的实习实践方面进行比较有针对性地改革,对于文化课、特色课或素质课等方面的改革也要同步跟进。由于职业教育课程的复杂性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学校进行新课程改革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应当根据职业学校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建立适合学校特点的校本课程体系,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

(二)学校发展的需要

由于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源于基础教育,如果要彰显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就必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改革是职业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课程改革应该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建立适合学校实际的校本课程体系是职业学校"以改革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是财政部、人社部、教育部等三部委命名的第二批国家中职改革和发展示范校,河南省品牌学校。借助示范校创建,对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等进行了改革,探索出了各学科教学模式,构建了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形成了各学科课程体系和评价模式。

(三)统编中职教材本身存在的问题

统编的中职教材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区域性,专业的复杂性以及学生的特殊性,它仍旧无法适合所有学校和所有专业的学生。比如文化课,就难免存在缺乏针对性和专业特色不明显的问题,有的课程,如英语、数学等,对一部分学生来说,难度较大,学起来相当吃力,而对一些专业的学生,学习的必要性不大。专业课则存在着内容陈旧的现象,如汽车专业、机电数控专业、计算机专业的教材,由于现代技术发展迅速,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而统编教材在这方面往往表现滞后。这势必影响到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四)中职学生的特殊性

1. 学习启动原理。中职学生是中招考试的失败者,自信心缺乏,学习动机不足,只有运用赏识教育、成功教育的理念,同时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启动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收稿日期:2018-07-16

作者简介:梁才(1970—),男,河南漯河人,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2. 能量潜在原理。中职学生在其它方面如文艺、体育、计算机等，表现出某些优势和动机。他们有很大的潜能，且通过恰当的引导还可以转化成学习动力。

3. 活动学习原理。中职学生个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活动性，他们的优势或特长往往是在活动中形成的。因此，活动设计是职业学校教学的一个基本策略，活动性教学设计是否适合学生，将决定着职业学校教学的成败。

4. 自我调节原理。职业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中职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通过积极的自我体验和外部评价，改变他们过去失败者的自我意识，形成积极的成功者的自我意识，是完全可能的。

（五）职业教育的任务

中等职业学校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培养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中初级应用型人才。中职毕业生不仅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具有交往能力、学习能力、承受能力以及在职业中发展的能力等。中职学生不仅要成为创造财富的人，还要成为创造快乐和幸福、把握快乐和幸福、享受快乐和幸福的人，就要具备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因此，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都要同步推进。课程建设不仅注重专业理论和实习实训，还要注重文化课和专业课建设，人文素养校本课程开发也要同步跟进。

二、理论基础

（一）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知识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起来的。知识的建构是人在一定的情境下，面临新事物、新问题、新信息时，会根据情境中的线索，调动头脑中事先准备好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先前经验，来解释这些新信息、解答这些新问题，赋予它们意义。知识的意义总是存在于情境之中。学习总是在一定情境之下进行的，人不能超越具体的情境来获得某种知识。学习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即使学习者表面上是一个人在独自学习，但他所用的书本、电脑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积淀着人类社会的智慧和经验。学习的结果是先前经验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重新组织、转换、改造[1]。

通过建构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知识是主体的经验、解释和假设；建构主义学习观告诉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通过人的主体感知、思维加工，分析判断，进而生成自己的经验、解释、假设；建构主义教学观告诉我们，教学过程不是像容器一样，从一个容器传递到另外一个容器，而是学习主体主动参与、积极接受，这包括了学习主题对知识的需求。因此，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要紧紧围绕学生培养展开，立足于学生主动的生活体验和知识建构，积极创设学习情境，营造工作体验氛围，不断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实现也就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二）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是由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他认为人具有 8 种不同的智力，即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音乐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知自省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2]。不同人的 8 种智力水平各不相同。例如作家、诗人、记者、演讲家、新闻广播员的言语－语言智力，科学家、会计师、工程师和电脑程序设计者的逻辑－数理智力，摄影师、建筑师、画家、飞行员和航海家的视觉－空间智力，音乐家、指挥家、作曲家、歌唱家的音乐智力，运动员、舞蹈家、外科医生、表演家的身体－动觉智力，政治家、公关人员、成功的教师、社会工作者的人际交往智力，心理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自我认识智力，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园艺设计家的自然观察智力，相对于他们的其它智力而言，就要发达一些。加德纳还指出，每一种智力都包含若干种亚智力。

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首先，教师应对教育对象个体有正确的把握和判断。因为每个学习主体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多种智力，且其内部结构各有不同，所以开发学生智力应该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智力领域，积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其次，教师应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不同的学习主体都有其独特的内部智力结构和学习方法，教师的教学策略和育人方式因人而异，注重因材施教，教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以保证学生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对国内外有关课程改革尤其是职业教育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然后在分

析学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在课程改革初期和中期，充分征求和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三）比较法

在收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认真比较了中外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情况，着重分析了国内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的实践；另外，我们也对我校学生在课程改革前后的变化情况以及我校学生与兄弟学校的学生进行了对比。

四、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文化课方面的改革

在文化课方面，主要对数学和英语进行改革。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突出实用性和趣味性。

（1）数学课改革

1. 学生要参加市里的统考或是参加省里文化水平测试，一年级数学课开三节课或四节课，基础模块全部讲完后，二年级相关的专业（数控、机电、计算机专业）可讲拓展模块，其他的专业抽出时间强化专业实践课。对于那些有学习数学意愿的同学，则有选修课为他补充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2. 教学方式上采用分层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将学生分为 A、B、C 三层。A 层的同学学习基础模块 A 组和 B 组的内容以及老师补充的与本章知识相关的知识，讲课可以采取先学后教的教学方法或者小组合作和探究式学习方法；B 层的同学学习基础模块 A 组的内容，较难的题不讲，主要采用讲授式和诱导式的教学方法；C 层的同学学习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了解一些数学方面的常识（可以是数学家的故事，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和数学相关的内容），二是补习初中和小学的数学知识，补习完以后，再讲基础模块中简单的最基本的信息。

3. 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考核方案。针对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太端正，学习兴趣不浓，学习动力不足，交作业不积极的现象，学校加强对其学习过程的管理，以此促进成绩的提升。故而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50% 到 60%，平时成绩包括上课表现、出勤率、单元测试、作业情况等，期末成绩占 40% 到 50%。

（2）英语课改革

1. 主要采用菜单式教学，细化为字词句训练、美文鉴赏、情景美剧等。实现整体进行，全面推进，重点培养，因材施教，查漏补缺。

2. 考核方式。卷面测试成绩占 70%，平常考勤、作业上交情况占 30%。缺勤达到 70% 者，可取消成绩。建立试题库，考试不及格者，次学期补考通过。

3. 开发校本教材《英语》《英语选修教材》。

（二）专业课方面的改革

（1）汽车专业

1. 根据社会调研和分析，明确本专业的工作领域（汽车机电维修、汽车维修业务接待、汽车性能检测、汽车钣金和涂装）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提炼了 7 个相应的工作任务，以此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各门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和优化了模块化的专业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体系由公共课程模块、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专门化项目课程模块和选修课课程模块组成。

2. 建设《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汽车性能检测》四门校级精品课程，参与共建共享《汽车认识》《汽车维修基础》《汽车维护》《汽车发动机维修》《汽车底盘维修》《汽车电器维修》等六门精品课程。开发了《汽车应用与维修》等一批校本课程。

3. 学生培养，主要采用方向化培养模式，包括汽车营销方向、钣金涂装方向、汽车美容方向等内容。

（2）机电专业

1. 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构建机电专业职业技能“一条主线三个平台五个去向”的课程体系。

一条主线：能力形成的实践教学活动为主线

三个平台：一是基础技能训练平台，二是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三是能力拓展平台。课程标准都已制定完毕。

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由三部分组成：

维修电工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项目课程包括：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制图、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单片机技术应用、机械设备控制技术、PLC 控制技术、维修电工技术、维修电工技术实习）；

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项目课程包括：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基础、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单片机技术应用、机械设备控制技术、PLC 控制技术、维修电工技术、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

数控加工技术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项目课程包括：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机械基础、机械设备控制技术、数控编程技术、焊接技术、焊接技术实习、数控车加工实习）。

五个去向：机电产品生产现场操作人员（岗

位)、低压供配电施工与管理、机电设备销售与售后服务技术人员(岗位)、制造类企业的机电设备维护与管理人员(岗位)、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现场技术人员(自动化生产线的维护与管理岗位)。

2. 开发校本教材《电子线路原理与实训》《维修电工实训》《单片机应用原理与实训》《PLC 应用原理与实训》。

(3)数控专业

1. 建立基于"校企一体和项目驱动"的创新型教学框架,采用"专业 + 企业""专业 + 车间"的情景教学法,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以数控加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岗位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形成校内岗位情景模拟,校外顶岗实习,全过程项目主导的"工学交替、校企循环"的人才培养模式。考核评价增加了"过程性考核"。

2. 数控专业编制了 12 门课程标准;参加国家示范性职业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精品课程数字化资源共建,并参与开发了《机械基础常识》精品课程,专业教师编写了《数控车削实训》《数控铣床操作与加工实训》两本校本教材。

3. 教学资源建设

计算机应用专业开发了基于"模拟公司教学法"系列校本教材,突出了具有工学结合特性的理实一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整体要求,编撰内容上融进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大纲、企业生产技术操作规范、职工上岗培训教材等内容,教材体例上打破原章节顺序,采用了项目、任务、岗位、活动的模块,体现了现代生产技术与综合能力培养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堂与现场相通的特点,邀请企业生产技术人员参与教材编写活动,承担了整体设计、项目书编写、审核把关和审定修改等工作任务。同时,计算机应用专业通过教学资源建设活动,聚集了一批企业参与示范校建设项目,在课程论证与开发、实训基地论证及建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专业以教材建设为纽带,稳定了一支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

4. 开发校本教材《计算机应用基础与实训》《平面设计实例》《网络工程》《广告设计与制作》《CorelDraw X4 实用教程》《计算机专业技能竞赛试题集(竞赛技能校本教材)》。

(三)建立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人文教育校本课程主要有国防教育、文学欣赏、书法、绘画、电影等七门。这里重点介绍文学欣赏课和国防教育。

(1)文学欣赏

目前,青少年的视野开阔,阅读面很宽,各种书刊、大众传媒、网络等携带的各种内容都在竞相涌入他们的视野,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据我们的观察和了解,学生平时的课外读物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而不健康的书刊也占相当比重。为了让学生走进经典,了解经典,使文学经典在他们心中扎根发芽,增强学生抵御不良东西的能力,从而占领学生的阅读阵地,开设文学欣赏课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新世纪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从业者不但要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丰富的人文素养,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关注他们的终身发展,也需要开设了文学欣赏课,以发挥语文学科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的优势。

文学欣赏课主要向学生介绍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或文学名著,其内容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类,每一大类又可分为诗词类、散文类和小说类三个中类;在阅读内容或材料的选择上,一方面要考虑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中专生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为更好的配合文学欣赏课,学校风雷文学社经常性学生进行文学作品阅读与分享,到校外进行采风等活动。组织学生积极为文学社杂志《绿野》投稿。

文学欣赏课的开设,提高了广大中职学生审美情趣,丰富了其思想内涵,激发其对文学经典的兴趣,引导他们主动阅读文学经典视野得到开阔,人文素养得到提升,从而在阅读文学经典中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不健康的书刊对他们的侵害。

(2)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是学校的德育特色,作为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郑州市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学校国防教育主题明确、制度健全、保障到位,国防教育基地作用发挥明显。设有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和国防教育办公室,制定学校国防教育工作规划、年度国防教育工作计划、学期国防教育实施方案,把国防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要点。组建了专职国防教育教员队伍,开展课题研究,编写了国防教育系列应用教材,配备了国防教育专项设施和器材以及专用的国防教育宣传资料,在国防教育特色建设上给与足够的经费保障。国防教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做到了正常化、经常化、规范化、课程化,社会教育效果显著。学校组建了军乐团、三军仪仗队、高炮方队、防

恐方队等12个具有国防教育特色方队。其中三军仪仗队受到时任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曹刚川接见。军乐队在香港回归后曾经做过大型演出。

1.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1)制定了《年度国防教育计划》《学期国防教育实施方案》《一日生活制度》《日常行为规范》《军容风纪检查制度》《查铺查哨制度》《军训实施方案》《四会教员训练与考核制度》,修订了《国防教育规划》《国防教育例会制度》《国防教育检查制度》《国防教育考核制度》,为国防教育活动的扎实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国防教育生活化。[3]一是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解放军《三大条令》,对学生的纪律观念、一日生活、内务整理、礼节礼貌、卫生习惯等行为规范都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二是通过听国防形势报告、举办主题国防知识演讲会、开展国防教育日和军事拓展活动、看军事题材电影、唱革命歌曲比赛、进行野营拉练、每周一进行升国旗仪式和国旗下演讲、饭前一支歌、每天一次内务评比等形式,使学生日常生活过得紧张、充实、愉快,寓国防教育于活动之中,教育效果十分明显。

(3)国防教育校本化。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充分利用多年来的国防教育实践,积极开展国防教育校本研究,积极申报市级课题研究,并成立专门的校本教材研发团队,形成校本化的国防教育特色。郑州市教科所课题《军事训练对中职生身心发展促进作用研究》获得市级一等奖;《学生教员的培养、使用与管理》《职业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培植——以国防教育为例》分别发表在《新校园》《现代企业管理》杂志上;研发团队编写并出版了《当代国防新论》《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训练》《军训与管理手册》《素质拓展与生存防护》等国防教应用教材。

由于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成果显著,获得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授予的"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郑州警备区授予的"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等多项殊荣。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及《解放军报》《河南日报》等国家、省市新闻媒体多次对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国防教育成绩进行了专题报道。

(四)产教融合助推学校发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培养有未来的产业工人的重要模式。学校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引企入校、专业共建、课程共担、跟岗顶岗实习等多种合作形式,并取得一定成效。目前,学校和郑州宇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PPG公司等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建立了宇通冠名班、长城汽车冠名班等26个,人数达到1100人,实现校企发展的双赢。

(五)大力倡导教学策略与方法的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教学策略与方法也必须随之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知识、技能和情感的统一,教育教学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为此,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大力倡导新教学、新教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发放有关书籍,组织教职员工学习;在教学评价中,贯彻新的教育教学思想,引导和鼓励教师在工作中学习新思想,探索和实践新的方法和手段。现在,我校教师均能较为灵活地运用行动导向、研究性学习等先进的教学策略与方法,科研意识与科研水平明显提高。

五、研究成果

几年来,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的课程改革是富有成效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方面

文化课与专业课的调整与改革,一改过去"听不懂学不会"状况,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的同时,学到了更多有用的知识与技能,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开设,以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热情,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普遍提高了自我认识、规范了言谈举止、提高了艺术品味、陶冶了审美情操;岗前教育,使毕业生在就业前强化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端正了就业观念,丰富了求职择业的技巧,提高了他们的就业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就业。

(二)教师方面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师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学习先进理念,勇于探索实践,总结经验教训,他们的视野开阔了,思想丰富了,知识拓展了,业务素质提高了,科研能力增强了。短短几年时间产生河南省职教名师两名,省职教专家两名,省市学术技术带头人3名。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通过示范校创建,不断进行教育教育改革,激发了广大教师进行新课程思想的探索,开发校本教材28本,出版12本,每年都有大批教师申报省市课题,在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优质课评选中,侯慧娟老师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三)学校方面

教学改革,给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思想观念得到更新,激发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很大的发挥,从而教育教学

质量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学校的社会声誉也大大提高,学校的生源状况明显好转,所招新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经过国家示范校创建,该校已成为郑州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郑州市机车专业、机电数控专业、计算机专业技能工作室设于该校,河南省汽车专业名师工作室也落户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该校成为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五项、三等奖十二项,同时荣获河南省参加2016、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

六、结束语

虽然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评价模式尚未完全形成,还需要行业企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师资力量有待加强,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对行业企业标准了解不够全面,实操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现代职业教育理论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精品专业、精品课程打造还需要一定过程。

在《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精神的指导下职业学校结合自身实际,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学生就业创业的能力,培养更多既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又有较高的技能水平,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国家中职改革和发展示范校示范校的引领,相信职业教育一定会彰显个性与特色,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儒德. 建构主义: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J]. 人民教育,2005(17).

[2]〔美〕霍华德·加德纳. 多元智能[M]. 沈致隆,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陈云雁. 国际教育的综合素质培养功效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2018,35(1):108-111.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Reform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to Build Up the Nationa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School in Zhengzhou Defence Technology School

LIANG Cai

(Zhengzhou Adult Educa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Outline for Medium and Long-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2010—2020), defined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enhance majors, curriculum and courses reform and promote the training mode of vocational talent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study,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nternship.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Zhengzhou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school, this essay sums up experience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feasible 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creation of national model schools; teaching reform;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基于创意经济人才需求形势的高校艺术教育发展策略

陈学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艺术系,郑州 450046)

摘 要:创意人才的素质关系着创意经济的发展,而艺术教育关乎着创意人才的培养。我国高校的艺术教育现状已经不能满足创意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急需在创意人才培养目标、创意人才的团队意识与竞争意识、创意人才的时代性与开放性等方面制订出合理有效的培养策略,以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创意经济;艺术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需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5.02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5-0125-0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创意经济定义为:“结合创意生产和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为无形的文化内涵,这些内容基本上受著作权保障,形式是物质的商品或非物质的服务”的经济形态。[1]英国《英国创意产业报告》中将创意产业定义为:“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的产业。”[2]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则普遍认为创意经济是来源于个人创意或传统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式和运用,能够创造财富、增强就业机会,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行业组织或经济形态,并根据区域经济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将文化创意产业分为文化艺术产业、设计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三类。

按照美国学者佛罗里达关于创意经济的“3T”理论,创意经济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意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我们不难看出,创意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人本思想的回归,以及人们对“效率为先”的工业化生产的反叛,通过文化的传承与凝聚、创意的发掘、技术的跨界与融合和产业集群效应来实现产品或服务的高附加值、个性化和价值优先等特征的经济行为。创意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后经济形态递进发展的尝试,也是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和经济发展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

一、创意经济发展及其人才需求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创意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模式,也逐渐演变成世界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新的平台,被世界主要经济体赞誉为经济转型的主要依托。据约翰 霍金斯的《创意经济》一书中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财富,并以超过5%的速度逐年递增。[2]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文化与创意产业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创造产值2.25万亿美元,超过电信业全球产值(1.57万亿美元),并超越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美元)。从业人数295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1]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造,逐步淘汰一些过去引以为重的资源型、资金驱动型落后的产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创意经济正是因为附加值高、可持续性等特征迎合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科技、文化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提出“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等

收稿日期:2018-09-23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视域下河南发展创意经济策略研究”(172400410336)
作者简介:陈学书(1979—),男,河南信阳人,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文化创意。

发展战略，而创意经济又是以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创新为基础的，是世界各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的目标、定位。当前，中国的创意经济正在飞速的发展，形成了国家级、地市级和特色创意小镇“三位一体”的创意发展格局，2014 年，经过国家审批的创业园区就高达 2500 家以上，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突破 5%，成为区域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

创意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凸显创意人才的短缺。据《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占世界市场 19% 的份额，表明我国有较强的文化产品的加工与生产能力。而在文化创造力方面，从事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却不足 1%，与发达国家或城市的差距相当大（如纽约为 12%，伦敦为 14%，东京为 15%）。[3] 这表明我国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且从业人员多集中在产品生产与销售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服务、创意管理与市场研发类创意人才不足以满足我国创意产业的需求。因此，提升创意人才培养的质量，扩大创意人才的储备，成为当前中国创意产业各个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高校艺术教育与创意人才培养的内在联系

1998 年制定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将创意经济的定义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2] 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 13 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这个定义被无数致力于发展创意经济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延伸。在东亚地区，基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创意经济一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根植于当代科技发展（尤其指智能数字技术、互联网 + 和新传媒）的基础上，以文化、艺术等形式与经济高度结合为特征，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为主，向人们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与娱乐产品为目的的新型产业形式。

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动漫、游戏）、音乐、表演艺术、电视广播等行业基本上都属于广泛的艺术类产业范畴，至于广告、出版、和软件等行业也需要有一定的艺术基础来作为支撑的。因此，西方不少学者将创意经济理解以文化为根基，以艺术为灵魂，以创新、创意为核心的新的艺术经济形态。

高校艺术教育不同于中小学以审美和基本功为主的教育形式，它不仅向学生传递出更加丰富的艺术知识、专业的艺术技能和深邃的艺术精神，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此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与智慧。“高校艺术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敏捷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能够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4]

三、创意经济时代高校艺术教育发展策略

高校艺术教育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抓住历史机遇，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出适合创意经济发展的培训体系，不仅能够较好地满足形势发展需要，解决学生就业问题，还能够较好地实现艺术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艺术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一）确立创意人才的定位，制定出适合创意经济现实需求的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关于创意人才的概念，美国学者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人才是从事“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创造性内容”工作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人才是指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创意提出开拓性的观念，并能够利用自我的创作技能或手段将新的观念转化为新的技术或是内容，从而为社会提供高价值的、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创意基础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诸如相关的专业知识、文化素养、实践经验、专业技能、创新意识、学习能力、社交能力、问题分析与转化能力、经营能力、敬业精神等素质与能力，又要关注创意人才自身的性格的培养，诸如思辨能力、批判质疑精神、包容性和抗风险打击能力等人格因素，二者合一，方为完整。

高校艺术教育作为创意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应该制定出适合创意经济现实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首先，高校艺术教育要确认培养目标是复合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指综合型或学科交叉型人才，具备多个专业之间的知识交融与综合能力，具有基础扎实、素质全面、思维活跃和应用能力较强等基本特征，而应用型人才主要指从事社会实践的专门技术人才，强调知识的运用与实践能力。高校艺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人才培养的目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掌握或运用某种专业技能，它有着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使命担当，特别是创意经济时代，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多的倾向于创新性、高素质、综合运用与原始创意，而不是从事低端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创意经济时代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定位更应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其次，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要求。按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录（2012）》及其相关说明可明确看出，对于高校艺术教育，主要是培养专业的基本理论、专业技能、了解文化事业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内外艺术的发展状况。这样的培养要求显然不能适应新时期创意人才的需求，创意的本身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统一，专业知识与技能只是培养要求中最为基础的部分，而核心在于创新意识、思维与创新人格的培养。因此，高校艺术教育除了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应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问题分析与转化能力、科学的思辨能力等，把专业素养与创新思维统一起来，使学生成为时代需要的高端复合型人才。

（二）注重创意产业人才集聚效应，加强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的团队意识与竞争意识

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已经成为创意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马歇尔提出的空间集聚外在性理论主要针对一般产业产业的空间集聚，而迈克尔·波特的创意产业集聚理论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大量创意产业关联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和人才的空间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现象。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而言，空间集聚将融合文化、产业、人才和消费者，是以设计、咨询、艺术等创意服务为主体的企业的集中，能够形成一个开放与创作、实践与体验、生产与销售、消费与展示共存的多元化产业生态群。在这个生态群中创意人才依靠团队协同作战，形成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态势，推动着产业的整体进步。

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其人才培养模式往往倾向于单项的课堂教育模式，即注重培养每一个学生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技能与理论基础，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职业倾向，更忽视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导致人才质量千篇一律的局面，不利于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和学科的优势发展，更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与竞争意识的培养。据资料显示，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意经济发达国家，为了使艺术教育更好的支撑创意经济的发展，大学艺术教育普遍实行团队制或工作坊制，以具体项目或案列为基础，实现团队间的合作与竞争，凝聚起一大批优秀的创意团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鉴于此，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创意团队的构建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化普通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工作室在导师的带领下以项目或竞赛活动为基础，以赛代练，强调学员之间的配合、沟通、协作与竞争，形成团队间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健康发展。二是弱化第一课堂，强化第二课堂，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广泛组织不同院系的学生参与到各自院系自建项目、校级孵化工厂项目或其他社会项目中去，依据学生的个性与专长，以创意市场实际需求为导向，将学生分为若干创意团队，确保每个团队拥有原始创意人员、市场化与艺术产品开发人员、策划与艺术品经营人员和创意管理人员，赋予每个团队不同的职责与任务，展开团队间的联合与竞争，激发学生的潜能，达到既定教学目标。

（三）把握创意经济发展趋势，强化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性与开放性

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促使创意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日趋宽泛，它已不是创始之初英国所界定的13各行业，而泛指与艺术、文化、科技、信息、休闲、娱乐等精神心理性服务活动或产品相关，满足小康形态下人们精神文化娱乐需求所有行业的集合体。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言，“可以断言，地方和区域战略后10年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以把文化产业与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联系起来的方式，创造性、风险、创新和信息、知识与文化在全球经济中将具有核心作用”[5]。面对这个趋势，高校艺术教育要想培育出合格的创意人才，就必须进行变革，突破传统固化教育理念，打破师资现有结构，将高科技和新观念融入教育之中，强化人才培养的时代性与开放性。

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性是指教学体系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理念，教学内容要切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教学方法要融入时代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背景，培养出的学生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与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因此，时代的需求使得高校艺术教育必须进行如下改革。

1. 教学体系。新的教学体系要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加深校企合作、强化团队意识，注重学科集群与跨学科整合教育，夯实文化素质与创新意识，才能培养出有独立的思想、丰富的知识、深厚的文化积淀、熟练的技能和较强创造力创意艺术人才。

2. 教学内容。创意时代的高校艺术教育不要将专业课程划分过细，凝聚相近或相似的课程，产生一批具有优势效益的课程群，教学以案例、项目或竞赛为主，将教学内容融入实践中，不断增加艺术品投

资、经营，文化艺术品牌建设与管理，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数字艺术的管理与运营等市场需要的前沿课程，增加学生实践实训与社会调研的学分比例，增加讲座的实践性、促使得教学内容更加弹性和多元化。

3. 教学方法。课堂上以个性辅导、案例探讨、团队实践为主，广泛使用新媒体，利用微信等时代化社交平台和大数据的力量，构建出全方位学生辅导答疑体系和人才质量跟踪体系，让学生在数字化的环境中形成个性化学习习惯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长久以来，高校艺术教学中始终存在着“重技法、轻理论”“重课堂、轻课外”“重专业、轻素质”“重基础、轻前沿”；师资队伍中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研究、轻实践”等不良现象。创意时代要求我们在教学理念、学科机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师资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实行多学科并行发展，跨学科融合发展；教学中要以课堂教学与市场实践并重的双向人才培养模式代替课堂教学为主的单项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引进西方优秀教学评价理念，以综合素质与创造力作为学生评价的重要原则；倡导师生平等，提倡师生团队，强化师生交流、协助机制，不断拓展师资渠道，实现校内指导老师与市场指导老师并轨的“双导师制”；积极引进那些学历不高，但经验丰富的市场专业人才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引进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引领专业发展，实现师资引进的多元化，才能在把握常规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满足创意人才的现实需求。

正如美国学者奥斯汀说言：“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正从工业化制造向艺术化创造转变，创造而不是制造，艺术化而不是工业化，成为创新的新意所在。”[6]我国正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历着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因此，高校艺术教育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行教育改革，以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综合文化素质和个性化为改革的切入点，调整人才培养的定位与目标，改革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重视高校艺术教育的时代性与开放性，加强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创意人才。

参考文献：

[1]闵洁. 艺术商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为例[J]. 设计艺术研究，2017(7).

[2]龚兆雄. 英国创意产业政策对英国电影的影响及启示[J]. 考试周刊，2016(60).

[3]张晓明，王家新，章建刚. 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彭吉象. 艺术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曹瑞忻. 论创意产业视野下交叉型人才的培养[J]. 装饰，2008(9).

[6]罗布·奥斯汀. 艺术过程：管理者需要向艺术家学习的工作方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许峻）

On College Art Education Developing Strategy under the Trend of the Demand of Innovative Economic Talents

CHEN Xueshu

(Department of Art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key of innov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quality and prepar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roots in art educ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cannot meet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era. It is urgent to formulat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training strategies in aspects such a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reative talents, the team consciousness and competitive consciousness of creative talents, the epochality and openness of creative talents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nnovative economy; art education; cultivation of talent; demand of talents